

【理论探讨】

# 伟大建党精神培育新时代好青年的路径探析

贾强 王冰洁

(山东科技大学 山东 青岛 266590)

**摘要:**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也是广大青年迈向新征程、奋进新时代、握紧接力棒的思想之基和动力之源。培育青年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高远志向,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高尚品行,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责任担当。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人生修养,是锻造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的应有之义。坚持伟大建党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也是培养和造就堪当时代重任的社会主义可靠接班人的基本要求。

**关键词:**伟大建党精神;新时代好青年;责任担当

**中图分类号:**G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885(2023)01-03-06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立党、兴党、强党的精神原点和思想基点,引领中国共产党铸就百年辉煌。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青年,把革命的希望寄予青年,并且带领一代代青年谱写了青春的无上荣光。在新的奋斗征程上,准确把握伟大建党精神,将其融入青年责任担当的价值导向,转化为青年勇挑时代重担的精神动力,对于党领导青年一代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 一、伟大建党精神为培育新时代好青年提供精神动力

(一)“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是新时代好青年“有理想”的思想动力

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和坚守共产主义远

大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生命之魂。近代以来,一大批革命先驱在探寻民族救亡图存的科学真理道路上苦苦求索,寻找革命真理的方向。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先驱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适应无产阶级革命需要的科学真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立足于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立场,将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的远大理想。革命理想大于天,严峻的形势丝毫没有动摇年轻的革命先驱们建党的决心,最终在“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中正式诞生了中国共产党,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篇章。

“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彰显了理论建党、思想建党的强大战斗力,回答了新时代青年“信仰什么”“立什么志”的人生之问。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征程中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指导了中国革命、建设与改

收稿日期:2022-10-19

基金项目: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项“本硕博思政课程建设一体化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研究”(21JDSZK095);山东科技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以伟大建党精神培育和锻造新时代好青年的路径探析”(SZKT-22095)。

作者简介:贾强(1979-),男,山东济南人,山东科技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王冰洁(1998-),女,安徽淮南人,山东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革从胜利不断走向新的胜利。党的二十大对全党提出要继续坚定信心,捍卫理想,团结奋斗的基本要求。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进程中,广大青年要“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将信仰和理想融入思想、付诸实践,自觉做志存高远、信仰坚定的新时代好青年。

(二)“践行初心、担当使命”是新时代好青年“敢担当”的实践动力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是伟大建党精神的政治宣言和根本遵循。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就在血与火的斗争实践中不断践行初心、勇担使命。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新中国成立以来,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人面对一穷二白的国内环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开启了新中国建设的崭新局面;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践行初心使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条件和理论基础;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继续团结带领人民以泰山压顶不弯腰的政治气概,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到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鞭策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砥砺前行,回答了新时代青年“守什么初心”“担什么使命”的目标之问。在国家蒙辱、人民蒙难的近代中国,一批先进青年英勇投身于革命实践中。他们有些出自旧中国的富裕家庭,却放弃衣食无忧的生活,选择背井离乡。他们的初心和使命就是要拯救万千贫苦的中国人民于水火之中,就是要实现国家的复兴和人民的幸福。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初心如磐,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巨大勇气带领中国人民实现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勉励青年要“敢担当”,就是告诫广大青年,“赶考”之路远未结束。只有牢记为民之初心,勇担中华民族之使命,才能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事业中创造属于中国人民自己的美好明天。

(三)“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是新时代好青年“能吃苦”的人格动力

敢于面对一切风险挑战,保持斗争精神是伟大建党精神的政治底色和精神风范。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秉持“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革命豪情,在不

同历史时期砥砺前行、前仆后继,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攻坚克难、接续奋斗。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科技战线上无数共产党员为了国家隐姓埋名、自强不息,成功研发“两弹一星”,开启中国航空新时代;在生产领域,铁人王进喜喊出“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豪迈誓言,激励了无数青年工作者献身祖国各项事业。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在抗洪、抗疫的第一线,中国共产党持续发扬不怕牺牲和英勇斗争精神,党员先锋、青年先锋舍生忘死;在脱贫攻坚的道路上,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共同创造了消除区域贫困、绝对贫困的奇迹。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锻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回答了新时代青年“什么是出彩人生”“如何实现人生价值”的时代之问。在两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亿万人民敢于出击、攻坚克难。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以“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精神风范向贫困宣战,全国上下举国同心,如期实现了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以巨大的担当和勇气自主研发新冠疫苗,使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得到重大保障。不怕牺牲、英勇斗争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仅能战能胜,更能敢战敢胜。以“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伟大建党精神为依托,能够提升新时代青年的斗争本领,发扬“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无私品格,向新时代一切困难发起挑战。

(四)“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是新时代好青年“肯奋斗”的价值动力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牢记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宗旨是伟大建党精神的品格和力量源泉。革命时期,代表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利益的救国之路纷纷宣告失败,而“共产党是由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组成的,来自于人民,成长于人民,是人民中的一份子。”中国共产党在诞生之际就根植于人民群众之中,自觉践行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始终将党的前途命运同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实现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壮大,带领中国人民走向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党性与人民性的高度统一,展现了党的强大价值取向优势。历史已经表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我们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精神底气,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坚实基础。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回答了新时代青年“接谁的班”“什么样的人才能接班”的使命之问。中国共产党能够创造伟大奇迹的基因密码正是始终坚守为民的立场和方法,将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作为评价工作成败的标准。在新的赶考路上,各种不稳定、不确定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加。这就告诉新时代青年要保持清醒头脑,站稳政治立场,提升对新形势的政治判断力和领悟力。新时代青年应当牢记,不能也不可能脱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能也不可能脱离人民群众。坚持人民至上,自觉将“小我”融入“大我”之中,以责任担当忠诚于党、不负人民。

## 二、伟大建党精神为培育新时代好青年把牢梦想航向

(一)高远的理想信念使“有理想”的新时代好青年敢于有梦

强大的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各项事业中披荆斩棘、无往不胜的根本保证。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青年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在波澜壮阔的革命实践中历练出了钢铁般的意志,以坚定的信仰、坚毅的品格战胜了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如期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前有革命先驱李大钊“以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中国”的铿锵誓言,有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宏大心愿,今有北大考古女孩钟芳蓉将国家古迹守望传承作为毕生事业,有山东沂源教师任纪兰以青春为乡村孩子播撒知识的阳光。建党百年来,一批批青年先锋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栉风沐雨,笃行不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青春赞歌。

以伟大建党精神引领新时代青年的发展,能够为青年壮骨补钙,为青年树立崇高理想信念提供动力、激发活力、保持定力。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日益富足的今天,世界面临着多元文化冲突,不同文化之间的摩擦对于青年树立崇高理想信念带来极大挑战。当代青年群体中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理想信念不牢、价值取向不端的现象。以伟大建党精神培育新时代青年,就要让青年自觉体悟信仰和理想的力量,从而在真理的感召下坚定信念,明确方向,提振信心。不仅需要以精神滋养青年,更要让青

年在身体力行中平衡对社会理想与个人理想间的价值关系,从而自觉抵制各种不良价值倾向,牢固树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矢志不渝的理想信念。

(二)浓厚的家国情怀使“敢担当”的新时代好青年勇于追梦

培养具有家国情怀的青年是新时代的发展之需,个人成长之要。伟大建党精神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士”精神。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就提出“士志于道”的思想,认为士阶层志在追寻真理。伟大建党精神继承发展了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家国情怀,构成了新时代青年砥砺奋进的内生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之所以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凭着那么一股革命加拼命的强大精神。”百年征程中,伟大建党精神不断以浓厚的家国情怀引领时代青年自信昂扬,朝气蓬勃,使青年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行力量。回望百年党史,青年一代初心如一,责任在肩。在祖国边疆有青年战士的顽强守护,在新冠疫情防控中有青年医护者的冲锋陷阵,在科技攻关的道路上有青年学者的担当与创新。

以伟大建党精神引领新时代青年,要砥砺青年一代勤学笃行,树立不负党和人民的家国情怀,成就非凡的出彩人生。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青年工作,鼓励广大青年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自觉抵制不良意识形态影响,勤学笃行,成为党和人民需要的实干家。在伟大建党精神的感召下,当代青年要厚植家国情怀,在不断坚定“四个自信”中成为新时代高素质、有情怀的青年建设者。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征程上,家国情怀的强大凝聚力和方向引领力将继续激荡青春梦,青年将持续担当时代冲锋者,成为堪当时代大任的青春之师、热血之师。

(三)鲜亮的斗争底色使“能吃苦”的新时代好青年乐于筑梦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党和人民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在斗争中诞生、成长和发展。革命时期,广大青年对党忠贞不渝,在枪林弹雨中经受住了生与死的考验,为中国革命胜利贡献了青春。新中国成立后,广大青年向科学进军,向困难进军,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为祖国建设挥洒了青春的汗水。改革开放以来,广大青年赤诚奉献,勇做改革闯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了青春的热血。新时代以来,广大青年自觉担当,深入一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谱写了

青春的篇章。顽强学习、坚决斗争成为各个时代广大青年的基本生活写照。在伟大建党精神的引领下,青年要能吃苦耐劳、敢吃苦,直面困难挑战,发扬奋斗精神,增强实干本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以伟大建党精神锤炼新时代青年,要增强青年的志气、底气、骨气,勇于同一切风险挑战作斗争。当前全球化遭遇逆流,国内发展有一系列难题需要攻克,伟大斗争呈现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特点。当今社会仍然存在虚无主义等不良思潮,一些人打着重评历史的幌子,通过解构历史混淆视听,使青年易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中。因此,促进国家顺利发展,巩固国家意识形态的安全,是伟大建党精神引领新时代青年价值培育的内在逻辑。以伟大建党精神作为青年意识形态培育的精神引领,能够发挥其凝聚共识的精神滋养作用,使新时代青年在伟大斗争中抵御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保持艰苦奋斗的本色,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期实现。

(四)坚定的人民立场使“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勤于圆梦

只有明白为了谁、依靠谁,才能在新的伟大征程中乘风破浪,扬帆远航。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也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所决定的。“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是广大青年党员的政治诺言。一代代青年坚定不移跟党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中生动诠释了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政治品格。“吃剩下的半条皮带”是革命青年在长征途中坚定跟党走,不畏艰险、笑对困难的历史见证。带头查风口、冒雨涉水栽泡桐是焦裕禄同志在兰考工作期间为了人民群众苦干实干、甘于奉献的真实写照。情系人民是为了带动当地贫困群众脱贫致富,永远将生命定格在了30岁的“大山的女儿”黄文秀。时代各有不同,青春一脉相承。无论是面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枪林弹雨,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艰难险阻,抑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崭新使命,青年一代在党的感召和引领之下书写了可歌可泣的青春篇章。

以伟大建党精神培养青年人民至上的政治立场,要明确青年在所处时代中的发展定位,进而在实践中服务社会,造福人民。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中国古代的君民水舟论

也充分彰显人民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诉求,奉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从本质上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新时代广大青年要牢牢抓住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定位,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过程中彰显青春的力量。脚踏实地走进人民群众,深刻把握民之所想、民之所需、民之所向,以无私的人民情怀扛起新时代青年如山的青春责任。

### 三、伟大建党精神为培育新时代好青年确立行动指引

(一)以伟大建党精神筑牢新时代好青年“有理想”的思想之基

将伟大建党精神切实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从而避免青年理想信念的短视化,增强长效精神引领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青年理想远大、信念坚定,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无坚不摧的前进动力。”伟大建党精神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青年在个人价值目标、价值取向、价值要求的引领相照应。在对青年的思想教育中,要加大对伟大建党精神的学习力度,针对社会中企业、社区、政府等不同单位,系统性、深入性地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原著的学习,真正让青年群体学懂弄通伟大建党精神的时代价值和力量。从理论源头加强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将伟大建党精神真正植入头脑,化为行动。

以高校为阵地,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育人功能。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共产主义的理想铸魂育人。高校作为培养青年的主要阵地,必须将青年工作当作战略性工作来抓,在伟大建党精神的学深悟透上下功夫。高校青年正处于理想信念培育的关键时期,打造一支政治可靠、本领过硬的教师队伍至关重要。一方面,教师要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抓点,加强对伟大建党精神所蕴含的课程资源深入挖掘,将其贯穿到课程建设的全过程,引导青年汲取伟大建党精神的红色力量。另一方面,寻找伟大建党精神与学科的契合点,提升培养实效性。高校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强化不同学院、不同学科理想信念培育的连续性,将伟大建党精神融入不同类型、层次的学科教材,以高质量教材满足高素质人才培养要求。引导新时代青年真正用真理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为理想砥砺前行、不懈追求。

(二)以伟大建党精神厚植新时代好青年“敢担当”的奋斗底色

发挥新时代建党精神榜样模范、青年时代先锋对广大青年的影响力,引导人人学先进,争当先进。在伟大建党精神的指引下,一批批中国青年在革命、建设、改革时期为了国家和民族拼搏、奉献、牺牲。新时代以来,我国涌现出大批发扬伟大建党精神的青年榜样模范,他们大多处于基层一线,在平凡的岗位上深刻诠释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榜样模范是激励新时代青年不断践行伟大建党精神的“精神富矿”,要充分发挥青年榜样模范、时代先锋的精神凝聚力优势,广泛宣传榜样模范的先进事迹并传达其中所蕴含的时代精神,促进青年对榜样模范的学习真正入脑入心。

讲好新时代伟大建党精神红色故事,推进大众化传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把红色资源作为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的生动教材。”伟大建党精神是一部生动的红色教科书,深入挖掘建党精神蕴含的红色故事并将其转化为红色资源,是伟大建党精神厚植青年责任担当的有效形式。以建党精神为主题,举行党史知识竞赛或电影、纪录片的观看,让青年群体深刻领会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作用以及青年肩上的责任担当。利用博物馆等具有红色印记的地方,让青年能近距离感受红色历史,提升历史的鲜活性。新时代背景下,文艺创作者们需要坚持与时代同步,与青年共成长。深入挖掘建党精神红色故事,融合创新性,用舞蹈、音乐、话剧等喜闻乐见的作品方式拉近历史与青年的距离,让历史成为陪伴青年成长成才、涵养青年责任担当的精神养料。

(三)以伟大建党精神磨砺新时代好青年“能吃苦”的顽强意志

将伟大建党精神贯穿新时代伟大斗争实践始终,加强新时代青年斗争历练。伴随着国家物质条件日益富足,部分青年容易满足现状,在消费主义、享乐主义中迷失自我。“青年时代选择吃苦也就选择了收获,选择奉献也就选择了高尚。”因此必须强化青年在基层的实践锻炼,多给青年人“烫手山芋”,让青年在基层的真刀真枪中磨砺个人意志,从而敢于挑重担子,敢于啃硬骨头,真正从实践中感悟伟大建党精神的时代价值。其次,增强实践锻炼的理论目标导向,要注重增强青年“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实践锻炼中

坚定青年斗争意志,做到当严峻形势和斗争任务摆在面前时,必须骨头要硬,敢于出击,敢战能胜。

以伟大建党精神提升新时代青年斗争本领,练就善于斗争的真功夫。斗争不是盲目的斗争,而是要善于从斗争中总结经验,辨别斗争方向,从而有效提升斗争本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告诉广大青年,斗争必定是一场“持久战”。因此以伟大建党精神引领青年,要不断锤炼青年的硬脊梁、铁肩膀、真本领。培养青年在复杂的斗争形势中,善于抓眼下主要矛盾,又要看长远、观全局。在斗争实践中,青年要勇于拨开迷雾,精准化斗争对象,提升斗争效率和效果。做到在原则问题上寸土不让,策略问题上灵活机动。善于发挥团队的斗争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积极在斗争中谋合作,在斗争中求共赢。

(四)以伟大建党精神压实新时代好青年“肯奋斗”的接班重任

深化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培养,筑好赓续红色血脉的精神长城。回顾中国式现代化的历程,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总是能自觉以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紧随中国共产党的脚步,以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信心勇于接过先辈们手中复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接力棒。以伟大建党精神培育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不断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压实新时代好青年的接班重任。不仅要注重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专业能力的提升,更要注重社会责任感的培养。通过专家讲座、系统性的理论宣讲等方式不断坚定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的理想。我国还要不断扩大青年马克思主义工程的培养力度,建立“国家—省级—市级—校级”一体化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体系,真正让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将学习成果融入宣讲等社会实践中。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要自觉做党的好帮手,同党和人民一同守好意识形态阵地,紧跟党的步伐,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担当作为的实干家。

互联网是新时代红色精神赓续的重要载体,能够有效丰富伟大建党精神的传播路径。在新的奋斗征程上,不断推进伟大建党精神理论和形式的创新,方可构筑好、维护好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新时代青年热衷于通过短视频等方式学习新事物,通过“互联网+红色精神”拓宽红色文化传播渠道和宣传力度,将伟大建党精神融入微信、抖音、学习强国等线上学习平台,传播内容的生动、有趣和传

播形式的新颖性强化其在青年中的感召力、影响力。例如以简单的故事片段“出圈”，着力引导青年主动学习并宣传正义和正气；开辟线上平台党史学习专栏和新颖的答题互动，并完善奖励机制，让青年在答题互动过程中自觉接受红色文化的洗礼。此外，注意运用建党精神中的典型事例或人物引领舆论阵地的建设，也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伟大建党精神作为党的精神支撑和宝贵财富，

必将继续照亮前方的奋进征途。作为新时代青年，深入学习践行伟大建党精神，紧跟时代步伐，紧随党的步调，紧贴人民诉求，方能在伟大的社会实践中成就非凡事业。相信新时代好青年，将继续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与人民同悲欢、共奋进，必将用蓬勃的朝气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与活力。

### 参 考 文 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 2022-10-26.
- [2] 习近平. 党的伟大精神永远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J]. 求是, 2021(17).
- [3] 习近平.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说明[N]. 人民日报, 2021-11-17.
- [4] 邓希泉. 新时代中国青年的精神风貌和责任担当[J]. 人民论坛, 2022(16).
- [5] 徐德斌. 伟大建党精神融入高校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的三重逻辑[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2, No. 678(15).
- [6] 曾梦芳.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价值意蕴与路径遵循[J]. 湖南社会科学, 2022(04).

## Explor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Great Party – Building Spirit to Cultivate Good Youth in the New Era

*Jia Qiang, Wang Bingjie*

(Shand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Shandong 266590)

**Abstract:** The great party – building spirit is the spiritual sourc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it is also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and source of motivation for young people to embark on a new journey, forge ahead in a new era, and hold on to the baton. Cultivating young people’s lofty aspirations of adhering to the truth and sticking to their ideals, practicing their original aspirations and fulfilling their missions, taking responsibility without fear of sacrifice and heroic struggle, being loyal to the party, and living up to the people’s cultivation of life, is forging ideals, daring to take responsibility, and ability The due meaning of a good young man in the new era who endures hardships and is willing to struggle. Adhering to the great party building spirit internalized in the heart and externalized in action is also the basic requirement for cultivating and bringing up reliable successors of socialism who are worthy of the heavy responsibility of the times.

**Key words:** great party – building spirit; good youth in the new era; responsibility

【理论探讨】

# 共青团开展青年就业服务工作的价值与路径探析

袁晓辉

(西安翻译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05)

**摘要:**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作为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团组织,是广大青年在实践中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校,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探析共青团开展青年就业服务工作的价值和意义,以共青团为主导,从实习、就业、创业三个层面,在共青团、学校、用人单位、求职青年四个方面开展青年就业服务工作,积极构建“一体两翼、三横四纵”的立体化青年就业保障模式,推动广大青年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关键词:**共青团;就业服务;价值分析;路径探索

中图分类号:D2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885(2023)01-09-05

## 一、共青团开展青年就业服务工作的价值意蕴

### (一)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

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我们党的最高价值取向,也是我们党100年来奋斗历程的基本经验之一。始终坚持把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无论何时何地,都要把党和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当下,对于广大青年群体而言,最迫切的就是有事可做,有事能做,有事做好。因此,实现广大青年的高质量充分就业,帮助青年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让他们愿意为这份工作去努力、去打拼,在满足自身物质精神需求,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为他人、为社会贡献力量,这无疑是广大青年最关切、最大的利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作为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团组织,是广大青年在实践中学

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校,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充分发挥共青团联系广大青年的桥梁作用,结合广大青年的特点和需要,富于创造性地开展青年就业服务工作,帮助解决青年面临的急难愁盼的求职就业问题。由此来看,共青团开展青年就业服务工作,能够有力彰显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体现了党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品质,凸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利于不断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

### (二)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

就业工作本应该由政府下设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就业政策地制定以及就业活动的组织实施。但在当今就业形势日趋严峻的条件下,仅靠人社部门很难全面解决就业困难的问题。因此,需要政府统筹安排人社部门、共青团、大中专院校、工会、残联、妇联等群团组织和部门共同开展就

收稿日期:2022-11-6

基金项目:2022年度共青团实践育人工作课题《共青团开展青年就业服务工作的价值分析和路径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22SJLX38。陕西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2年度课题《陕西省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立体化建设路径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831。

作者简介:袁晓辉(1980-),男,陕西扶风人,西安翻译学院助教,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劳动思想、劳动就业、劳动关系。

业工作。特别是共青团是党和国家联系青年的桥梁和纽带,青年又是就业的主力军,解决就业问题首先要解决青年就业问题。共青团发挥自身优势,开展青年就业服务工作,为政府的就业工作拓宽了渠道,分解了人社部门的就业工作压力。充分体现了人民政府千方百计为民排忧解难的决心以及对人民负责的初心和使命。

### (三) 满足了用人单位对青年人力资源的需求

长期以来,由于一定范围内求职信息和招聘信息的不对称,以及求职者和用人单位普遍存在对对方期望值过高的情况,导致一方面求职者找不到工作,但同时用人单位招聘不到满意的员工,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就业的难度。共青团开展就业服务工作,首先在青年群体当中通过组织职业素养、职业技能、就业能力等方面的培训,提高青年对职业、就业的认识以及对自身职业发展的认识。其次,各级共青团通过建立就业服务平台,拓宽了青年就业的渠道。特别是共青团在求职青年和用人单位之间搭建多种形式的就业服务平台,可以有效满足用人单位对青年人力资源的需求,助力企业健康发展。

### (四) 积极助推当代青年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在共青团主导下开展青年就业服务工作,开展就业培训、就业指导、就业见习、职业生涯规划培训及指导、就业信息对接、组织各种形式招聘会、建立网络招聘服务平台等一系列具体的促进就业服务的工作。首先,让青年对工作、对就业有一个客观正确的认识,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增强就业劳动意识。其次,让青年对自身的职业生涯有战略性认识,并且能结合实际理性制定职业生涯规划,增强职业发展的目标性和计划性。最后,各种就业信息的对接和就业服务平台的搭建,帮助青年能够实际找到一份适合自己且满意的工作,从而在新的工作岗位上稳定发展,服务他人,奉献社会,实现人生价值。

### (五) 促进了经济社会良性循环发展

在共青团主导下开展青年就业服务工作,实现了广大青年更大范围的就业,一定程度上也实现了高质量充分就业。提高就业率,降低失业率;提高稳岗率,减少流失率。一方面,减少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创造了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另一方面,满足了生产对人力资源的需求,切实保障用人单位正常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从而形成经济社会良性循环发

展的局面。

### (六) 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事业

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标志着我们进入了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期。越是关键期,越需要稳定的内外部发展环境;越是关键期,越需要不断深化改革,持续创新发展。因此,以共青团为主导开展的青年就业服务工作更需要全面改革创新,打破影响青年就业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和就业信息壁垒,构建“一体两翼、三横四纵”的立体化青年就业保障模式。实现青年高效就业、高质量就业和高水平就业,以此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健康持续向前发展,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 二、改革开放以来共青团开展青年就业服务工作的历史进程

### (一) 尝试探索阶段:1978—1992年

从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这一时期是共青团开展青年就业服务工作的尝试探索阶段。1979年大批知识青年返城,中央和共青团在加强教育的同时,想方设法广开就业门路,扩大城市安排知青的能力。1981年,共青团中央提出要“积极协助政府开辟门路,安置待业青年”,着重开辟在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中的就业渠道,并增加自谋职业的渠道以进一步解决城乡青年的就业问题。1983年4月,全国毕业研究生和应届大学生分配会议发出倡议,“号召大学生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1990年共青团中央提出“针对目前出现的就业高峰和经济困难,各级团组织要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城镇待业青年的就业前培训和就业后轮训工作,并配合有关部门广辟就业门路,做好安置工作和生产自助工作”。这一时期在共青团的服务指导下,青年就业创业工作取得重要进展,为全面推进共青团服务青年就业创业奠定了良好基础。

### (二) 全面推进阶段:1992—2003年

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到2003年高校扩招后迎来大学生第一次就业高峰,这一时期是共青团开展青年就业服务工作的全面推进阶段。党的十四大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拉开帷幕,下岗职工量逐渐增加,全国就业工作的重点已经转移到下岗工人和农民工上来。在经济体制持



续改革的背景下,共青团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和能动性,调动和协调政府、用人单位、求职青年及社会各方面力量,综合运用政策扶持和各种就业服务手段,推行企业安置、个人自谋职业和社会帮助安置相结合,为下岗职工提供就业指导、职业介绍、转业转岗培训等多种服务和帮助。针对下岗职工自身素质不高、缺乏技术专长等困难就业情况,团中央联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实施“下岗青工创业行动”,为提升下岗青年职业素质和实现再就业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 (三) 改革创新阶段:2003—2012年

从2003年高校扩招后迎来第一次大学生就业高峰到2012年,这一时期是共青团开展就业服务工作的改革创新阶段,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就业压力最大的时期。首先面临的是持续10年的高校扩招所带来的大学毕业生人数持续增加,为此,共青团积极引导高校毕业生树立正确的成才观和就业观。全面启动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加大科技培训、创业扶持力度。开展“博士服务团”“青年企业家西部行”“青年星火西进计划”“选拔高校毕业生到西部基层工作”等活动。同时,国企改革城镇下岗职工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进城务工人员增加,再加上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一部分企业停产,导致招聘需求大量减少,就业的供需矛盾更加尖锐。对此,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共青团中央明确把促进青年就业创业作为重中之重,提出“努力构建包括意识培养、观念转变、素质拓展、技能提高、实践锻炼等环节的促进大学生就业创业的工作体系”。先后举办“中国大学生创业大讲堂”“海外学人回国创业周”、大学生就业创业教育论坛等活动,有效地推动促进青年就业创业。

### (四) 全面深化阶段:2012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持续推进,共青团开展青年就业服务工作也随之进入全面深化阶段。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共青团积极响应这一号召完善高校现有创新创业服务体系,努力激发青年学生创新创业热情,推动高校共青团创新创业工作深入开展。同时,依托互联网等信息平台,整合各种信息资源,让大学生及时了解就业信息及创新创业资讯,提高大学生就业率与创业成功率。此外,共青团积极建设大学生创业平台,为青年提供实效创业支撑。通过

开展博士服务团、“科技之光”专家服务团等项目,丰富服务青年创新创业活动形式,“一站式”服务平台的构建为创业团队提供更多进驻园区的便捷。进一步完善联动机制,与“孵化器”“转化器”一同构成加速青年创业团队发展进步的有机系统,更为有效地指导青年的创新创业活动。

## 三、共青团开展青年就业服务工作的路径探索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共青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始终围绕党的核心工作,加强和促进就业创业工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题,共青团把服务青年就业创业工作作为全团工作的重中之重,将服务青年就业创业工作摆在突出位置。近年来,共青团服务青年就业创业成效显著,青年就业创业趋势稳中向好,就业创业青年的数量明显增加,优秀的青年创业项目不断涌现,为中国就业创业工作注入了强劲动力。但同时也可以看到,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就业形势依然非常严峻,这不仅关乎广大青年和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而且关乎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如期实现。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同时又是直接广泛联系广大青年的桥梁和纽带的共青团,在新的发展格局下,有责任、有勇气、有信心扛起促进青年就业的重任。

### (一) 确立共青团开展青年就业服务工作的主导地位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团组织,是广大青年在实践中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校,是中国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期内,就业形势将会非常严峻。就业工作除了人社部门全面统筹外,必须明确几个强有力的实施主体,把党和国家的宏观政策、方针落实到具体的促进就业过程中去,这是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客观需要。

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有责任有义务为党和国家分忧解难,分担关系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工作任务。共青团开展青年就业服务工作具有天然的优势,是党和国家联系青年的纽带和桥梁,青年又是共青团联系、服务青年的直接对象,而且共青团有完整、系统的组织体系,特别是具有庞大、完整的基层组织机构。可以全面统筹协调各级团组织、学校、用人单位、求职青年等资源,切实推动青年就业工作,提高就业率、就业质量、就业水

平。这为共青团主导青年就业服务工作奠定了现实基础。

(二)明确共青团开展青年就业服务工作的职能职责

确立了共青团开展青年就业服务工作的主导地位,与之相应,需明确共青团开展青年服务工作的职能职责,划清共青团与人社部门、学校、工会、妇联等在就业方面的职责范围。

划清共青团与人社部门之间的职能职责。基于当前我国所面临的严峻的就业形势,仅靠人社部门很难完成艰巨的就业任务。为此,从顶层设计上明确,人社部门负责统筹全国的就业工作,人社部门、共青团、学校是三个促进就业的实施主体。人社部门负责35岁以上群体的就业工作,共青团负责所有18-35岁青年的就业工作,学校就业中心和共青团共同负责应届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工作。通过明确三大促进就业主体的职能职责,确定各自的就业任务,实施精准就业。

划清学校就业中心、学校团委和学工部之间在促进就业方面的职能职责,明确具体的需要完成的就业任务。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是就业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就业任务尤为艰巨。在学校内部同样需要确立就业中心、学校团委和学工部三个并列且具有竞争关系的促进就业工作的实施主体,明确各自的就业任务,三个部门发挥各自优势独立开展学生就业工作。学校以年为单位对学生就业的质量和数量进行评估考核。赋予工会、妇联、残联相应的促进就业的职能职责,与人社部门、共青团、学校共同推进就业工作的开展。

(三)完善共青团开展青年就业工作的体制机制

在确立了共青团开展青年就业工作的主导地位、明确了其相应职能职责的基础上,关键要建立、完善高效地促进青年就业工作的体制机制。在整个就业体系中,共青团的就业工作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大中专院校共青团开展的针对应届毕业生就业工作和城乡社会青年就业工作。对于不同的服务对象建立不同的体制机制。

学校应届毕业生就业服务工作体制机制。应届毕业生的最大特点是缺乏工作实践经验,对此,建立以实习为基础、以就业为目标,实习促进就业的体制机制。

城乡社会青年就业服务工作体制机制。城乡

社会青年大多有一定的工作经历,或者具有一技之长。因此,建立鼓励、支持创业,以就业为目标,创业带动就业的体制机制。

(四)创新共青团开展青年就业工作的方式方法

新定位、新职能职责、新体制机制,需要新的方式方法开展青年就业服务工作。

1. 全面落实实习,实习促进就业

结合大中专学生专业特点,有计划、有步骤的安排实习工作。从大一开始,充分利用周末、寒假、暑假、大专大三和本科大四第二学期开展实习工作,把实习纳入到学生毕业达标的考核指标中。特别是针对不同的专业制定详细的实习计划。让学生从初涉职场参观学习,到实际工作岗位上从事辅助工作,再到具体岗位上从事自己能够胜任的工作,循序渐进适应职场环境。

学生需要实习,学校就要联系落实具体的实习单位,在某种程度上,一部分实习单位就是未来潜在的就业单位。在实习期间,学生与单位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学生对单位的工作内容、工作形式、工作流程、工作环境、管理制度、企业文化等有了一定了解。同时,单位对学生的性格特点、专业水平、工作能力、团队精神等也具有了初步了解和认识。两者相互了解,更有利于达成合作,促进就业工作。

2. 开拓就业渠道,实施精准就业

就业形势日趋严峻,开拓就业渠道尤为重要。进一步完善、优化共青团现有的就业渠道,打造具有针对性、广泛性、精准化的就业服务平台,加大团团微就业共青团服务青年就业平台的推广宣传力度,让更多的青年人和用人单位了解、使用团团微就业。同时,旗帜鲜明的创办中国青年人才网,就业服务业务覆盖全国各省、市、区、县、乡镇、村、街道办,并将全国共青团、大中专院校、用人单位、求职青年分门别类纳入到该就业服务体系中。中国青年人才网突出官方主办的鲜明特征,面向共青团、大中专院校、用人单位、求职青年等用户全部免费注册使用。一方面借助共青团的公信力吸纳更多的求职青年和用人单位进入中国青年人才网发布求职信息或招聘信息;另一方面,可以建成全国范围内庞大的、准确的、有效的招聘求职信息数据库,让青年求职者和用人单位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充分地双向选择。

发挥国有企业团组织积极作用,完善非公企业

团组织建设。发挥公有制企业团组织广泛、直接联系青年的优势,关注青年员工的工作生活和发展需求,宣传青年员工的昂扬斗志和工作激情,展现青年员工的青春活力与敬业风采,树立良好企业形象,以此吸引更多优秀青年加入企业。鼓励、支持、引导非公企业建立团组织,宣传共青团工作的方针、政策,发挥团组织的积极作用,为非公企业的健康发展吸纳青年、组织青年、培养青年,让青年在非公企业里奋斗、发展、成长,成就事业。同时,充分发挥企业团组织和广大团员的作用,积极帮扶广大待业青年就业,实施一对一精准就业战略,即一名团干部或者团员帮助一名待业、失业青年找到合适的工作,并帮助他们积极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帮助

解决工作中碰到的困难,让青年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健康成长。发挥企业团组织的积极作用,促进实习、就业工作顺利开展。

### 3. 鼓励支持创业、创业带动就业

学校共青团牵头组织各级各类大学生创业比赛,培养大学生的创新意识、提升创新能力、掌握创新规律、探索创新方法。学生通过参加创业大赛,了解创业的过程,并培育、孵化具有发展潜力的创业项目,通过创业带动就业。

地方共青团组织城乡青年参加创业培训、提供创业贷款、进行创业指导,并结合青年个人兴趣爱好、技能专长培育、开发、孵化创业项目,通过创业带动就业。

## 参 考 文 献

- [1] 共青团一九八一年工作要点[EB/OL]. <http://www.gqt.org.cn/search/zuzhi/documents/1981/810116.htm>, 1981-01-16.
- [2] 共青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 新中国青年工作编年纪事(1949. 10-2012. 5)[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2:273.
- [3]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关于印发《共青团中央关于一九九〇年的工作要点》的通知[EB/OL]. <http://www.gqt.org.cn/search/zuzhi/documents/1990/900112.htm>, 1990-01-12.
- [4]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N]. 人民日报, 2007-10-25(1).

## The value analysis and path exploration of youth employment services carried out by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Yuan Xiaohui*

(Xi'an Institute of Translation Shaanxi Xi'an 710105)

**Abstract:** As a group organization of advanced young peopl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of China is a school for young people to lear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communism in practice. It is the Party's assistant and reserve army. The article studies and analyzes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s youth employment service work in multiple dimensions, explores that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is led by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and carries out youth employment services in four aspects of 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schools, employers and job-seeking youth from the three levels of internship,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and actively builds The three-dimensional youth employment guarantee model promotes the high-quality and full employment of the majority of young people.

**Key words:** Communist Youth League; Employment Services; Value Analysis; Path Exploration

【高职教育教学】

# 新中国职业教育“产教共生关系”的回顾与展望

孟亭含

(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4)

**摘要:**职业教育产教共生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具有跨界共生性、主体多样性、动态适应性和竞合并存性特征。新中国职业教育产教共生关系经历起步、探索、发展与共生四个阶段,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成效明显。但同时也存在保障体系不完善、行业组织指导职能弱化、企业育人动力不足等困境。为此,应从强化政策支撑体系,理顺市场、职业院校与产业间关系,突破教育系统“边缘—中心”桎梏,发挥行业组织协调作用等方面着手,打造互利共赢的职业教育产教共生生态圈。

**关键词:**产教共生关系;职业教育;历程演变;未来展望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885(2023)01-14-06

产教共生是一种将产业和教育、企业和学校相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也是基于各自利益需求在社会发展大背景下形成的交互关系。产教共生早在美国、德国、日本等制造业强国就有所发展,并深入影响职业教育和产业发展方方面面。反观我国,职业教育产教共生关系在理论与实践方面均处于探索阶段,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随着“中国制造2025”的提出,我国就业岗位对于人才需求尤为迫切,这对于职业教育产教共生提出更高要求。这一背景下,2021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将职业教育列为重点发展领域,并将深化产教共生、校企合作作为职业教育改革的重点之一。然而,就当前全国各地职业院校所形成的产教共生关系来看,政府、职业院校与企业等主体尚未就有关机制、模式达成统一认识,致使产教共生进程推

进缓慢。因此,本文试图深入探寻新中国产教共生关系演变历程,进一步厘清其未来发展方向,以促进职业教育产教共生关系向好发展。

## 一、职业教育“产教共生关系”的内涵及特征

### (一)职业教育“产教共生关系”的内涵

探究何为职业教育产教共生关系,首先应对产教共生概念有明确认识。周丙洋认为:产教共生是高职教育和产业体系即人才、智力、技术、资本、管理等资源要素的集聚融合,旨在打造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朱爱青认为,产教共生是学校和企业之间通过资源的有效融合,发挥出 $1+1>2$ 的人才培育效果。李彦青认为,产教共生是以产业需求为导向的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尽管学者们的研究视角不尽相同,但从其相关概念和界定中可以归纳

收稿日期:2022-10-21

基金项目:2021年度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高等职业学校学院—书院双载体育人模式探索与实践》(项目编号:2021SJGLX651)。

作者简介:孟亭含(1982-),女,河南开封人,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高职教育。

出“产教共生”的内涵,即“产教共生”是产业体系或某一企业与院校相互融合的过程,核心内涵是“融合”。

作为一种生态系统,产教共生不仅可以体现新时代教育理念,甚至影响并推动经济、社会等领域发展,教育领域也不例外。根据对“产教共生”内涵的剖析,结合职业教育自身发展特征,本研究将职业教育“产教共生关系”界定为两点:一是“产业”和“教育”相融合。“产业”由具有不同分工且彼此之间有利益关系的各行各业组成。“教育”的狭义一般指职业院校或高等院校中的教育活动或类型。“产业”和“教育”共生主要指各类产业系统与教育活动相融合的过程。在产教共生关系发展过程中,产业作为职业教育的支撑力量,为职业教育奠定深厚物质基础,职业教育则为产业健康发展创建良好环境,由此形成二者相耦合的产教共生方式。二是“企业”和“学校”相融合。传统意义而言,企业主要从事生产、经营与销售等活动,学校负责教书育人,其中任一主体均无法独自承担起培育创新型人才的重任。于此,企业和学校出现相融趋势,一定程度上拓展校企合作广度和深度。综合来说,职业教育产教共生是指教育和产业两个独立主体在互利共赢基础上形成的交互关系,两者相辅相成、协同促进。

## (二) 职业教育“产教共生关系”的特征

### 1. 跨界共生性

职业教育产教共生作为一项系统性工程,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涉及主体较为繁杂,牵扯面较广。具体表现为各主体齐头并进,在不同领域发挥各自优势,达到跨界共生目的。其中政府发挥引导和支持效应,把握产教共生关系的大致推进方向与整体进展情况。院校则不断改革教学模式与教学体系,促使师生适应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下的职业教育发展新模式。企业在参与教育教学过程中,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多方面支持。另外,各类专业培训机构、行业组织与社会性机构纷纷加入其中,促进产业与教育深度融合。由此可知,职业教育产教共生的跨界共生性特征较为明显,为教育活动顺利开展与产业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 2. 主体多样性

一方面,在产教共生关系构建过程中,共生主体的多样性特征日渐凸显。职业教育产教共生主体既有来自职业教育系统的院校与科研机构,也有

来自产业系统的第三方机构与企业,这成为促进产业系统与职业教育相融合的“润滑剂”。其中,企业是产业的外在表现形式,亦是行业基本构成单元,同时还是推动教育发展的主导力量。另一方面,同一类型主体也呈现多元化特征。纵观职业教育主体范畴,不仅有引领教育系统深化与演进的领军型院校,也有跟随领军型院校分享教育红利的新型职业院校。产业系统中既有行业龙头骨干企业引领产教共生关系发展,更有中小型企业分享和集聚产教创新资源。由此看来,产教共生关系的主体多样性便是将多样化资源、多样化主体与差异化利益进行汇聚,以此促进产教共生关系可持续发展。

### 3. 动态适应性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由若干物质组成,且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而产业和教育作为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时刻处于运动变化之中。伴随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企业时刻都在进行技术更迭与业态重整。具体来说,相关企业会主动调整人才培养框架与管理模式以适应教育发展需求,进行相应基础设施优化与升级。教育系统内主体也会依据自身产业链发展需求自动跃升到相应层级,调整人才培养目标与规格。可以看出,随着产业业态和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模式发生巨大改变,这决定着产教共生关系未来发展目标与方向。反之,职业教育发展对产业优化升级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影响产业变革进程和效率。因此,两者在共生中具有相互影响特点,这一影响效应总是处于动态变化与调整适应之中。

### 4. 竞合并存性

产教各主体处于各自生态位,为共生关系协同发展提供多样化资源。在此过程中,产业与职业院校之间均处于竞合状态。职业院校主体可为企业或其他机构提供技术成果、师资力量或人才储备等资源,使职业院校与企业可实时共享资源,进而在人才培养、课程设置、技能培训方面形成合作关系,提升职业教育教学水平。企业为职业院校提供管理经验、教学资源与实训场所,致使提供同质化产品或服务的企业之间开展竞争,这种竞争会随着时间和空间的交错逐渐延伸,形成互补性资源供企业共享。

## 二、新中国职业教育“产教共生关系”的回顾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出台一系列政策,大力

促进产业与职业教育协同发展,促使职业教育产教共生关系应运而生。其在发展过程中历经四个阶段,一定程度上推进校企合作,驱动各行各业快速发展。

#### (一) 行业框架下的产教起步阶段(1949 - 1985)

1949年12月,全国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确立了“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教育工作方针,意味着职业教育产教共生关系开始显现。为进一步推进国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使经济实现有计划、高效率发展,我国职业教育领域以“苏联模式”为样本,于1952年对全国教育进行调整,并组建企业院校以提高学生实践能力。这一模式旨在将职业教育与行业办学相结合,集中开展以经济建设、产业发展为主旨的教育事业,以此建立与计划经济协同发展的职业教育体系。次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快推进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若干意见》,强调职业院校必须与中央各级政府部门密切配合,有步骤对全国职业院校实行统一管理,明确各级部门对职业院校的分工管理。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正式规定“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指导思想。196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推进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中央各级政府部门与其他行业协会统一管理职业院校”。1979年,《国家劳动总局技工学校工作条例(试行)》成为首次以国家意志形式明确的产教耦合政策雏形,明确指出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学理论应紧密联系实际。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要“着重加快高等专科教育发展”。该文件的颁布意味着高等职业教育开始起步,产教融合也随之迈入全新领域。这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奠定政策基础,也标志着行业与院校联合办学逻辑初步形成。

#### (二) 学科逻辑下的产教探索阶段(1986 - 2011年)

1986年,受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影响,中共中央剔除政府“一揽子”办学模式,做出改革教育体制的重大决定。1991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正式从国家层面提出“产教结合”,为深入探索职业教育产教共生关系带来新机遇。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共教育改革发展纲要》,强调“提倡联合办学,走产教结合

道路”,逐步建立起政府主导、各行业协同办学的体制机制,一定程度上实现产教共生关系在不同领域的跨界互动。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颁布,首次规定“职业教育要与企业密切结合,培养实用型人才”,自此产教融合有了法律依据。2011年,《教育部关于推进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引领职业教育科学发展的若干意见》发布,提出高等职业教育需“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走产学研结合发展道路”。在此之后,各地方政府也陆续出台相关政策探寻产教共生之路,以更高层次推进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

#### (三) 产业逻辑下的产教发展阶段(2012 - 2016年)

2012年11月,时任教育部副部长鲁昕提出“深度构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机制”,既凸显出企业办学主体地位,也预示着职业教育产教共生关系进入新发展阶段。2013年,《教育部2013年工作要点》要求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同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深化产教融合。继职业教育产教共生关系发展的相关政策落地后,国务院于2014年发布《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强调发挥就业导向与政府引导作用,深化产教共生与校企合作;协调职业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步调,相应升级配套设施。这在凸显职业院校办学特色的同时,培养大量技能型人才。2015年10月,教育部联合财政部印发《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要求高等院校与职业院校将办学思路真正转到产教共生模式上。在此背景下,职业教育产教共生关系快速升温,而后国务院出台的各项教育政策均与产教共生相关,以期发挥产业与职业院校协同作用,增强产教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能力。

#### (四) 创新导向下的产教共生阶段(2017年至今)

2017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构建产教统筹发展格局,强化企业主体作用,构建校企合作长效机制,这意味着职业教育产教共生关系进入新发展阶段。值此背景,国家重新审视产教关系,推动新中国产教共生关系快速发展。此后,国家出台一系列措施深化产教融合,将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纳入同一发展框架,推动教育与产业协同创新发展。2019年《建

设产教融合型企业实施办法(试行)》《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与《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等国家政策密集出台,在确定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有同等地位的同时也明确提出“促进产教融合,校企‘双元’育人,校企共同研究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推动职业教育驶入全面发展阶段。党的二十大报告同样指出,“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使产教融合成为职业教育的基本办学模式。在不断实践探索过程中,产教关系逐渐深化,呈现“产教共生”“教育产业化”和“产学研合作”等新特点。这一时期的产教关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宏观层面的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国家重大战略布局间的关系,实际上是教育对社会经济的适应与超越问题;第二,中观层面即教育事业与产业发展存在一定程度脱钩,其核心在于职业院校学科设置与产业发展彼此间较难适应;第三,微观层面即教育教学活动与生产活动间的共生,衍生出人才链与创新链的协同关系,主要涉及职业院校与生产组织协同育人问题。总体上,我国职业教育在产教共生关系方面经历了多重阶段,实现产业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与行业需求、课程设置与生产过程间的精准对接。我国职业教育产教共生关系脉络演进总体上与国家工业化、市场经济需求紧密联系,实则是以经济领域为核心,重在调整政治、经济和教育三个领域,最终达到扩就业、促转型、培育新动能的经济效益。

### 三、新中国职业教育“产教共生关系”的实施困境

#### (一)政府:保障体系尚待完善

其一,产教共生的制度保障待完善。与国外相对成熟完善的政策保障体系相比,我国针对职业教育产教共生关系的政策法规尚显不足,仅在《职业教育法》中提及职业院校与企业的合作问题,内容相对有限,对于校企合作缺乏约束力。2009年,全国首部专门针对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地方性法规《宁波市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开始实施,随后北京、广西等地相继出台规章制度,但法律效力较低,地方政府各自为政,缺乏统一领导,促使产教共生仍停留在浅层次阶段。其二,产教共生的组织保障待构建。目前,诸多职业院校的产教共生还处于多方管理状态,缺乏专门性管理机构,致使各部门在推进、落实具体工作过程中难以形成协调一

致局面,延缓职业教育产教共生关系进一步发展。另外,我国职业院校尚缺乏科学的产教共生评价体系,更多针对教育教学展开评价,进一步弱化产教共生关系组织保障的支撑作用。

#### (二)行业组织:指导职能弱化

行业组织是职业院校与企业之间沟通的桥梁,具有集聚信息、促进交流、第三方监管等功能。以职业教育发达的德国为例,其行业协会占据重要地位,充当企业与学校相互合作的纽带,还会参与学校的决策、管理等事项。反观我国,由于文化环境差异,相关行业组织在参与职业教育产教共生方面的意识不强,未将自身看作产教共生关系中的一员,使产教共生的发展进步缺乏行业组织有效引导。除此之外,我国相关政策法规尚未明确规定行业组织在产教共生中的地位及作用,加之其本身不属于教育类机构,对职业教育的指导较为有限,滞缓产业与教学相融进程。在推进职业教育产教共生关系中,行业组织无法准确及时将企业需求反馈至学校,也无法将学校人才培养计划反馈给企业,指导职能进一步弱化,导致校企间交流较为单一,无法有效激发双方活力与动力。

#### (三)企业:育人动力不足

一方面,企业在产教共生中缺乏一定主动权。由于相关共生机制尚未完善,企业的职责更多在于为职业院校提供教育教学资源,相关决策权、管理权以及监督权存在缺失。这导致企业在产教共生关系中处于从属地位,育人动力相对不足,削弱职业教育产教共生关系。每年的毕业生“供大于求”,致使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中占据主动地位,不愿与职业院校展开合作。另一方面,企业参与共生建设的积极性不高。事实上,有效激励措施是激发企业参与产教共生过程的主要推动力量。然而现代教育体系中,企业对于产教共生关系的认知不足,参与融合的积极性不高,导致产教共生产生的效力无法达到预期效果。

#### (四)职业院校:教育“中心—边缘”结构失衡

20世纪70年代,阿特巴赫认为中心高校和边缘高校的特点分别为“影响力强”“依附性强”,这促使教育系统呈现“中心—边缘”化结构特征。就宏观层面而言,我国边缘职业院校在经济实力与科技水平方面存在较大缺口,故逐渐依附于中心职业院校。加之,边缘院校在经费支出、教学质量与学术产出等方面与中心院校存在较大差距,导致其在

产教共生过程中面临经费短缺、合作难以推进等现实困境。微观层面来说,边缘院校教师的学术威望较中心院校教师低,不易获得外部企业认可,更不易与企业展开深度合作。处于边缘院校的教师没有足够能力与意愿采取各项措施深化产教共生关系,导致产业与教育在职业院校内部的最后一公里尚未打通。

#### 四、新时代中国职业教育“产教共生关系”展望

纵观新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史,产教共生从来不只是教育与产业之间的单一从属关系,政府与行业组织在其中的作用也举足轻重。基于此,把教育放在可持续发展、共同利益的核心关切下,提出新时代促进我国产教共生关系的科学对策,以增强产教和谐共生,构建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 (一)健全保障机制:强化政策支撑体系

对于职业教育产教共生关系而言,完善的政策体系与法律保障是其健康运行的基础与前提。于此背景,诸多省份就深化产教共生关系出台政策文件,以期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例如,2023年1月,山东省教育厅等11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印发“金融+财政+土地+信用”产教融合10条激励措施的通知》,旨在有效激励企业参与产教融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产教共生关系纵深发展。2023年7月,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出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关于支持产教融合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为深化产教融合工作提供综合性、功能型支持。在此赋能下,首先,我国职业院校应完善《职业教育法》中的相关条例,围绕现代校企合作模式进行规范化调整,其中包括合作对象、企业职责、学校义务的规范。制定并完善对企业的激励制度,使企业可以积极参与到产教共生关系建设中。相关教育部门还应将完善配套法律政策体系纳入产教共生关系建设框架中,制定如《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等政策,加强政策对职业教育产教共生关系建设的支撑作用。其次,地方政府应加强对产教共生关系的制度建设。条件成熟的地方政府可借鉴中央政府经验,因地制宜加强本地产教共生的相关管理。条件不成熟的地方可以借鉴其他省市经验,先行先试相关制度试点,逐步推进职业教育产教共生朝更加完善、更加持续的方向发展。最后,职业院

校应牵头成立由教育部、资源部、人力部、财政部联合组成的产教共生指导委员会,统筹管理校企合作相关工作。此外,由于产教共生具有跨界性特征,教育相关部门可以据此制定校企联席会议制度,邀请当地企业代表、行业组织、教育专家参与产教共生关系探讨,以此促进校企进一步合作。

##### (二)寻求利益共同点:理顺市场、职业院校与产业间的关系

2023年1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指出推动产教深度融合需要政府、市场、企业与职业院校形成集聚优势,培养一大批服务于一线的技术技能人才,最终推动国家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转型升级。良好产教共生关系的构建,不是简单引入市场机制即可,需要在多方利益主体共同支持下实现产教共生关系的深刻变革。因此,若想构建真正意义上的职业教育产教共生关系,应充分激活企业与学校的参与积极性。首先,相关部门将企业与职业院校两者优势结合起来,找准职业院校定位,及时修正问题,设计出符合校企双方共赢的合作机制,增强产业与职业院校协同育人能力。具体来说,职业院校应致力于培育高素质人才,改善企业内部人力资源状况,提升产业竞争力。利用企业科研优势与科技成果,促进新生产力的形成,以此推动学校科研生产向企业化转移,理顺职业院校与产业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其次,促成市场与职业院校间的亲密关系。职业院校相关部门应加快开发校企合作课程,寻求市场教育资源配置需求,进而调整职业教育中关于产教共生关系的学科设置,使每一位学生参与到校企合作中,提高其实践能力与创新意识。最后,企业应加强与职业院校的合作,为师生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促使职业院校不断更新管理模式与育人机制,加强校企对产教共生关系的推动作用。搭建院校、企业与市场间的合作共享平台,寻求三方利益共同点,保证各主体与产教共生间的互惠互利关系。除此之外,职业院校还应将以服务社会经济发展为前提,发挥自身优势,增强服务企业、市场的意识与能力,争取在促进产教共生关系中占据有利位置。

##### (三)打破权利边界:突破“中心—边缘”结构桎梏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这为推动职业



教育现代化发展指明方向,也为职业教育突破权利边界奠定政策基础。基于此,第一,职业院校应主动融入区域创新体系。在国家政策体系驱动下,产教共生关系俨然成为边缘职业院校获取教学资源、提升教学质量的重要举措。职业院校应打破传统发展格局,借助市场经济优势,主动与中心院校进行交流合作,以开创适合边缘职业院校进行产教共生关系建设的新路径,打破“中心—边缘”的身份认知壁垒,促进人员双向流动,为协同推进校企合作提供有力支持。第二,重建产教共生的权力结构。当前,产教共生关系已与国家战略计划相媲美,对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但由于教育系统产教共生关系共同体中的权力分配不均衡,过度集中于政府一方,严重阻碍产教共生的权力结构优化。所以,政府在加强自身监管的同时,还应承担更广泛、更复杂的责任,加强对边缘市场领域与教育机构的监管,保障教育领域在边缘与中心处于相对公平状态。另外,各级政府应适时出台关于产教共生的政策保障体系,加强对政策实施过程中其他权力主体行为的监督与评价,避免因权力下放造成的政策偏离与失真。第三,发挥政府的顶层推动作用。在相关工作落实阶段,政府应凭借绝对物质资源与社会资源,确立职业教育产教共生所需经费,建立相应监督机制,引导和规范校企合作行为。配合企业监督职业院校使用经费情况,避免因经费问题导致校企合作出现矛盾。进一步,政府应设立校企合作基金项目,用于鼓励更多企业与行业组织

加入其中,并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宣传产教共生发展趋势,以吸引更多社会资源为职业教育产教共生关系发展建言献策。

#### (四)加强监管能力:发挥行业组织协调作用

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指出:要不断加强行业组织的指导协调能力,建立健全行业指导政策。为更好发挥行业组织在职业教育产教共生关系中的指导与协调作用,确立行业组织的监管地位,应从以下三方面入手。其一,将职业教育岗位培训、行业能力规范要求、人才资源市场需求、职业规划等纳入校企合作范围,在遵循“互惠互利”基础上由行业组织牵头,尽快制定增强产教共生关系的指导方案。在此过程中,行业组织应充分发挥协调组织作用,监管院校与企业的工作进展情况,确保校企合作顺利进行。其二,行业组织可自发进行联结,创办产教共生指导委员会,负责协调和管理校企合作相关事宜,推动产业和教育协同进步与发展。行业组织应主动承担起监督其他主体如企业代表、教师代表的责任,确保监管到位基础上促进职业教育产教进一步融合与共生。其三,行业组织应依托自身灵活性强、自治性高、网络化广优势,搭建产教共生平台,调配优质资源与人才,为校企合作提供更多创新性理念。职业院校应牵头建立校企间例会制度,保证校企双方在产教共生关系中能够及时沟通,培养双方对接产业与教育的能力,保障职业教育产教共生在实施过程中有章可循。

### 参 考 文 献

- [1] 王中教,顾永安. 建党一百年来我国高等教育“产教共生关系”的演变[J]. 江苏高教,2021(7).
- [2] 周丙洋. 共享发展视域下高职产教融合生态系统优化研究[J]. 教育与职业,2020(19).
- [3] 岳敏敏,董同强.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桎梏与导引——基于布迪厄的场域理论[J]. 职业技术教育,2021(1):5.
- [4] 李政,徐国庆. 我国职业教育治理结构转型:内涵,困境与突破[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
- [5] 董仁忠,朱晓洁,黄华. 2000年以来中国职业教育政策的经验与问题[J]. 职教论坛,2020(6).

## Review and Prospect of 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y and Educ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New China

Meng Tinghan

(Kaife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Culture and Arts, Kaifeng, Henan 475004)

(下转第 25 页)

【高职教育教学】

# 提升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论析

贾红霞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培训研修中心 陕西 西安 710119; 贵州开放大学 贵州 贵阳 550023)

**摘要:**在纷繁复杂的网络空间,面对多元化思想和多样化选择的情形,提升高校网络思政教育有效性不容忽视,运用网络载体优势促进高校思政改革是现实选择;建设多元网络平台,秉持思政教育价值目标,实现“内化与外化”并进,明确思政育人价值;建设良好网络生态,发挥网络的舆论引导力,提升师生数字化素养,加强网络思政工作管理;坚守网络传播安全阵地,解决网络传播新问题,抵御网络“不良”思想,变被动应对为主动疏导,发挥理论宣传育人功能;加强网络载体联动形成合力,提升各个平台受众黏性,从而提升网络思政课程的有效性。

**关键词:**高校;网络思政课程;有效性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885(2023)01-20-06

新时期,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全民性的普及,可以说网络已经变成人们生活的一部分,时时处处、人人都离不开网络。当代大学生更是网络“原著居民”和网络时代的弄潮儿,高校思政课如何把握时代脉搏,适应网络思政教育“新常态”,已成为高校思政教育改革不可回避的一个时代课题。活化网络学习生活“第一环境”,抓住网络教学“最大变量”,满足青年学生健康成长的需要。

## 一、运用网络载体优势,促进思政改革是现实“应然”选择

网络载体是一种大众传播的具体形式,具有独特的表征。一是信息的海量化和专门性,与传统媒体相比互联网信息容量无限,不受版面和播出时段的限制,传播的信息无所不包,涵盖人们生活的所有方面,覆盖全球用户。这就给思政课程教学提供

了丰富的教学信息资源,同时也有利于扩大思政课程教学教育的覆盖面。二是信息传播和更新的快捷性。在传播速度和更新周期上网络比传统媒体都快。用户可以瞬间获得信息,并且内容以分秒的时间进行更新,有利于教育者快捷方便地传递思政教育信息。网络信息声色俱全、图文并茂、动静结合,更能吸引人。这些特点可以提高思政课程教学传递的思政教育信息的影响力,有效拓展新的空间。三是传播方式的交互性。网络改变以往传统媒体单向传播信息的方式,为师生之间的双向互动交流传递思政教育观点和信息提升了效率,网络的交互式传播方式为两者的互动提供了技术条件,拓展了思政教育的空间。

(一)有利于高效便捷地传递思想和教学信息  
以网络为载体,扩大思政课程的教育覆盖面,增强思政教育吸引力,是思政教育发展的需要。随

收稿日期:2022-11-13

基金项目:2021年度贵州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青年项目“建党百年背景下构建贵州高校‘五育’培养体系的红色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21C03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贾红霞(1988-),女,山西运城人,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培训研修中心、陕西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贵州开放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着网民的增加,尤其是大学生群体的扩大,大学生主要依靠网络获取信息,而通过网络进行思政教育,不仅直接影响上网者,还对广大未上网者产生思想和行为的影响。与其他思政教育载体一起互相补充、相互作用,形成全方位立体的教育态势,大大增强思政教育的影响力和有效性。思政课教师充分利用网络高效便捷传递信息的特点,在第一时间把对现实热点问题引导性的观点、看法发布网络,与大学生进行互动交流;将民族精神教育、道德教育题材的电影、纪录片或短片载入网络,实现资源共享;通过在线消息平台及时向大学生发布学校或班级的纪律要求,随时随地开展教育。

### (二)有利于以丰富多彩的形式开展教学活动

为实现思政教育的现代化,创新载体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网络是最能体现时代发展要求和未来趋势的教育载体。网络传播更具时代特色,更能体现当代社会信息化网络的趋势,运用网络载体就是运用最先进的网络技术传播思政教育信息,开展教学活动,加快实现现代化的步伐。同时,会对其他方面的现代化实现产生重要影响。通过计算机终端,网络将大学生连接在一起,实现网络上各个个体间实时对话。教师以网络为载体和大学生即时互动提高时效性,网络以丰富多彩的形式展示传递信息,集众多媒介特点于一体。思政教师在网络上以丰富的表达方式赋予大学生要传递的教育信息。如在思政课的教学中以视频、文字加图片的形式展现,此表达方式代替了传统说教,帮助大学生理解和内化。

### (三)有利于教育者和大学生的平等双向互动

网络能够承载大量的信息是信息的载体,拥有全球最大的信息资源库。这种平等互动地进行信息交流交换,受到网民们的欢迎。网络信息资源以文字、图片、声音、音响等方式呈现给大学生,内容更是异彩纷呈,涵盖世界经济发展、国内外政治、国家方针政策,祖国大好河山、生活科技咨询等,大学生在网络虚拟世界里,自由浏览网页信息,自由发表各种观点,以平等身份获得知识和信息。大学生可以不受任何社会世俗观念的束缚,也不需威慑于任何权威,以一种放松的心态接收信息。同时每个人在网络上接收他人信息时也在向他人传递自己的信息,是一个互相传递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大学生就形成了对现存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的交流交锋,从而发展自己的认识水平。思政课程改革追求的理想教育状态就是实现信息交流双方的平等性和互动性。理想的教育状态是在宽松的环境下,

师生在观点的交流争锋中达成共识,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可见网络作为思政课程教育的载体,很好地服务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 二、建设多元网络平台,秉持内化于心的价值取向

### (一)搭建易班群课堂,融入易班平台学习

发挥高校“易班”平台建设,搭建易班群课堂,学生关心的热点问题和理论困惑进行答疑解惑,通过话题讨论和互动促进网络思政理论教育创新和网络舆论生态改善。以“易班”建设为依托,创新“互联网+大思政”工作,搭建高校思政网络课程优质资源,丰富思想、优化供给。扩大高校“易班”平台的推广与覆盖,促进校校合作、地校合作、地地合作,实现“易班”与各校校园网络有序衔接、有机结合,有效运行,为高校学生提供思想教育、教育教学、文化娱乐、信息咨询等一站式服务,开创高校思政课改革工作的新局面,筑牢网络育人阵地。充分发挥“易班”引领示范作用,着力增强校园网站的思想性、教育性、服务性、互动性,打造一批示范性学生网络互动社区、主题教育网站和思政课程教育资源网站,在“易班”开设思政课程不同章节的专栏专题,把握时、度、效,主动设置议题、疏导师生思想情绪,占领舆论制高点。

### (二)构筑QQ群课堂,丰富课堂授课形式

QQ社交软件已较早地进入大家的生活工作中,到目前功能比较齐全,认可度也较高,在疫情期间QQ群课堂是一款新开发的功能,由于其使用简便,操作简单,为网上授课提供了一定的便利,大家认可度较高。疫情期间网课替代了教室授课,课件投屏,课堂弹幕互动,学生实时分享等形式丰富了课堂授课形式。

网上优质资源共享在QQ群课堂,可以直观地投放给学生们,视频、图片、声音各种形式的教育资源,尤其是大学生慕课,各个名校名师的思政课,随时可以共享给同学们,引导同学们欣赏评析不同教师的授课风格,领略不同教师的风采,拓展学生们思考问题的广度。

QQ群课堂授课就是把现实课堂移植到网络,现实中教师学生间产生的物理空间教室搬移到了网络空间,不管在哪里进入网络课堂,就可以开始上课,不受物理位置的限制。少了师生间的眼神互动,主要还是靠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发挥主动学习的潜力,培养自律能力,也为今后终身学习奠定基

础和行为习惯。

### (三) 关注“外化”, 搭建平台推进载体建设

互联网时代, 运用“外化”思维, 持续推进网络平台载体的建设, 拉近与大学生的距离。网络载体拓展思想政治教育新空间, 充分抓住“两微一端”优势, 借助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的功能, 有效传播思想, 及时抢抓学生的注意力和关注点。如今抖音、快手等短而快的微视频应用也逐渐影响了学生们的互动交流方式, 通过师生“互粉”, 及时掌握学生思想动向和心理状态, 利用“评论”功能对学生发布的内容及时给予正面引导与评价。目前直播热也成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载体。

### (四) 突出“内化”, 促使学生自愿接受转化

网络思政教育的价值目标仍然是“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作为信息新载体的网络, 是最具革命性的技术成果, 网络与思政课程结合使得课程内容平面转为立体, 动静态兼具, 构建虚实融合的网络空间, 创新了思政课程传播知识和价值的方式与速度。目前一些高校兴起搭建载体和平台的热潮, 然而仅仅关注“外化”方面的加强, 实际效果远远不足。突出“内化”是提升网络思政课程有效性的关键, 内化就是让大学生自愿接受统治阶级的政治观点和思想, 依据社会道德来规范自身的行为准则, 影响个体的价值取向。在网络时代, 面临多元化的价值样态和多样化的自我需求, 强化了自我教育的地位, 所以内化作用显得更为重要。

积极打造思政课程网络空间, 大学生网民仍然具有网络社会中人的属性, 是思政课程建设网络空间内化的核心, 要把大学生网民的现实需求作为首要考量因素。坚持马克思关于“人是现实的人”的观点指导, 现实社会的大学生网民是网络社会和线下社会高度融合的现实的人。抓住网络内化的具体指向, 进一步丰富和深化思政课程的教育内容和研究对象。现在思政课程网络空间的打造和改革大多精心关注“外化”技术层面, 满足互动性和最佳效果的需要, 较少思考理论研究和文化精品产出, “内化”研究基础薄弱。因此思政教育内容应更加注重满足大学生网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引导大学生网民自我教育, 实现“寓教于乐”。

## 三、建设网络良好生态, 发挥网络引导舆论的作用

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 人们在享用互联网便利的同时, 也造成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互联网时

代呈现出大数据、社交媒体的兴起和网络社会化的三大新趋势, 在此基础上要实施澄清互联网内容事实、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网络思政教育工作队伍、培育网络意见领袖、警惕网络异化现象, 引导网络交往新风, 加强网络监管等举措来减少网络给思政教育带来的负面影响。

### (一) 加强属地管理, 构建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随着自媒体的纵深发展, 我们正处在一个“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传播者”的新传播时代。近年来新传播时代催生了一批“网红”。“网红”的发展经历了1.0的文字时代、2.0的图文时代和3.0的多媒体传播时代三个阶段。目前“网红”已经从个体行为转为群体现象。在这样的环境下, 一批批大学生主动地纷纷加入“网红”群体, 大学生“网红”呈现出追求目的多元化、类型多样化、成名方式多途径等特点。大学生“网红”既有积极影响, 也有明显的负面影响, 主要是挑战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不当价值观念和影响正常教学管理。因此, 通过加强“网红三观”教育、打造“正面网红”、孵化“正面网红”、强化安全管理等方式, 纠正“大学生网红”的不当言行, 重塑“大学生网红”的榜样形象, 使其在网络空间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者、示范者和推动者。另外需要加强网络监管, 建立高效有为的网络管理模式。加强思政网络管理, 为实现网络健康发展保驾护航。设置信息化建设办公室, 从组织、制度、经费及检测执行四个方面系统加强对信息化建设的管理监控力度。建设各级各类高校思政网络发展中心, 整合网络建设管理资源。

### (二) 师生共建高校思政网络空间, 提升数字化素养

净化网络舆论, 增强网络圈群话语权和引导力。身为互联网的“原著民”, 大学生群体在网络中形成集群行为。在新兴的社群模式下, 出现虚拟化的行为角色, 趣缘化的价值取向, “自我赋权”式的群体认知等新特点。网络社群空间, 需要重新审视主客体关系的变化、平台与要素的差异以及话语体系的建构。实践层面, 注意提升环境感知度, 聚合优质育人资源, 拓展第三课堂, 创作社群场景要素, 建立社群参与引导机制, 整合“社群流”等路径占领网络思政教育的新高地。网络圈群具有思想动态不易掌控、思想引导不易介入、思想发展不易引导的独有特点, 对有效开展思政教育形成了严峻的挑战。这些挑战要求我们首先要高度重视网络圈群,

思政教育在网络圈群中的话语权和引导力,净化网络舆论,为青年学生在网络中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 (三) 提升教师的数字化水平和教学能力

增强教师网络思政教育的意识。坚持思想先行,意识指导行为、指导实践。为提升高校网络思政教育载体的使用效率,教师首先要有运用互联网进行网络思政教育的意识。现在处于互联网信息时代,作为网络“土著”的大学生深受网络的影响,包括信息的传递、思想观的形成转变、行为习惯的养成等。所以急需把思政教育渗透到网络信息中,大学生在接触网络过程中同时接受思政教育,进而内化为道德认知,在实践中不断践行,养成良好的思想道德和行为习惯,最终形成相对稳定的思想政治品德。思政教师在认识到网络载体的重要作用后,树立起思政教育进网络的意识,主动迎接网络新挑战,创造性运用健康向上的思政教育的内容来武装网络空间。

提高教师的数字化素养。拥有一定的网络知识和技术,具备一定的数字化素养是充分利用网络载体的前提条件,数字化素养是网络对网民提出的基本要求,也是大学生网络思政教育的目的之一。教育者必先受教育,思政教师要求大学生具备数字化素养首先自己要先具备。高校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提升数字化素养如:不定期举办相关讲座,讲解如何运用的基本知识,学习新软件新平台的使用,解答运用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等;还可以组织思政教师不定期开展各种交流会,交流网络运用的经验,示范网络运用的操作。此外,思政教师还要有较强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辨别力。正确分辨不良信息、错误思潮,有效分析网络信息对学生思想可能产生的影响,引导学生理性认识,提升学生抵制各种不良信息的能力。教师可以通过E-mail、网络博客、组建QQ群、参与网上论坛等方式,及时关注网络舆情,及时有针对性地开展学习、生活、思想的交流,帮助其解决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注意网内网外思政教育的联动。网络思政是一种现实虚拟共存的生存形态,存在网内网外两个世界。网内思想是网外生活的现实反映,网外生活是网内观点的客观来源。思政教师要清醒认识网内网外两个世界的相关性,实现网内网外的联动。网络思政教育的成果在网外的日常生活得到巩固,通过网络形式可以解决那些不直接以网络形式出现的思想认识问题。从而在网内网外思想碰撞中形成正确的理性的认识。在微时代背景下,我们需

要线上线下相结合形成合力。

## 四、坚守网络安全阵地,提升高校网络思政课程有效性

高校既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摇篮,又是网络传播思想文化的重要阵地。新形势下,高校需要发挥阵地作用,创新网络建设、管理、安全和教育工作,创新互联网思政教育工作载体,加强高校思想宣传工作。

(一) 守好“线上+线下”两个阵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

建设网络良好生态,发挥网络引导舆论作用。网络生态建设是适应网络化、信息化发展要求的题中之义。在网络世界中,人们固有的概念和规则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网络的交流互动、数字化和全球化,高校思政教育面临着充满机遇、挑战和不确定性的新局面,发生了深刻全面的变化。网络在阵地建设、舆论引导和管理民主方面对思政教育颇有价值,但也在人类信息处理能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性、大学生群体特征和理想信念的价值性之间存在矛盾。所以要在网络背景下建构平台、管控舆情、培养技能、协调关系,保障大学生思政教育顺利进行。

主动介入和占领网络阵地,构建网络话语掌握主动权。思政教育活动中互联网改变了原先的传统环境和实践发展状态,思政教育话语权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所以要主动介入和占领网络阵地,构建网络话语权,掌握主动权。重建和发挥思政教育话语权的影响力,大学生常用网络话语表达对社会事件和校园现象的看法,但是不能理性客观地运用网络话语表达对某些敏感政治事件的观点。因此,思政教育话语对接大学生网络话语不仅是解决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网络传播困境的现实途径,更是提升高校网络思政教育实效性的客观需要。发挥网络舆情无法比拟的价值,有效开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把握舆情传播特性和规律,形塑执政党和政府的主流意识形态,维护社会稳定,营造良好的政治环境。而话语权的掌握取决于受众对话语接受和认可,影响因素有受众的基本内涵、心理特点和价值诉求。使用生活化富有时代性的话语沟通模式,增强教育价值的科学性,凸显学科人文性,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占据高校网络思政教育话语权。

(二) 自觉抵御网络不良思想,变被动应对为主动疏导

用先进文化占领网络思想阵地是网络发展的

迫切要求。随着互联网的全面覆盖,受众面扩大,网络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思想阵地,其影响也越来越大。为了避免“黑色文化”“黄色文化”在网上大行其道,就需要用先进文化占领网络阵地。所以思政教育须快速进入网络,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导的先进文化、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核心的先进文化占领网络思政教育阵地。

网络思政教育的本质就是用思想来影响和掌握教育对象。高校思政课的内容采取贴近大学生生活实际的内容,对大学生开展理想信念、爱国主义、道德法治、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时多采用情绪感染、情感体验的方式,实现大学生价值观念的认同。运用主流意识形态引导舆论,以此削弱网络群体极化现象,透视纷繁复杂的网络观点,挖掘价值冲突背后网民的真实需求。同时避免“碎片化”的信息传递,在传播渠道、传播时空、观点立场等方面改变网络舆论碎片化状态,注意知识的系统性,观点的理论性和内容的科学化。

(三)加强网络载体联动,提升高校思政教育受众黏性。

顺应网络“新常态”,提升多种网络载体合力,让多种网络载体形态由扁平化转向整合化。随着网络和多媒体的快速发展,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发挥作用的方式也跟着发生巨大转变,逐渐改变由原来的扁平化、单一化的载体形态向立体化、综合化整合。网络技术工具的更新换代,推动不同类型的载体进行整合,增强各自功能之间的整合效应,实现不同载体的合力最大化,可以在系统运作,整体协调,融合渗透方面开展。整合网络载体联动性,突出其鲜明的数字化和信息化的特征,实现声图并茂,动静结合,多维立体的表现形式,增强思政课生动性,转变以往单一传输思政教育内容,更多实现

多面性传输教育信息。

增加人文情怀,加强网络载体联动,提升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受众黏性。在经济领域兴起的“互联网+”的“重视用户体验”之风提醒我们在开展网络思政教育时注重载体和内容的契合性,重视与教育对象的贴切性,重视与教育实效挂钩。从而实现由冷漠冰凉的工具向人本价值转化,转向有生命力的教育,规避载体机械工具论。以关注教育对象的内在需求,重视倾听教育对象的心声,以人为本走兼具人文情怀的路线。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兼具理论和社会实践双重属性,本身的学科属性就是如何做人的工作,强调的“现实社会的人”,就是处在社会实践中一切社会关系中的人,是全面发展的人。一切社会关系既包括现实社会关系中的,也包括虚拟社会中的关系。从根本上说,思政教育关注人本身的发展,内在包含着深厚的人文关怀;形式服务于内容,网络载体服务有生命力的人的思政工作,就需要坚持道德,充满人文关怀,反对赤裸裸的工具形式,转变冷漠无温度的机械介质为情感丰富互动交流的转换。

我国各类高校结合本校实际,紧跟时代要求,新建自己的校园网站和非官方平台,但是各个论坛、主流网络平台基本是各自为政的运行模式,校级之间交流较少,受众群体主要在本校。难以形成受众黏性,推出内容零散杂乱不成系统,各个载体和平台之间缺少链接点。而互联网的发展使得载体平台形成协调和联动成为可能,伴随“互联网+教育”产业生态的迅猛发展,出现了形式多样的教育机构、在线直播视频教学等。同时依靠客户端的方式聚敛大规模流量,并在后台对数据进行实时管理,实时数据共享,打破信息交流障碍,重构并融合各个平台,实现资源要素多向流动。

### 参 考 文 献

- [1] 冯刚;王树荫.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热点年度发布 2017 版, [M] 团结出版社, 2018. 02.  
 [2] 唐登蓉;吴满意;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历程、问题与转向[J], 思想理论教育, 2017.  
 [3] 吴健;丁德智. 对大数据条件下创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几点思考[J], 学校党建教育, 2017 年第 1 期.

##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onlin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Jia Hongxia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119; Guizhou Open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550023)

**Abstract:** In the face of diversified thoughts and diversified choices, it is a realistic choice to promote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n the Interne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use the advantage of network carriers to promote the re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n the Interne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build a multi-network platform, to promote the re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n the Interne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promote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n the Interne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promote the re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n the Interne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promote the re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n Adhering to the value goal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alizing the simultaneous development of "Internalization and externalization", clarifying the valu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uilding a good network ecology,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guidance of public opinion on the network, and improving the digital literacy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of network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stick to the safe position of network communication, solve the new problems of network communication, resist the "Bad" thought of network, change the passive response to active guidance, play the role of theoretical propaganda and education; Strengthen the network carrier linkage to form the resultant force, enhance the audience stickiness of each platform, thus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network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Key words:** University; network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effectiveness

---

(上接第 19 页)

**Abstract:** The symbiosis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the produ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ociety to a certain stage. I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ross-border symbiosis, subject diversity, dynamic adaptability and competitive merger. In New China, 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y and educ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has experienced four stages, including starting, exploration, development and symbiosis, and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in promoting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y and educ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 is facing some difficulties, such as imperfect security system, weakening the guiding function of industry organizations, lack of motivation for enterprise education and so o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policy support system, straighten 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rket,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industries, break through the shackles of the "edge center" of the education system,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coordination role of industry organizations, so as to create a mutually beneficial and win-win symbiotic ecosystem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Key words:**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y and education; vocational education; history evolution; innovation path

【高职教育教学】

# 地方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实践探析

杨曼 谢安国

(安康学院 陕西 安康 725000)

**摘要:**红色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形成和凝聚的革命精神及物质载体,具有丰富的政治内涵、精神内涵和文化内涵。地方红色资源中因蕴含着深刻的理想信念、爱国情怀、奋斗精神等,彰显了高校思政课的功能和价值。将地方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引导大学生在理论认知中增强信心、在实践体验中历练决心、在感悟文化中坚守初心。

**关键词:**地方红色资源;思政课教学;实践探析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885(2023)01-26-04

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提出:“思政课的实质是讲道理,要注重方式方法,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老师要用心教,学生要用心悟,达到沟通心灵、启智润心、激扬斗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阐明了思政课对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作用,指明了新时代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的的方向目标。地方红色资源内容生动、场景鲜活、案例丰富,是实现讲道理与讲故事有机结合的重要载体。如何将地方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进而提升思政课吸引力和感染力,实现把道理讲“活”,是地方高校思政课建设需探索回答的时代命题。

## 一、地方红色资源内涵

红色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形成和凝聚的革命精神及其物质载体。地方红色资源即将红色资源在地理

范围上予以限定的具有鲜明地方属性和地域特色的一类。

### (一)政治内涵

地方红色文化资源作为党领导当地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过程中鲜活的历史记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主张、指导思想和使命担当。其生成的历史轨迹是沿着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历史主线,围绕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使命逐渐形成并保存的物质形态活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论是革命战争年代的遗物、遗址等历史遗存,还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新时代的纪念碑、纪念馆、陈列馆,甚至是文献、诗歌、歌谣等非物质文化形态资源,都展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建设新中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波澜壮阔历史篇章,具有鲜明的政治内涵。

收稿日期:2022-11-5

基金项目:2021年度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项一般项目“运用地方红色资源提升高校思政课教学效果实证研究”(21JDSZK076)。

作者简介:杨曼(1991-),女,陕西镇坪人,安康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谢安国(1963-),男,陕西汉阴人,安康学院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 (二) 精神内涵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过程中,孕育了许多不同时代特征的革命精神。1939年2月,由于敌人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党中央和红军在延安面临日益严峻的经济困难局面。为此,毛泽东写下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八个大字,成为根据地军民攻坚克难、坚持抗战的精神动力。解放后,该口号始终是党和政府鼓励进行生产自救的行动号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大力弘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无论我们将来物质生活多么丰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一定不能丢,脚踏实地、苦干实干,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照金精神、沂蒙精神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雷锋精神、红旗渠精神、西迁精神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改革开放精神、抗洪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脱贫攻坚精神、科学家精神、探月精神等;这些精神融入在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并不断在斗争中淬炼、在淬炼中成长、在成长中传承、在传承中发扬。这些精神并不是孤立存在于人们思想中,也不能仅仅依靠意识形态传承发扬,而是通过红色资源中物质实体或非物质载体不断向人们展示这些精神形成的时代背景和生动内容。红色资源也因承载着丰富的精神内涵而更具跨越时空的生命力。

## (三) 文化内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波澜壮阔的伟大篇章,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红色资源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的历史实证。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弘扬者和建设者,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每一历史阶段都自觉肩负起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比如,中国传统文化中“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被实践证明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内核才是国家长

治久安的关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渗透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阶段;中华文明崇尚的“天人合一”境界时刻提醒着不论社会发展到什么阶段都要对自然心存敬畏,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些文化内涵都在鲜活的地方红色资源中得到传承和升华。

## 二、地方红色资源与高校思政课的内涵融通

地方红色资源中因蕴含着深刻的理想信念、爱国情怀、奋斗精神等,与高校思想政治课之间有着高度关联性,彰显了思政课的功能和价值。

(一) 地方红色资源承载着思政课的政治引领作用

高校思政课本质上就是对大学生进行政治引领,坚定大学生的政治观念,帮助大学生树立坚定的政治立场。“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这一时期心智逐渐健全,思维进入最活跃状态,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只有抓住这一“关键时期”对青少年加以正确引导和精心培育,才能使其在以后的漫漫人生路上行稳致远。因此,思政课也可以说是“铸魂课”,即通过教学筑牢广大青年大学生的理想信念之“魂”,引导大学生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努力把个人幸福与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相联系,把个人理想与国家人民的共同理想相统一,增强时代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回顾社会主义思想史的浩瀚星空,可以发现坚定理想信念追求的重要意义。从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家托马斯·莫尔,到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里叶、欧文,再到科学社会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再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共产党人,他们的一生胸怀崇高理想、始终秉持为人类解放而不懈奋斗的初心和志向。思政课就是要教育引导广大青年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不断推进为崇高理想奋斗的伟大实践。在宝贵的地方红色资源库中,从“愚公”李保国到“樵夫”廖俊波,从“燃灯者”邹碧华到老英雄张富清,他们的事迹继续书写着共产党人无私奉献、不改初心的优秀品格,生动体现了共产党员的纯粹理想信念,具有深刻的教育涵义。

(二) 地方红色资源体现着思政课的价值引领作用

思政课无论怎么讲,最终都要落到引导学生树

立正确的价值观念上来。思政课不能标榜“价值中立”,脱离了价值判断和价值导向,教学就苍白无力,难以打动人。实现好思政课的价值塑造功能,就要旗帜鲜明地宣扬正确的价值观、反对错误的价值观,找到与学生情感交流的碰撞点、价值融通的契合点,用温度和情怀感染学生。我们党从苦难走向辉煌、从弱小走向强大、从胜利走向新胜利的“精神密码”就是一以贯之坚守初心。在中共一大会址,可以看到董必武亲笔题词“作始也简,将毕也钜”,也可以直观感受到共产主义事业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有毅力、有信心,善始善终地争取革命的最后胜利。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用好红色资源,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将地方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课,有助于更好引导广大青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 (三) 地方红色资源蕴含思政课道德引领作用

思政课的特殊重要性是由教育的性质和育人目标所决定的,也是由思政课自身的特殊性质和功能决定的,因为思政课不仅关系学生的个人成长成才,更关系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的大问题。对青年大学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可以有多种途径和方式,但思政课作为一门理论化、系统化、科学化的思想道德教育形态,在青少年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正确养成与发展过程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对其他德育教育起着引领作用。地方红色资源蕴含着丰富的道德养分,红色文化镌刻着中国共产党人坚守初心、忠于人民、艰苦奋斗、无私奉献、锐意进取的崇高精神品质和高尚的人格魅力,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脉相通,蕴含着丰富的德育内容。用地方鲜活的革命先进人物和革命故事蕴含的道德文化、价值追求教育感化学生,有助于提高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情操和道德水平,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栋梁之材。在延安市枣园《为人民服务》讲话纪念广场,张思德雕像屹立中央,“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生动地讲述着张思德为人民谋利益勇于牺牲精神和共产主义崇高品德,也激励着新时代无数个前往瞻仰的“张思德”沿着榜样模仿的道路坚毅前行。

## 三、地方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课实践探析

高校思政课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重要阵地,也是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核心课程。地方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要从学生的实际出发,结合思政课内容进行延伸或引证;要从教学实际需要,采取案例教学或实践教学。要引导大学生在理论认知中增强信心、在实践体验中历练决心、在感悟文化中坚守初心。

### (一) 在强化理论认知中增强信心

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是思政课的基本功能,其中“知识是载体,价值是目的,要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之中”。所谓知识传授,即科学理论的有效传输和学生认知,重在知识认知;所谓价值引领,即科学理论的有效灌输和社会认同,重在价值认同。一方面,使受教育者掌握特定的知识与技能是任何一门课程的基本目标,思政课也不例外,重在向学生传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知识,这是思政课的根基所在,也是价值引领功能发挥的重要前提。另一方面,鲜明的意识形态性决定了思政课代表着特定的政治倾向和价值立场,也决定了教学的根本目标在于培养学生具备一定的政治知识、政治素养和政治立场,坚定理想信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是思政课的根本旨归,也是对知识传授功能的升华。就学科属性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来说,思政课的功能绝不是进行单纯的知识传授,而是致力于价值观的塑造和理想信念的确立,这是一种更高的要求 and 更艰巨的任务。

以《思想道德与法治》第一章“领悟人生真谛 把握人生方向”为例,强调大学生要“正确看待苦与乐。苦与乐既对立又统一,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相互转化……在成长过程中,同学们要准确把握苦与乐的辩证关系,努力做迎难而上、艰苦奋斗的开拓者。”教材中引证红军长征事例来说明苦与乐的辩证统一关系。在教学设计上,这一知识点延伸时恰好可以引入地方红色资源安康白河县“三苦精神”予以阐述。以“领导苦抓、干部苦帮、群众苦干”为核心的安康白河县“三苦”精神,自上世纪70年代萌芽,历经四十多年的发展演变,现如今已走向全省乃至全国。“从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的‘穷山沟’,‘变身’为欣欣向荣的‘聚宝盆’;从不适

宜居住的地方,‘变身’为幸福宜居之地,安康市白河县‘三苦’精神的传承与发展中,用奋斗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实现了一次又一次跨越。”不仅生动地描绘出由“苦”变“乐”的国家级贫困县蝶变之路,更充分阐释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伟大实践。这样的教学设计目的在于以生动的案例、身边的故事教育引导广大青年学生深刻把握“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自觉做到“两个维护”,实现在理论认知中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

### (二) 在实践体验中历练决心

“教无定法,贵在得法”,其中“法”指的是一般意义的“教学方法”。这句话旨在强调教学活动的灵活性和教学方法的多样性,强调了教学方法因人制宜、因事制宜的一面。在教学方法层面,习近平对讲好思政课有诸多论述。既有直接提到的方法,如理论灌输法、讨论教学法;还有间接蕴含的方法,如“好的思政课像盐”体现了隐性教育法、“讲好中国故事”蕴含了叙事教育法、“好老师要有仁爱之心”继承了传统德育方法、“既要有惊涛拍岸的气势,又要润物无声”体现了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的统一方法。“八个相统一”也蕴含着理论教育法、引导教育法、启发式教育等。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指出“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其中,“因事”“因时”“因势”三个词更是精辟概括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规律性、时代性、创新性的内在特征,而“化”“进”“新”三个字则指明了“在改进中加强”思政课教学的方法论指引。

实践体验是地方高校思政课建设过程中应着重开发的部分。将地方红色资源结合教学内容开展实践体验教学,能够实现抽象道理形象化表达的目的,使学生在听课过程中眼前有画面感、心中有使命感,实现见人见事见理论的教学效果。《思想道德与法治》第二章“追求远大理想 坚定理想信念”中讲到信念特征时这样描述“信念是一个人经受实践考验而能始终坚守理想的精神力量。任何一种理想的实现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波折,人必须有坚定不移的决心和坚

忍不拔的意志,才能不断战胜困难,把理想变为现实。”在教学设计中,将发生在安康的牛蹄岭战役为主题进行实践体验式教学更具说服力和吸引力。当行走在巍峨起伏牛蹄岭,亲历当年战争掩体、战壕等遗迹,瞻仰着牛蹄岭战斗纪念,无一不诉说着气壮山河的鲜活历史。站在这曾被烈士鲜血染红的土地上,以实践体验融入思政课教学,有助于广大青年深刻理解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坚定信念,激励青年不懈奋斗、迈向新的征程。

### (三) 在感悟文化中坚守初心

“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党带领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锻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思政课建设提供了深厚力量。”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思政课建设,“思政课建设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系列规律性认识和成功经验,为思政课建设守正创新提供了重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善于用历史思维分析学校思政课建设,指出党在历史上的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都开设了相关课程,取得了成功经验。新时代思政课建设,应发挥红色文化与思政课程融入式、嵌入式、渗入式的立德树人协同效应。

《思想道德与法治》第四章“明确价值要求 践行价值准则”,阐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个人层面时强调要正确处理国家、社会、他人的关系。其中蕴含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内容与安康地方红色文化“汉阴沈氏家训”内核一致、相互融通。《沈氏家训》共计20条1933字,讲修身、重耕读、讲礼仪、严教子,是沈氏族人的传家宝,成为陕南地区传统家规的典范。从内容看,《沈氏家训》涉及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各个方面。就表述形式看,其中既有治家处世的经验传授,也有儒家先贤教导的汇编;既有苦口婆心的规劝,也有道德律令的简明训示。同时,《沈氏家训》文朴义丰,情理交融,既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也容易为家族成员记诵和理解。安康境内汉阴县19世纪末诞生了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三兄弟,三沈昆仲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和教育领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沈氏三兄弟的身上,集中体现出勤勉的学风、开阔的眼界、科学的精神、高尚的人格、爱国的情怀。

(下转第36页)

【高职教育教学】

# 媒介素养“赋能”高职院校思政教学:困厄与策略

王瑞华

(铁道警察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53)

**摘要:**媒介素养作为新媒体、融媒体时代下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在高职院校思政教学实践过程中发挥着积极的引领、协同、融合作用。然而,当前思政教学实践仍面临信息驳杂消解大学生思政教学认同感、碎片化信息冲击思政教学宏大叙事性、泛娱乐化削弱思政教学话语权、后喻文化考验思政教育者权威性等问题,不利于媒介素养推动思政教学工作走深走实。为此,高职院校需要明确“媒介+思政”教学规则,筑牢教育者思想阵地;创新“媒介+思政”工作平台,凸显传统思政教学优势;形塑“媒介+思政”教学模式,深化思政教学主导地位;升维“媒介+思政”教学模式,增强教育者话语权威。

**关键词:**媒介素养;高职院校;思政教育;教育教学

**中图分类号:**G7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885(2023)01-30-07

上世纪80年代,学者 Robert J. Graham 将媒介素养定义为“人们在解决问题时运用信息的技能”。随着信息化浪潮与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媒介素养的概念意涵、应用场景日渐丰富,对于教学实践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与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高职院校肩负着将思政教学放进学生“口袋”里,让思政工作“活”起来的重任。高校可探索以媒介素养赋能思政教学实践的路径机制,实现媒介素养与高职院校思政教学有机融合。这不仅有利于从宏观上提升思政教学水平的科学性与有效性,还可以在微观上优化思政教学供给的传播到达率与学生接受度。从媒介素养出发研判高职院校思政教

学发展,助推思政教学工作“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为当代思政教学实践深化沿革与深入发展提供富有现实意义的参考。

## 一、媒介素养“赋能”高职院校思政教学的价值取向

(一)引领:丰富思政话语阐释,解答时代问题

立足于新时代时间节点,媒介素养视阈下的思政教学实践可紧扣时代特征、把握发展脉搏、洞悉前进方向,以多元媒介与多重渠道为高职院校学生提供思想引领与精神导向。一方面,铸牢“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媒介素养下的思政教学可充分发挥其高传播、高到达、高影响特点,夯实“00后”大学生群体马克思主义信仰。这一范式摒弃传统思政教学模式中“庙堂式”话语表达,通过切近传播方

收稿日期:2022-11-21

基金项目:铁道警察学院2021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经费项目《心理学视角下课程思政的植入策略研究》(课题编号:2021TJJBKY029);铁道警察学院2021年校级课程思政样板课程侦查学(211123)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王瑞华(1979-),女,河南开封人,铁道警察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刑事诉讼法、侦查学。

式和精密教学设计传达思政内容。高职院校作为学生思想政治教学的开展主体,应将媒介与教学有机相融。学校通过对既有思政课程内容的同构与解构,优化思政传播语态,实现“立德树人”。另一方面,增强“问题意识”引导能力。当下,高校学生已不再置身于传统意义上的“象牙塔”,与社会联结日趋紧密。在享受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利好的同时,学生也因身处社会转型期,目睹社会矛盾、经历现实问题而产生诸多困惑和迷茫。在此背景下,高校推进具备较高媒介素养的思政教学,可以通过高效平台、适宜语态引导大学生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认知中国、研判世界。由此,思政教学可培养学生兼具人民立场、民族责任与国际视野,强化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性认同与情感认同。且该方式有利于实现思政教学铸魂育人使命,也有利于学生深刻理解当前面临的时代课题。

### (二)协同:强调学生主体地位,提振教学成效

教育是一种关系范畴,思政教学效果有赖于师生双方的高效沟通与充分互动。习近平总书记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中指出,高校思政教学工作需注重培养学生主体性。高职院校在媒介素养的加持下,从教学实践与学习实践两方面突出体现了学生主体地位。就教师视角而言,内蕴较高媒介素养的思政课程可采用生动形象表达、丰富多样媒介,引导学生对于思政理论、社会议题进行深入思考与深刻关切。媒介素养下的多维教学实践使得直接与间接结合、显性与隐性协同,形塑了思政教师在教学中的“引导者”角色。就学生视角而言,当代大学生主体观念日渐增强,不愿囿于被动接受理论与观念灌输,对学习过程中的师生平等交流与探讨有着较高期待。媒介素养下的高职院校思政教学可以凭借较强互动性、较高沟通度,促使思政教学过程摒弃既往“独白式”教学语态,使学生这一传统意义上教学客体呈现出其内在主体性。并且,“单边灌输”向“互动研讨”流变是媒介素养加持下学生主体性体现的重要向度。高职院校思政教学可借助媒介为师生建构平等高效对话机制,在师生话语共同体中突出学生主体地位,有力提升教学成效、提升教学水平。同时,这一思政教学模式也可促使教师主导性与学生主体性实现有机协同,推动“大思政”格局建设。

### (三)融合:形塑多元传播渠道,增强参与体验

互联网对当前大学生的学习与生活形成强大渗透,成为学生获取思政信息的关键渠道。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中强调,应利用新媒体、新渠道与新技术让思政教学工作“活起来”。媒介素养视阈下的思政教学,可以通过多元传播渠道的教学实践使得前沿媒介技术与思政工作传统优势有机协同,使思政教学工作紧扣时代脉搏、形成更强感召。从教学渠道而言,具备较高媒介素养的思政教学可以创新在线教学模式,促使既有思政教学方法与新兴媒介平台、前沿信息技术深度交融。在新媒体、自媒体与融媒体加持下,思政教育工作者可展开微课、慕课、图文教程等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形式多元、内容丰富的传播渠道体现出媒介素养下思政教学的流变与发展。从实践平台而言,媒介素养视阈下的思政教学可通过馆藏思政信息资源与当地红色文化积淀等校内外实践渠道,引导学生参与思政学习实践、增强现实感知体验。此外,VR、AR等前沿媒介技术,可以为学生思政实践提供“离场介入”的可能,即异地还原参与体验,为学生思政学习实践提供更多平台。媒介素养视阈下的高职院校思政教学可经多元传播渠道,扩展学生实践参与,增强学生对于思政知识的理性认识与感性体验,牢牢把握网络新阵地的思政话语权。

## 二、媒介素养“赋能”高职院校思政教学的实践状况

### (一)教学内容不断扩充,实现深度研判

高媒介素养下的高职院校思政教学,从不同视角增加思政教育信息有效供给,通过微观建设与宏观议题两大方向扩充思政教学内容的内涵与外延。就微观建设来看,国内诸多高校深耕高媒介素养下的高校文化建设,牢牢把握校庆纪念、开学典礼、毕业典礼、讲座论坛等重大活动契机,进行思政元素挖掘与素材积累,使得思政教学建设驰而不息。例如,天津滨海职业学院60周年校庆纪念日的线上传播,便以“云归滨海”为主题,校友联合社会组织筹办“弘扬五四精神,争当时代楷模”系列纪念活动。深厚媒介素养、丰富文化内容取得了良好思想政治影响。就宏观议题来看,媒介素养下高校思政教学在“好瓶装好酒”的沿革发展进程中获得诸多

实效,通过着眼于小切口,以贴近学生视角、具有现实关照的语态与叙事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融于其间。从浴血奋战的新中国建立到春意盎然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政要点与理念在媒介素养加持下得到充分诠释与深入教学。媒介素养赋能下的思政教学具备充实教学内容、透彻现实剖析,为推进新形势下思政工作提供坚实基础。

#### (二)教学平台不断拓宽,实现渠道共振

高职院校思政教学在媒介素养赋能下,实现教学平台持续延伸,视频、阅读多渠道协同发力。一方面,视频平台契合学生信息获取习惯,推动思政信息传播取得良好收效。学习强国、超星学习通、钉钉等移动端应用在学校常规思政教学中应用广泛;慕课、网易公开课、万门大学、微信读书等应用则在学生课外自学场景下有着较高使用频次,切实延伸了思政教学的平台范围与应用实践。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在中国大学 MOOC 平台开设多门思政类课程,平均播放量均已过千,这一幕课平台实践仅是一个缩影。据教育部统计数据可知,截至 2020 年 10 月,国内高校自主搭建的慕课类视频教学平台已逾 10 个,来自 470 余所高校的 3300 多门课程已经上线。以慕课平台为代表的高媒介素养型思政教学已走在国际前沿。另一方面,阅读平台符合深度内容传播逻辑,推动思政教学走深走实。以微信读书为例,平台涵盖《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学生自主学习手册(第六版)》类紧密联系思政教学实践的配套辅导书目以及“泛思政”读物。此外,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组织“光明微教育”主题活动,借助线下馆藏资源与线上读书平台,将思政教学工作引向纵深。媒介素养视阈下的高职院校思政教学,高效实现视频与阅读、影音与文字的渠道协同,让诸多平台成为思政教学的新高地。

#### (三)教学手段不断创新,实现融媒传播

媒介素养视阈下的高职院校思政教学衍生出多维度、多场景教学手段,在融媒体生产环境中取得不俗反响。一是图文思政教学。对于受众来说,文字阅读需要投入大量注意力,理解成本较高。部分高校创新运用媒介手段,借助微信公众号图文形式,“以图促文”纾解阅读压力,开展思政教学。例如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自主运营公众号“课堂派”,组织学生分组进行时事政治的素材采集、推送

制作与观点讨论。二是音频思政教学。在快节奏生活背景下,听音频这种伴随式信息获取方式逐渐获得学生群体青睐。诸多高校入驻喜马拉雅、荔枝 FM 等音频平台以及得到等学习平台,制作并发布思政类课程,使学生可以利用碎片时间获取思政信息。三是短视频思政教学。短视频通过具象化、贴近化手段为学生传授理论性极强的思政内容,在高职院校思政教学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例如中国青年报社于 2019 年主办了以“融媒体新思政”为主题的高职院校网络思政工作创新示范案例评选活动,涌现出大批高质量新媒体网络思政教学产品。四是直播思政教学。线上直播课程成为风口,直播形式的思政教学以其便捷性高、互动性强等优势被沿用于高职院校远程教学实践。例如由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等 24 所高职院校共同组织的“云思政,红课堂——师生同上一堂思政课”直播课程,累积观看达十万余人次,引发广泛反响。在涵盖倾听、观看、互动的全方位融媒体矩阵下,具备较高媒介素养的高职院校,以丰富教学手段与多元泛媒传播,取得了良好思政教学成效。

#### (四)教学模式不断丰富,实现显隐协同

媒介素养视阈下的思政教学,将传统意义上的“一维”知识传授扩充为“多维”实践体验。从显性角度而言,较高媒介素养可以使得高职院校丰富既有教学方式,增强互动性。从仅依赖课本教材,到“项目制”思政课题研究、学生团队思政学习成果展示,教学方式的丰富不仅革新了教师教学模式,也提升了学生参与性与主体性,由此实现师生互鉴与教学相长。从隐性角度而言,媒介素养较高的高职院校可以创新扩充教学模式,以隐性视角下的多元路径,在潜移默化中对学生传递思政知识,增强学生体验感。例如,青岛酒店管理职业技术学院依托信息技术专业优势,将基于 Unity 3D 游戏引擎的 VR 技术应用于日常教学中。该校以虚拟现实互动技术与多维视效感知,为学生带来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等红色主题场景的沉浸式体验与专题式实践。通过教学方式的延展,推动深入剖析与潜移默化两种影响模式相互补充、相互交融,形塑高职院校思政教学显隐协同。在媒介素养影响下的思政教学,实现话语媒介变革、话语内容更新、话语方式延伸与话语空间扩充,以阐释力、感染力、引领力与影响力实践多元立体思政教学

模式。

### 三、媒介素养“赋能”高职院校思政教学的现实困厄

#### (一) 信息驳杂消解大学生思政教学认同感

随着现代化信息技术发展速度持续加快,高职院校思政教学中的信息传播方式开始显现出非线性、非向度、非中心性等特征。加之自媒体平台大量涌现,促使信息非线性传播方式愈演愈烈,且对于流量和点击率的过度追求极易导致公众立场出现极化批评场域。例如,一些自媒体为占据“首发”头衔,对突发事件调查不充分便予以发布已成为常态化。还有部分自媒体由于非专业化特性经常会造成其所诉事件呈现极强片面性、主观性,加剧流言的生产与传播。网络信息真假难辨,大学生依据自身喜好选择的信息难免会与真实情况产生偏差。此类虚假信息经由社交网络快速传播与渗透,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造成了极大不良影响和冲击。传统思政教学模式欠缺对于互联网引发思想变化风险的感知,缺乏针对媒介中信息驳杂由表及里的渐进剖析,且即时应对策略略显机械、刻板。由于对于媒介认知的严重缺乏,现有思政教学难以针对舆论及其风险对大学生展开有效引导,极易引起学生困惑,从而导致大学生对思政教学的认同感被严重消解。

#### (二) 碎片化信息冲击思政教学宏大叙事性

媒介素养视阈下,信息技术融入高职院校思政教学实践中,为相对封闭的教学系统打开了缺口。传统媒体数字化转型升级后,仍延续着较为严肃的语境、规范的话语及清晰的逻辑性。这同高职院校思政教学体系的宏大叙事特性相辅相成,即二者均将思想理论看作一种用来传递国家意识形态及主流价值观的语言符号。但碎片化信息将真相分散成零散、海量的多元化信息,通常以感性视觉效果或心理体验进行渲染、包装。此种迅捷且简单的信息传达模式极大满足了大学生个性化需求,得到广泛认可和接受。但与此同时,碎片化信息存在理论体系分裂弊端,极易导致大学生对传统思政宏大叙事性产生抵触心理,弱化思政教学效果。此外,媒介平台的信息碎片化虽有助于促使参与主体聚焦局部、打破固化思维模式,但在解构过程中重点强调个性化、自我意识和主体性。这导致大学生极易

对思政教学内容产生质疑,致使传统思政教学的宏大叙事性遭到严重冲击。

#### (三) 泛娱乐化削弱思政教学话语权

电视媒介发展早期,世界著名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尼尔·波茨曼就曾言明,一切公众话语正日渐凸显出泛娱乐化形态,这最终必然会导致大众沦为娱乐的附属品。娱乐化主要呈现出无深刻逻辑、轻松诙谐、无思考性、无需知识储备等特征。长此以往,泛娱乐化信息将会致使思政教学内容的逻辑性被严重割裂,且大学生的泛娱乐化思维也会促使其滋生出诸多非理性思维,最终造成思政语言结构倾向被极大消解。面对如此窘境,部分高职院校尝试通过娱乐化方式对思政教学内容进行包装,促使思政课通过“潮起来”不断提高大学生“抬头率”。例如,将思政教学内容融入说唱歌曲;利用脱口秀方式对思政教学内容进行讲授。毋庸置疑的是,这些尝试打破了传统课堂教学“填鸭式”授课模式,为大学生带来耳目一新的沉浸式感官体验。然而,思政教学体系娱乐化也只是在短时间内能够激发大学生学习兴趣。若长时间通过融入新的娱乐模式进思政课堂换取“课堂流量”,终究会导致思政教学话语体系逐渐被泛娱乐化消解。

#### (四) 后喻文化考验思政教育者权威性

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从文化传递方向视角出发,将人类文化划分为前喻、并喻、后喻文化三种类型。其中,后喻文化又可称为青年文化,主要是指信息化时代下长辈向晚辈学习的代际交流过程,是一种区别于前喻文化的“反向社会化”涵义。信息化时代背景下,信息技术与人民生活联系日益紧密,社会关系也逐步变得愈加复杂。在信息技术改变社会结构的同时,也引发了高校思政教学中参与主体间关系的深刻变化,导致教育者的权威性受到极大威胁。网络媒介为各类文化推行群体均提供了公共生存空间,使得广大用户可以在网络空间内制造内容、交换内容、传播内容。大学生在网络加持下,信息获取成本大大降低,严重影响其对严肃思政内容的理解。而此时思政教师单纯通过意识形态的价值性和学理性对热点事件进行诠释,便极易使思政教学陷入窘境。总言之,在算法与流量双重因素作用下诞生的信息会助长大学生“伪客观”风气。进一步发展,这种追求“独立思考”的伪客观绝对论,会严重威胁高职院校思政教学实践过

程中主体间的关系,导致师生陷入本末倒置的困境,思政教育者的权威性被极大削弱。

#### 四、媒介素养“赋能”高职院校思政教学的优化策略

(一)明确“媒介+思政”教学规则,筑牢教育者思想阵地

一方面,在融入新媒体展开思政教学活动时,应正确引导受教育者形成自觉抵制网络不良信息的意识,促使其不断提高自身思想道德水准。具言之,思政教育者应培育大学生识别和抵制负面网络文化影响的能力,使其具备较高政治素养和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道德风尚。思政教育者还应充分利用新媒体便捷、多元、信息丰富等特征,通过媒介平台与学生及时进行沟通和交流,避免陷入封闭思想状态。另一方面,在充分了解新媒体时代下信息传播特性基础上,思政教学应摆脱固有教学理念,从学生实际出发培养其自主学习能力。高职院校要为教育者提供更具吸引力的现代化教学资源,促使受教育者整体素养得到升华。通过更为明确的融合教学原则及实践巩固,不断强化大学生对思政教学的认同感,筑牢大学生思想阵地。

(二)创新“媒介+思政”工作平台,凸显传统思政教学优势

第一,创新教学平台。高职院校应当充分运用云计算、大数据及人工智能等现代化信息技术,同时大力研发与本校实际学情与教情相匹配的智慧思政课程软件。通过对智能手机及一些APP软件的合理、适度运用,推动思政教学课堂中师生间实时互动与全员互动的实现。第二,创新管理服务平台。高职院校应推动教学管理服务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促使思政教学管理服务实现高度信息化。例如,高职院校将校园官方微博和微信作为基础性平台,进一步开发原有系统服务师生、贴近师生的新功能,促使管理服务实现资源共享,将娱乐新平台逐渐发展为师生开展校园生活的有力助手。第三,创新研究平台。新形势背景下,强化与改善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学工作,需要持续增强思政工作实践创新与思政学科发展间的双向互动,以此助推全要素、全领域、全方位思政教学体系构建。高职院校应充分发挥云计算、大数据在教学研

究平台建设中的有效作用,促使各大学院将思政研究方向的成果与资源实现共建共享,打造优质研究平台。通过高效、高质的学术研究增强高职院校思想政治工作感染力,创新思政话语体系。第四,创新综合性平台。共享性、综合性是信息技术平台的突出优势。高职院校应持续强化校园内网络互动社区和综合性门户网站建设,推动“易班”行动计划、中国大学生在线引领双工程顺利实施,促使思政教学在服务、内容与技术上与信息技术实现融合升级。还要进一步优化与集聚综合性平台内容,不断扩大教学平台的影响力和覆盖面,凸显传统思政教学优势,破解信息碎片化带来的后现代化弊端。

(三)形塑“媒介+思政”教学模式,深化思政教学主导地位

一方面,形塑媒体技术融入高职院校思政工作的整体性。信息化时代是各路新媒体技术严密切合、全面改造社会的时代,云计算、大数据、数字媒体技术、移动互联网技术等新兴现代化技术彼此融合,协同助力新媒体持续向前发展。高职院校思政教学工作具有明显综合性、实践性特点。推动新媒体技术与高职院校思政教学工作实现有机结合,将新媒体技术有机融入高校“全员+全程+全方位”格局之中。高职院校应将信息技术整体运用战略定位于立德树人内核,统筹规划新媒体技术的应用流程。通过找准二者融合点,把握创新点,将新媒体技术优势与思政教学实践难题充分结合,从实际层面出发提升思政教学工作的效率。另一方面,形塑媒体技术融入高职院校思政工作的协调发展性。高职院校应持续强化对校园网络舆论导向的指引,主动抢占大学生网络思想文化的领地。还要提高对于校园网络文化建设的重视度,并将其引入校园文化建设的整体格局中;积极探索占领网络阵地的有效路径,为大学生营造出良好的校园网络文化氛围。与此同时,高职院校应当进一步加强网络文化内容建设,不断优化网络文化建设相关的长效机制。例如,长远规划、系统推进建设一批有特色、有影响力的校园网站,并不定时举办丰富多彩的线上活动,推动高职院校成为先进网络文化传播的首要阵地。

(四)升维“媒介+思政”教学模式,增强教育者话语权威

从媒介素养基本特征视角,结合“媒介+思



政”融合教学培养人才目标和内容,设计了兼顾知识、专业技能及素质的融合教学活动,并对融合教学效果进行评价。新媒体教学环境中,思政教师在遵循基本原则性问题基础上,应逐步强化对信息化媒介的了解与运用。课前,教师可在微信公众号上创设能够满足学生课前预习及课后复习要求的内容,让学生可以在课前浏览知识。课程教学过程中,教师可提前选定如慕课、虚拟仿真等媒介教学平台,在课堂上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课程结束后,教师可借助微信公众号布置习题,并设置打卡时间。这三种教学方式均可在极大程度上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及其自主学习能力,而且教师也可通过日常网络学习、作业完成情况对学生进行量化考核。一方面,有助于拓宽学生的课外视野,强化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另一方面,将枯燥的知识内容结合时下热点话题,通过多元化形式加以呈现,有助于从综合层面提高学生思想道德意识,帮助其树立正确三观。但教师借助网络渠道展开思政教学时也需注意三点原则:一是教师应切实融入学生生活,同学生进行深度交谈,将网络教学内容紧密结合大学生学习需求;二是网络教学需具备真实效果,能够做到师生共享资源,并拥有全方面教学资源和便捷化功能;三是针对特定网络教学平台,有关职能部门通

过背景管理、团队培训、动态研究等方式必须做到反应可控性,严格把控可能对大学生思想产生负面影响的网络内容。在改进融合教学模式过程中,教育者逐步强化自身媒介应用能力、更新思政知识储备体系。如此,教育者更易得到大学生认同和信任,进而促使自身话语权威性得到极大提升。

## 五、结语

立足于新时代背景,媒介素养在信息传播、社会演进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数字技术持续变革为高职院校思政价值视阈、实践范式与议程指向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就实践而言,媒介素养于高职院校思政教学构建具有锦上添花的意蕴,可以丰富思政话语阐释,解答时代问题;强调学生主体地位,提振教学成效;形塑多元传播渠道,增强参与体验,是高职院校思政教学的重要支撑条件。但是,媒介素养视阈下的高职院校思政教学也存在信息驳杂消解大学生思政认同感、碎片化信息冲击思政教学宏大叙事性、泛娱乐化削弱思政教学话语权、后喻文化考验思政教育者权威性等。是以,高职院校应从媒介素养出发,将学情与世情有机结合,尊重生活逻辑、揭示历史规律、传达时代精神,使思政教学对学生有引领、有启发,对现实形成关照,追索应有担当。

## 参 考 文 献

- [1] Robert J. Graham. Media Literacy and Cultural Politics[J]. *Adult Education Quarterly*, 1989(3).
- [2] 闫研. 自媒体视域下高校“三全育人”工作策略研究[J]. *思想教育研究*, 2021(3).
- [3] 刘锋,段智慧. 新媒体时代“00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探究[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1(7).
- [4] 杨立荣,高彦梅,李璞. 媒介素养培养视角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J]. *中学政治教学参考*, 2021(14).
- [5] 隋文馨,秦燕,黎红友. 跨界与融合:短视频时代高校网络文化育人的价值困境与路径探析[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2).

# Media literacy "empower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difficulties and strategies

Wang Ruihua

(Railway Police College, Zhengzhou, Henan 450053)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support of education in the era of new media and integrated media, media literacy plays an active role in guiding, coordinating and integrat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practice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However, the current practice of ideo-

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till faces such problems as the confusion of information to dispel the ident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the fragmentation of information to impact the grand narrativ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pan - entertainment to weaken the discourse power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the post - figurative culture to test the author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ors, 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media literacy to promo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o go deeper and deeper. For this reaso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need to clarify the teaching rules of "media +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and build up the ideological position of educators; Innovate the "media +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ing platform to highlight the advantages of tradition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Form the "media +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mode and deepen the leading posi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Upgrade the "media +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mode and strengthen the authority of educators' discourse.

**Key words:** media literacy;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ducation and teaching

(上接第 29 页)

#### 参 考 文 献

- [1] 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N]. 人民日报,2022-04-26(1).
- [2] 谢安国,纪安玲. 地方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政课路径探析[J]. 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5(02).
- [3] 习近平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 为实现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N]. 人民日报,2022-10-28(1).
- [4] 习近平. 习近平重要讲话单行本(2020年合订本)[M]. 人民出版社,2021年1月.

## Probe into the practice of integrating local red resources into the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Yang Man, Xie Anguo*

(Ankang University, Ankang, Shaanxi 725000)

**Abstract:** Red resources are revolutionary spirits and material carriers formed and coalesced in the practice of revolution, constructions and reforms l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hich have rich political, spiritual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Because of the profound ideals and beliefs, patriotic sentiments and struggle spirit contained in local red resources, they highlight the functions and values of the university'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class. The integration of local red resources into the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courses is to guide college students to enhance their confidence in theoretical cognition, train their determination in 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hold on to their original hearts in the sense of culture.

**Key words:** Local Red Resourc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Class Teaching; Practice Exploration;

【高职教育教学】

# 音乐能力培养视角下视唱练耳教学策略的探究

李 杨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1)

**摘 要:**视唱练耳是音乐专业学习中重要的基础课程之一,是学生学习音乐的过程中基本的训练项目,主要通过对听觉、节奏、音准的训练,增强学生的识谱能力、视奏能力、听辨能力等,培养学生的音乐感知力和音乐审美,从而提高学生的音乐素养。针对视唱练耳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从教育理念、训练方法、教学侧重点、课堂实践等方面的改革策略,从而培养学生的音乐素质和综合能力。

**关键词:**视唱练耳;教学策略;现状问题;解决策略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885(2023)01-37-03

视唱练耳不仅是音乐专业的基础课程,作为一种综合的音乐能力训练方法,也广泛运用于各阶段的音乐教学中。在课堂教学当中,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听觉能力,让学生建立起音乐的感知力。通过长期的视唱练耳训练,可以矫正学生的音准、节奏,这些能力上的培养可以增强学生的识谱能力、视奏能力、视唱能力及听辨能力,从而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音乐素养。当下我国针对视唱练耳的应用非常广泛,主要集中在高校或者是高职院校的音乐专业教学当中。视唱练耳教学在课堂教学实践活动中已经趋于成熟,但还需结合教学实际,对出现的问题进行探究分析,提出解决办法,才能够让视唱练耳在音乐教学中发挥出其全面的作用。

## 一、视唱练耳教学现状

目前在国内视唱练耳在音乐教学中的现状,重点集中在对识谱、视奏能力以及把握音准、节奏的训练上,对于专业艺术类院校而言,则主要是以视唱练耳为基础,将其运用于对音乐作品的分析上。

结合高职类院校学生的学习实际情况,学生的音乐基础教育相对欠缺,部分学生没有接受过专业的音乐训练,音乐水平较低,不能充分地理解基础的音乐理论知识,对课堂中所涉及的专业内容仅仅停留在表面,长此以往,学生的识谱能力较弱,对于音准和节奏的辨别能力不强,那么其音乐综合能力就很难得到提高,这在音乐类课程的学习中无疑增加了阻力。此外,在高职院校的音乐专业教学中,学生不仅要接受视唱练耳的教学,也要学习声乐、器乐、舞蹈等其他专业课程,但教师往往在开展教学时,忽略了视唱练耳的专业性和重要性,从而导致学生的音乐能力下降。

视唱练耳虽然是一门音乐专业基础课程,但对于其他音乐专业相关课程,诸如声乐、器乐、基础音乐理论等,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开展音乐教学的过程当中,由于学生专业水平的限制,仅仅只是按照教学目标完成教学及考核,并未将其充分地运用到声乐、器乐等课程的学习中,对于学生音乐能力的培养,往往达不到预期的效果。综合相关文

收稿日期:2022-1-21

作者简介:李 杨(1988-),女,陕西汉中,陕西青年职业学院助教,研究方向:高职音乐教育教学研究。

献和教学实际,认真分析在视唱练耳教学中出现的问题,及时找出适合当下的学习方法,才能更好地通过学习这门课程,达到专业学习的水准,以此提高学生的音乐素养和音乐综合能力。

## 二、视唱练耳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 (一)教材过度西化

视唱练耳教学方法源自西方国家的音乐教学理论,该理论在我国上世纪初期才引入。当时新中国还没有成立,整体教育理论的应用,采用的是直接移植的方法,这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视唱练耳教学方法的西化基因,纵然新中国建立之后引入苏联的教材,但是传统的西化教育模式却传承下来。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我国才对视唱练耳教学方面有了教育示范性原则要求。所以在该教学理论当中,西方的教学理论依旧有着较强的影响力。改革开放后,我国对于西方的教育同样以学习和引进的态度,导致了视唱练耳教学在整体模式当中过于强调西化模式,缺少对中国传统音乐的融合。

### (二)认知单一化

目前针对视唱练耳的教学理论应用,在国内主要是将其工具化使用。在这种工具化和功利化的使用当中,主要是检验和衡量学生音乐才能的发展情况。所以就导致教学当中,但凡是应用到视唱练耳这个教学方法之后,大都是将唱谱作为教学的唯一目标。这种情况导致视唱练耳的其他功能被忽略,视唱练耳的教学理论当中,囊括了学生的听觉能力和表达能力综合性训练,最终的目标应当是音乐的感知能力,以及对音乐方面的审美教育。但是在当下我国的音乐教学当中,视唱练耳教学方法主要停留在教学工具层面。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传统教育对于成绩考核过度重视,判断学生学习情况时给予成绩的权重太高。

### (三)多声部训练欠缺

在视唱练耳的教学活动当中,目前学校的教学大都是采用单声部的教学,在整体上无法满足学生多声部训练的基本要求。多声部训练的长期缺失情况,会导致学生多元文化音乐思维的发展陷入困境,影响学生的练耳能力发展,不利于学生对多样化音乐的感知发展。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教学中针对单声部的训练主要考虑学生的音乐素养问题,集中针对某一声部的训练和探索。这种针对学生对音乐细节的教学把握训练开展的教学工作,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生的音乐素养

发展。

### (四)教学侧重不尽合理

在视唱练耳教学理念下的课堂教学,主要集中在对学生基本功的训练上。基于视唱练耳开展的课堂教学中,主要是针对学生的发声声部训练探索,节奏相关的内容探索,以及教学目标方面的探索等。教学活动主要是从技术层面上就学生的演奏、表达等情况进行训练,真正支撑学生综合素养发展,提升学生艺术审美方面,以及音乐表达能力方面的建设较少。这主要是因为当前学校方面的考核,主要集中在学生模仿唱歌方面的得分情况的考核,所以在考核方向上决定了教学侧重。因此想要提升学生的综合音乐素养,必须要解决教学理念问题。

## 三、以视唱练耳教学为切入点培养高职学生音乐能力的方法

以视唱练耳教学为切入点培养高职学生的音乐素养和音乐综合能力,应当坚持问题导向,更新教学理念,以视唱练耳为基础,有效改善塑造学生音乐能力的途径,实现提高学生音乐能力的目标。

### (一)树立现代职业教育先进理念

在视唱练耳的教学活动中西化问题,主要是因为其模式最初的引入,选择的是直接移植的方式。这种方式固然保留了视唱练耳理念的基本内容,但是却并没有考虑“因地制宜”的教学理念,缺少对于我国音乐教学情况的基础考量。在我国传统的音乐体系当中,按照宫、商、角、徵、羽这五个音调为基础,所以传统音乐的训练相对比较简单。按照视唱练耳角度下的音乐教学,可以融合我国的传统音乐文化。在这种文化基础上实现教学活动的建设,能够让学生更加充分的对比中外音乐文化的发展脉络,在整体文化建设中中西融合学习,全面理解乐理都发挥着重要的意义。

例如,在学习音程关系这类音乐基础理论相关内容时,可以就宫调式:宫、商、角、徵、羽、宫,以及宫调式对应的音程关系:大二度、大二度、小三度、大二度、小三度,其中既包括了西方音乐的内容,同时也涵盖了我国传统文化的相关内容。基于此开展的视唱练耳教学训练建设当中,就可以融入中国的传统音乐文化理念和内容,让学生了解西方音乐文化、现代音乐文化的同时,针对古典中国音乐文化的教学内容,应当给予充分的重视,实现音乐教学活动的建设。

## (二) 开展多视角的认知建设训练

在视唱练耳教学活动中,应当就音乐的元素、作品的分析、作者的介绍、演奏的技巧和情怀等多方面进行介绍。以节奏感培养为核心,充分结合其他的视角展开教学。实现多视角的认知训练,有助于学生的综合学习与发展。在教学活动当中应当尝试多视角化的教学探索,在针对节奏感为主线的教学尝试中,全面推动学生的学习与发展,实现视唱练耳教学的高效建设。

例如,歌曲《一对鸳鸯水上漂》,在该课堂教学中,核心内容是要学生掌握旋律当中的六个音组成。同时针对歌曲当中的结束音,全都是下行音调。下滑音作为陕北民歌当中最重要的表现手法之一,应当就其表达消极和失望情感的应用做出教学探索。因为陕北民歌的发源起自于对歌,在其发展史上就有着高低长短、自由疏散的旋律特征,从发音、旋律、情感等各角度进行知识的解读。其中各类相关知识当中应当就歌曲的格调,以及音乐的不同视角进行阐述。让学生更加全面地认识陕北民歌的特点,促进学生对音乐知识点的综合理解,从而打造视唱练耳教学方法的应用课堂,提升整体课堂教学的质量和综合效率。

## (三) 提高学生音域掌控能力

在不同的音乐教学当中,针对学生的声部教学,应打破当下声部教学中单声部教学的不足,采用音乐分析的模式展开教学;针对复调、乐器、曲式和声相关的内容展开教学;针对音乐声部教学,应全面探索相关音乐作品的特点,让视唱练耳训练能够达到更高效的目标。这个过程主要是打破传统单一声部训练的相关限制,并且借此来实现整个课堂教学的训练,提升整体音乐教学的质量和效率。

例如,歌曲《新编赶牲灵》,可以就其音域的掌握做出教学。因为地域性民歌普遍都有着短小精悍和曲调简单的特点,但是《新编赶牲灵》却在这个基础曲调上做出了改变,其中延长部分的技巧需要明显区别于传统的歌曲。《新编赶牲灵》需要侧重于旋律的张弛有度,以及旋律当中强弱分明的特点。针对该部分的教学,应当就音域的训练部分加强难度。让学生逐步掌握作品的演唱技巧,逐步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通过对音域中重难点的视唱练耳训练,逐步推动学生的学习与发展,促进学生对于音乐知识点的理解和认识,逐步强化学生对于民族音乐当中的特点掌握,实现作品与音色互相统

一的目标,激发学生的综合学习效率。让课堂教学有迹可循,让视唱练耳教学能够有章可依。让学生认识《新编赶牲灵》当中的时代特征,以及其具体的民族特征,充分促进学生的音乐素养发展与建设,提高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和认识。

## (四) 改变视唱练耳教学中的侧重点

视唱练耳教学活动对于学生而言是综合性训练,其中最有效的教学层面,主要集中在对音乐听觉的训练。这种训练是学生进行音乐审美赏析,以及整体知识内容学习探索的基础。所以依托于经典音乐作品进行听觉训练,让学生了解并且掌握相关的音乐作品相关内容情况,提高学生对于这类知识点的综合认识,在这个基础上实现对音乐作品的审美探索,针对音乐作品在思想上的表达进行综合性训练。了解不同思想或者情感在音乐当中的体现,实现视唱练耳教学当中的教学侧重转移,提高学生的综合音乐素养。

例如,歌曲《崖畔上酸枣红艳艳》,课程中的教学内容主要是让学生了解单三部曲式,在该作品中整个歌曲实现了场景的切换,从中场景推进之后,然后画面再由远转近。这样可以使音乐的整体保持纵深感,从而增强整个歌曲的叙述性。这是单三部曲式的重要表达方式,而且这类教学中的核心侧重应当构建起以羽调式为主的课程内容,让整个课堂教学演奏部分,增加变宫的六声调式。在歌曲的前奏部分,让整个乐曲更加有特色。这类教学中就可以从民歌的侧重点,转移到单三部曲式的教学当中。让学生了解单三部曲式这种表达方式的应用技巧,提高学生对音乐知识点的理解和认识,促进学生对于音乐知识点的综合理解和掌握,实现高质量的音乐教学,提高学生的综合音乐素养。

## 四、结语

在高职音乐教学活动当中,针对视唱练耳的综合教学训练及目前存在的各类问题情况,应当从中西结合的教学方法、开展多视角认知建设、丰富多视角的音乐教学、改变教学的侧重这些角度入手,以问题为导向开展教学尝试。这样的高职音乐教学活动专业的教学训练,能够有效地提升学生的综合学习效率,保证当下的高职音乐教学质量,促进学生的音乐素养发展。以此基础上实现专业的教学训练,满足学生的发展需求。

(下转第46页)

【高职教育教学】

# 人工智能时代高职网络教育改革的方向、困境与路径

许文芝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 无锡 214153)

**摘要:**顺应新兴技术时代浪潮,基于人工智能的高职院校网络教育变革及新模式建构势在必行。从网络教育多样化、个性化、共享化、终身化发展四个方面,剖析人工智能时代高职院校网络教育改革的发展方向,并进一步分析当前高职院校网络教育出现的模式滞后、资源共享匮乏、实施机制混乱、供给结构失衡等问题。鉴于此,从重构“智能化+教学”网络教育创新模式,搭建“大数据+资源库”网络教育资源共享系统,打造“互联网+人工智能”网络教育供给结构,建设“目标+评价”网络教育督导体系等方面,探究高职院校网络教育改革的路径及模式构建。

**关键词:**人工智能;高职院校;网络教育;职业教育终身化

**中图分类号:**G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885(2023)01-40-07

进入21世纪以来,人工智能逐渐成为引领网络教育改革的主要潮流。特别是在高职院校网络教育改革过程中,人工智能更带来了颠覆性影响。《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强调,各类高职院校需加快传统教育与新兴技术全面融合,推进教育现代化与智能化发展。高职院校网络教育作为国家职业教育重要组成部分,是践行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计划的重要渠道。基于此,以人工智能背景下高职院校网络教育现代化为突破口,具体分析高职院校网络教育改革中面临的困顿之境,以为高职院校网络教育改革提供有力支撑。

## 一、人工智能时代高职院校网络教育的发展方向

我国教育现代化坚持改革创新,更加注重全面发展和全体教育,强调终身学习和因材施教,

重视教育共建共享。对此,高职院校网络教育以互联网为基础,以人工智能为升级,持续推动职业教育现代化。在信息技术更新和教育改革推动下,高职院校网络教育向多样化、个性化、共享化和终身化方向发展。

### (一)拓宽领域,推动网络教育多样化发展

随着信息技术与职业教育的融合,人工智能技术成为推动高职院校网络教育多样化发展的重要手段,网络教育呈现主体多元化和教育内容丰富化发展趋势。

教育主体层面,伴随模拟成像、遗传算法和人工生命技术的发展,高职院校可通过塑造人工智能教育工作者角色,辅助教师完成智能化网络教育。人工智能具有多学科、多领域、多算法以及可重组等技术优势,造就了多样化“教育者”角色。风格多样的“教育者”能够满足受教育者个性化需求,

收稿日期:2022-10-22

基金项目:2020年江苏高等教育学会“大学素质教育与数字化课程建设”专项课题《计算机类在线实践金课的建设与应用研究》(课题编号为202JDKT073);无锡市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信息技术研究专项课题《指向问题解决的信息科技项目设计与实践研究》(课题编号为XXZX/2021/11)。

作者简介:许文芝(1968-),女,江苏宜兴人,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现代教育技术、数字媒体设计与制作。

为受教育者提供定制化教育服务,从而提高网络教育吸引力,提升职业教育效果。教育内容层面,人工智能技术支持多语言识别、智能搜索和知识获取,助推高职院校教师跨语言领域知识资源积累。跨领域、跨纬度职业知识为网络教育提供丰富的资源基础,使得教育内容从高度同质化转向更加多样化。综合而言,人工智能技术可通过拓宽教育主体和教育内容领域,助推网络教育多样化发展。

### (二) 奠定基础,促进网络教育个性化发展

随着《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有序推进,个性化逐渐成为高职院校网络教育的重要发展方向。新时代网络教育以云技术、人工智能、物联网作为强大的技术支撑,持续推动高职院校职业教育特色化发展。

一方面,受教育者由于认知方式、认知能力与认知风格的差异,具有个性化教育需求。网络教育中,教师可以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对学生差异进行智能分析和个性指导。其一,人工智能感觉模拟技术、智能搜索技术、信息感应与辩证处理技术能智能化识别、收集和确认相关信息和数据。教师在网络课堂教学过程中,可利用人工智能信息采集学生学习方法、学习掌握程度和学习动机等方面的信息。其二,人工智能语言和图像理解技术、智能控制技术对大批量信息材料进行系统化存储、智能化分类。教师可通过这些技术对学生学习基础、风格、能力倾向等个性化特征进行分门别类地存储,设置自动化程序实时记录。其三,人工智能专家系统针对复杂性问题,进行智能化计算和推理,并提供咨询意见或解决方案,教师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完成与学生需求相匹配的个性化建档和教学方案设计。

另一方面,高职院校具有中国特色化发展需求。第一,人工智能为高职院校培养中国特色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提供信息技术支撑。自动规划技术、智能控制技术与自动程序设计技术高度支持高职院校推进网络教育技术技能创新服务与传统网络课程升级,促进特色化网络教育平台搭建。第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教育国际化与本土化双向融合。智能化机器翻译、自然语言理解技术以及专家系统功能对高职院校开展线上国际职业教育服务提供技术支撑。同时,高职院校可以充分利用数据挖掘和知识发现技术,推动技术技能人才本土化。

### (三) 拓展路径,支持网络教育共享化发展

人工智能正逐步成为教育现代化变革的重要引擎,对教育内容共享、课程共享与教育数据共享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全国越来越多的高职院校运用智能化网络教育,扩大教育共享化渠道。推动教育从封闭走向开放,促进教育向学习型社会转变。

首先,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实现高频重复性操作,满足高职院校教育内容共享化需求。其次,一站式人工智能系统可为高职院校提供全方位网络教育环境,汇聚众多专家教师智慧课堂。通过智能化系统,高职院校可实现视频课程、互动社区、随堂测验等共享化,完成大型网络智慧课堂共享,使受教育者随时随地接受优质教育资源,实现双师教学,促进教育公平。最后,智能化收集技术能够扩大教育数据开放共享空间,赋能教育教学改革。高职院校网络教育智能化共享除了具有身份公平性、内容丰富性、获取便利性等特点,还将优质资源充分整合,无论师资力量、学习内容以及其他资源,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网络教育可以突破学科、场所、课时等界限,让受教育者享用。

### (四) 摆脱桎梏,引领网络教育终身化发展

在终身学习理念倡导下,高职院校将互联网技术与教育融合,互联网技术变革促进了高职院校网络教育体系完善、教育理念升级、教育结构优化,推动了网络教育现代化。教育现代化赋能全民终身学习体系构建,逐步促进教育公平。

一方面,现代化教育理念要求高职院校推进网络教育终身化。《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提出,要打造数字学习生态系统和智慧教育网络服务平台,搭建多网合一的数字化服务体系。网络平台和服务体系的构建有利于促进优质教育资源的互联互通,增加学习资源供给,为各类人群提供终身教育服务。人工智能、在线教育、大数据分析等现代信息技术,为高职院校建成赋能涵盖各类教育培训的终身公共服务体系。智能化网络教育可最大限度体现教育公平公正,拉伸学习者受教育年限,拓展人才高质量发展,构建更加开放畅通的人才成长通道。

另一方面,现代化信息技术变革要求人们终身化学习。人工智能时代,人们追求高品质自我价值的实现,这一学习过程中,充分体现了终身学习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国内高职院校正在积极发展网

络职业教育,致力于构建终身化学习型社会,努力创造有利条件,向全民提供终身学习机会。高职院校教师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构建网络教育信息平台,方便学习者信息检索,将网络终身化发展理念渗透到日常教育生活中,体现在社会实践、技能考证、日常培训等各方面,促进网络教育终身化学习。

## 二、人工智能时代高职院校网络教育改革面临的困境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因此,赋能职业教育数字化,推进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是当前职业教育的重要任务。人工智能对全方位改革创新高职院校网络教育理念、方法和手段具有革命性意义,在网络教育教学中渗透人工智能技术可以促进教育现代化、信息化发展。但就现实而言,高职院校网络教育改革还存在诸多困境。

### (一) 网络教育模式滞后之困

教育现代化建设 with 教育个性化发展对高职院校网络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加强产教融合创新发展。但由于高职院校网络教育在网络平台服务、信息化手段、个性化教学模式等方面发展仍然滞后,制约了整体教育发展进度。

首先,网络教育平台服务缺失。我国目前高职院校建设的网络学院数量无法满足经济迅速发展下的高职院校网络教育需求,并且在实施网络教学过程中,还缺乏专业网络职业指导课和教育咨询服务,人工智能软硬件设施分配不均,服务水平较低,滞后于现代化教育发展。

其次,信息化网络教育手段不足。网络教育包括师生与计算机、学生与教师、学生与学生三种交互形式。网络课堂教学中,容易忽视学生主体地位,使得课堂互动沦为教师与计算机、计算机与学生的互动。另外,信息化互动模式滞后使得教师极易忽略实践指导。教师授课“重理论轻实践”,会导致学生自主学习意识逐渐被削弱,理论知识与实践相脱离。

最后,个性化网络教育模式欠缺。高职院校在网络课程个性化指导方面,缺乏利用网络意识,使得网络教育模式仍停留于传统网络教育层面。例如,高职院校职业教育面对学生学历层次不一的问题,亟需网络教育以个性化服务弥补集体教学的不足。

### (二) 网络教育资源共享匮乏之困

目前,人工智能广泛应用已是网络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我国许多高职院校已经开始重视信息化、共享化、智能化发展,着手建设网络教学资源库。但信息技术与高职院校网络教育的深度融合仍不够紧密,这可能受基础建设迟缓、管理权威缺失、共享成本高等因素制约。

其一,网络教育资源共享基础设施建设不齐。受区域及自身条件等多方面限制,不同高职院校网络教育资源共享基础设施良莠不齐,致使高职网络教育资源共享匮乏。

其二,网络教育资源共享库权威管理缺失。由于高职院校之间缺乏针对共享库管理的组织与部门,使得网络教育资源共享库建设涵盖的专业课程还不够齐全,高职网络教育资源共享仍没有完全实现。

其三,网络教育资源共享成本高。一是运营维护管理缺失会导致共享费用逐渐增加。高职院校在网络教育资源基础设施建设上投入大量财力、物力和人力,还要面对人工智能运营管理的专业性难题。二是人工智能电子技术基础设施更新换代快。当网络教育资源利用率低时,势必会造成资源巨大浪费,从而大幅增加数据中心建设成本。

### (三) 网络教育实施机制混乱之困

高职院校网络教育实施机制要紧密围绕国家职业教育改革方向,为我国职业教育信息化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支撑。然而在高职院校网络教育实施过程中,信息技术与网络教育衔接度不足、配套体系不健全,阻碍高职院校网络教育高质量发展。

第一,智能化网络教育质量评价机制缺失,导致质量提高“无章可循”。教育评价是检验网络职业教育成果的重要环节,也是教育工作关键组成部分。从国外高校来看,教育评价过程中教师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多方位、多维度评价教育实施情况,保证评价结果相对客观公平。在国内高职院校,评价机制还不够完善。从教师信息素养层面,教师信息化技术应用能力考核机制不全面,影响人工智能技术在网络课程中的运用;从课程评价层面,缺乏针对基础类课程教学信息技术应用水准评价机制,致使课程教学信息化水平不足;从学生评价层面,未设置信息化职业能力、综合信息素养评价机制,使得网络教育职业技术型人才培养效果欠佳。

第二,网络教育课程标准体系非量化,致使课



程实施“无标可依”。一方面,大部分高职院校未建立清晰、明确、可量化的网络教育课程标准。另一方面,目前高职院校网络教育在学生情感态度的衡量标准上,还未建立人工智能机器可识别的规则。尽管已有部分研究开始通过肢体识别、脑电与眼动识别等方式对此类标准进行智能化分析并运用,但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另外,网络教学过程中,教师要通过问卷或观测,对学生元认知能力、自我管理能力和学习能力进行测评。但在职业教育中,问卷和观测指标还未被量化成智能机器所能理解的规则。

第三,线上教育机制单一,网络教育实施“无据可参”。顺应智能技术更新、产业升级和职业更迭速度加快,我国倡导职业教育终身化,鼓励高职院校和企业双主体协同育人。因此,高职院校不仅要线上线下双渠道融合,同时应注重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以促进产教融合可持续发展。而企业与院校协同实施网络教育时,一方面缺乏针对职业教育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相关的规章制度,另一方面还未建立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成果智能化互认机制,大多数院校与企业协同育人处于传统网络教育层面,缺乏线上职业教育新型技术调研与运用培训。

#### (四) 网络教育供给结构失衡之困

网络教育供给结构是指师资力量、教育内容、网络技术与网络基础设施等教育资本要素在网络教育中的供给比例。供给结构一旦出现调配不协调,则会削弱网络教育拉动作用,增加职业教育边际效应。目前,高职院校网络教育还需进行供给结构调整。

一方面,网络教育要加强总体供给规划,避免人才培养结构失衡。高职院校具有专业课程类型多、学生发展水平不一和就业对口需求不同等特点,对网络教育提出了不同要求。其一,整体调配比例失衡使得高职院校学生需求无法得到教育资源的有效匹配。调查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高职院校网络课程开设次数达185万次,其中院校运用人工智能技术的课程比例仅为13.5%,而根据学生个性特征智能化匹配课程比例不足10%。其二,院校间未形成有效对接与沟通,造成有限的优质教育资源未得到最大化利用。

另一方面,网络教育手段受限,造成供给比例失衡。在职业教育普及化目标和理论实践结合要求下,传统网络教育手段无法有效规避学习时间的

间断性,导致网络教育碎片化、内容供给失衡。因此,高职院校亟需转变传统教育模式,运用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进行辅助教学。目前部分高职院校单纯以“互联网+教育”的手段进行课程教学,教育手段单一直接影响校内学生和校外职业人才教育供给比例。此外,教学平台界面设计、课堂互动设计与课外实践设计智能化程度不够,也影响网络教育供给匹配效率。

### 三、人工智能时代高职院校网络教育改革的路径

人工智能技术正快速向社会、生活、教育等领域渗透,对高职院校网络教育改革产生巨大影响。人工智能技术对网络教育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模式改变,还表现在结构优化、机制完善和理念升级。人工智能时代网络教育改革力求学生中心、手段多元和目标明确。高职院校教育改革需要与时俱进,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积极探索网络教育人才培养理念和模式。

#### (一) 模式转变:重构“智能化+教学”网络教育创新模式

相对原有网络教育模式,智能化网络教育在人才培养、思维提升与实践教学等方面实现创新性改革,助推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在网络教育改革进程中,高职院校通过平台建设、信息化推进与个性化实施辅之以人工智能技术运用,助推网络教育实现“智能化+教学”创新模式转变。

首先,建设网络教育平台,实现人才培养。随着网络教育服务器功能不断提升、网络安全防护技术不断改善,为高职网络教育平台服务模式建立提供了技术基础和安全保障。人才是高职院校网络教育平台服务的创造者、维护者,高职院校应“以人为本”,依托环境、政策、数字化、人才来构建创新网络教育平台服务模式,转变自身教育方式,摒弃传统应试思想,改革以成绩评定学生的教学模式。

其次,构建信息化网络教育,提高思维能力。随着信息化速度加快,学习者通过网络便能快速获得所需信息。个体发展水平将逐渐取决于学习者使用网络信息、培养自我学习和自我创新的能力。人工智能时代下学生应从被动接受知识转变为主动汲取知识,教师不再是知识的传播者,而是学生学习的指导者,凭借自身知识、智慧、能力以及人工智能技术辅助,成为学生掌握学习方法、发展个性

的管理者,而非个别化学科的指导人。通过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学生思维创新能力。

最后,加强个性化网络教育,促进实践教学。个性化、智能化的学习空间打破了高职院校固定的课程教学安排,呈现出一种灵活的课程安排组织形式。通过因材施教,选择智能翻转课堂、交流辩论课堂、合作研讨课堂等教学模式,依托教育资源共享平台提供的个性化、智能化实践教学空间,满足学习者理论和实践双重学习目的。

(二)资源整合:搭建“大数据+资源库”网络教育资源共享系统

一方面,建构网络教育资源共享管理体系。建构共享体系需遵循以下原则:一是标准化和规范化原则。为实现资源需求者对知识的理解和认识,高职院校网络教育资源的知识性要实现标准化和规范化。二是有序、全面和系统化、功能性原则。高职院校作为教育资源广度和深度的发源地,在教育资源共享过程中应做到资源有序、公开、共享,又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做到开放式访问无障碍,全面可公开信息资源无缝对接;功能性应做到电子信息易于检索、查阅和调配;系统化则应实现网络教育资源在不同系统知识领域内有效分类、归纳和总结。三是简单易用原则。要提高网络教育资源数据处理的高效性、查询功能的时速性以及操作界面的明确性。四是安全性原则。安全是高职院校网络教育资源共享的基础。应以法律法规为基准、网络教育资源共享原则为指导,实现教育资源发布者和使用者的安全性。

另一方面,建立优质大数据资源库共享系统。首先,政府及教育部门应做好大数据资源库建设与共享引领工作,在构建优质大数据资源库过程中,应做好督导工作,充分保证资源库构建进度一致性,加快人工智能技术在资源共享系统中的应用。同时,在国家政策引导下,实现院校间、校企间网络教育共享资源库建设合作互通,保证人工智能技术与共享资源库的有效对接。其次,提高教育现代化经费投入。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深化,人工智能为高职院校资源共享提供了质量基础和技术保障。高职院校应逐步推进智能技术升级和后期维护工作,保障新兴技术在共享资源库中的主导地位。再次,建设大数据为基础的资源共享平台。日益多元化的网络环境为高职院校网络教育资源提供不竭

信息源泉。高职院校利用海量数据规模,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对大量优质教育资源收集、整合,通过大数据建设共享平台,对资源的价值性、真实性、多样性和独特性进行筛选和处理,实现网络教育资源共享纵深化发展。最后,高职院校应加强信息化人才引进。高职院校需通过人才把关,实现相关配套设施维护和技术操作,完成信息化教育培训,加强高职院校师资力量的现代化升级。

(三)组织调整:打造“互联网+人工智能”网络教育供给结构

供给结构调整主要探讨各教育组成要素有机组合并有效发力的问题,直接对应高职院校教育需求结构。高职院校网络教育供给结构调整是将教育过程与成果和人才培养、文化传承、国际交流与科学研究目标相匹配,持续调整教育要素比例的过程。

首先,构筑以“互联网+人工智能”为基础由政府、院校与企业三维结构管理体系。以国家教育方针为指导,综合考虑院校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目标,设立专门的网络教育管理机构。充分利用智能化技术,搜集并整理网络教育供给和职业教育目标体系,建构供给储备库。相关机构协调三方网络教育需求和权责边界,制订科学合理的网络课程开设与人员调配规划,以统筹调整网络教育供给结构。高职院校与企业为合作主体,根据既定规划和实际情况有序推进互联网职业教育进程。在实际操作中,可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实时联动细化的课程资源与课程开设反馈机制,调整数字网络平台运营服务。

其次,建立以“互联网+人工智能”为基础的校内与校际跨时空、跨边界要素流通平台。政府部门充分发挥政策引导职能,重视企业与院校间的融合,关注院校间网络教育的合作共进。通过激励网络职业教育龙头团队,带动职业院校内与院校间协同发展,共同搭建“AI”基础互动平台,提升网络教育合作共筑效率。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可运用语言识别、语言翻译和语言优化等人工智能技术,实现跨语言教育、自动化文字记录,增强网络职业教育效果。此外,高职院校可对网络教育平台进行智能化升级,提升教师校内外合作效率,优化教育内容推送成效和教育内容输出效果。

最后,提供以“互联网+人工智能”为基础的精准供给。第一,智能化识别学生需求。识别学生

需求是网络教育精准供给的基础。高职院校教务处可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调查、收集信息,并上传至云端存储平台。经过智能技术统筹分析和定位,管理人员可精准识别学生整体需求和个体需求。通过信息化建档立卡、制定匹配方案、动态调整,实现供给与需求的无缝衔接,体现院校网络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第二,提供精准教育内容。在智能化识别学生需求的基础上,对受教育者进行分层分类,因人施策进行“AI教师”匹配,实施精准化导学。依据网络课程标准制定动态性教学目标,提供精准的教育内容,保证网络课堂教学有效性。第三,智能化管理体系。各管理主体共同构成以“互联网+人工智能”为基础的教务管理系统,通过教师培训、全程监管、多样化考核等措施,对受教育者需求与网络教育供应匹配度进行智能化评价,从机制上保障教育供给结构精准化,助推网络教育高质量发展。

(四)机制优化:建设“目标+评价”网络教育督导体系

高职网络教育不仅要加强“互联网+人工智能”与传统教育的横向融合度,也要提升各类资源要素的纵向配置效率。为规范高职院校网络教育管理和实施工作,发挥网络教育在终身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教育中的重要作用,高职院校应根据实际情况构建督导体系,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第一,完善管理体制和服务体系,保障职业教育的横向合作。利用云计算平台促进专业教育体系网络化,建立可以进行动态管理的“督导仓”,规范管理程序、提高工作效率。院校间和校企间可制定网络教育标准规范和互认机制,以保障网络教育顺利开展。结合实际协作深度,校企间可共同建设网络教育中心,制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机制、网络

课程学分管理与理论学习结业标准规范。此外,政府应主动发挥其引导和调控作用,在充分考虑国家教育目的与现实情况的前提下,构建网络与职业教育融合发展制度与规则。

第二,建立全过程教育体系,促进课堂与网络结合。学生学习全过程包括网络课堂学习与互动、课外学习与实践、实际运用与成果展现。网络教育中,教师应建立科学合理的教育目标体系,从以往关注技能转向关注学习全过程。为保障教育目标有效落实,高职院校应基于网络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新特征,依据学习自主性、人机交互性和计算机程序性,建立细化的教学指标,保证专家教师、智能化技术专家与行业专家多元主体联合主持,深化教学指标体系建设全过程。同时,通过增加“AI助教”服务,充分运用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对教育目标进行量化指标处理并纳入自动化程序,完善质量保障体系。

第三,加强综合评价,推动高校网络教育持续提质。建立科学完备学分制度是网络教育与职业教育深度融合的关键,研讨并制定以分数、正确率、百分位等标准化测试成绩为量化标准的评价体系。在网络教育中,智能化教育评价所应用场景和实现算法虽然不同,但应用本质和AI赛制、翻译等领域无差别。在校企信息化整体技术规划框架下,校企间信息化合作教学制定共同目标,按统一程序规定实施部署、评估与验收,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提升实践教学质量。同时,对现有教师和对应企业教育者要进行专业知识培训,招聘网络教育专业教师人才,增加网络教育应用资金投入,完善网络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提升网络教育与职业教育共生发展质量。

## 参 考 文 献

- [1] 毛怡莹. 互联网金融时代高职院校金融专业实践课程优化改革探索[J]. 商业研究, 2018(11).
- [2] 代飞. 互联网+国家战略下高职网络专业人才培养研究与探索——基于毕业生职业结构变迁视角[J]. 职教论坛, 2019(12).
- [3] 顾至欣. 高职学生在线开放课程学习体验研究——以南京旅游职业学院为例[J]. 中国远程教育(综合版), 2019(2).
- [4] 杨伟权. 疫情期间高职院校线上教学质量状况调查分析[J]. 中国成人教育, 2020(21).

## Higher vocational network education reform's direction, dilemma and path

*Xu Wenzhi*

(Wuxi City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Wuxi, Jiangsu 214153)

**Abstract:** Solfeggio ear training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basic courses in music major learning. It is a basic training project for students in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music. Through the training of hearing, rhythm and intonation, it can enhance students' ability to read music, see and play, listen and handle, cultivate students' music perception and music aesthetics, so as to improve students' music literac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and reasons existing in solfeggio ear training teaching, explores from the aspects of educational concept, training methods, teaching focus, classroom practice and so on, with audio – visual ear training teaching as the starting point, to cultivate students' musical quality and comprehensive ability of music.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Network education; Lifelong vocational education

(上接第 39 页)

### 参 考 文 献

- [1] 何永璨. 视唱练耳的听唱策略与记忆策略探究[J]. 参花(下), 2022(12).
- [2] 吕佳茵. 视唱练耳课程中实际音乐作品应用的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J]. 艺术评鉴, 2022(21).
- [3] 章峻源. 高校视唱练耳教学的多元化构建实施研究[J]. 戏剧之家, 2022(31).
- [4] 任薇. 高校视唱练耳数字化教学研究现状简述(下)[J]. 艺术家, 2022(10).

## An exploration of the teaching strategy of sight – solfeggi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sical ability development

*Li Yang*

(Shaanxi Youth Vocational College, Xi'an, Shaanxi 710061)

**Abstract:** Solfeggio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basic courses in the study of music, is the basic training items in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music, mainly through the training of hearing, rhythm and pitch, enhance students' ability to read music, sight reading ability, listening ability, etc., cultivate students' musical perception and music aesthetics, so as to improve students' musical literac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olfeggio teaching, and proposes solutions, so as to better cultivat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music ability.

**Key words:** Solfeggio; Teaching strategies; Status quo issues; Resolve the policy

【高职教育教学】

# 云班课 + BOPPPS + 教学评价模型在 传媒类课程中的实践探索

张静 李瑞 蒋睿萍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30;西安培华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5;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30)

**摘要:**知识经济时代来临,基于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大学生就业压力增大的客观现状,大学教育要实现知识传授到能力培养转变,如何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知识体系以及素质培养教育。课题组在课程思政的背景下,从 boppps 教学模式六个阶段出发,结合蓝墨云班课进行课程教学,将教学评价反馈形成实施流程图。结合后期间卷调查,对课程实践进行反馈和评价,为教学改革提供由理念到实践的方案设计,旨在为传媒类课程实施混合式教学改革提供参考。

**关键词:**云班课、BOPPPS、教学模型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 - 2885(2023)01 - 47 - 04

教学改革涉及教师、学生和教学流程三方面因素,并兼顾工具、知识、文化等多重属性。高效推进课程改革工作,就要紧紧围绕课程思政所要求的价值塑造、能力培养和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教学目标。传媒业态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新媒体编辑、平台审核良好的媒介素养。新媒体时代,平台内容运营相对自由,其中不乏一些伦理失范现象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引导学生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深化学生对自己职业和职业精神的认知,不断提升学生践行马克思主义传播观的能力,从而担负起“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舆论工作喉舌的重任”。

## 一、传媒类课程教学面临的困境

在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下,传媒类课程注重教学实践。学生认为理论课程实用性不强、趣味性差,传统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陷入尴尬境地。学生能力素养目标的达成依赖教师教学设计和学习动机的激发,传统教学一般采用教师讲授,学生被动接受,学习效果并不理想,在实际教学中也面临着诸多问题:

### (一)“教”与“学”的关系问题

传媒人才媒介素养区别于自媒体用户素养的特殊性在于认识和运营媒介能力。以往教师通过PPT讲授传媒类理论课程内容,注重教学方法的指导思想。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为主动传授和被动接

收稿日期:2022 - 11 - 2

**基金项目:**陕西省“十四五”教育科学规划2022年度课题:“以学生为中心”构建高校高质量人才培养体系的维度与实践研究阶段成果(项目编号:SGH22Y1734);陕西省新文科研究与实践项目:“新文科”视域下网络与新媒体广告课程思政教学探索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张静(1988-),女,陕西西安人,西北大学现代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文化传播。

李瑞(1994-),女,陕西神木人,西安培华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文化传播。

蒋睿萍(1989-),女,陕西西安人,西北大学现代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传播学。

受,教师通过课程内容的概念、案例、策略分析进行知识单向传授,忽略学生在内容推送、用户画像等能力的拓展,缺乏培养学生面对伦理问题的思辨能力。随着移动终端的广泛应用,学生对手机的利用率不断提高,当教师未积极引导学生发挥内驱力,形成良性学习动机时,课堂中就会产生“低头族”现象,课堂教学效果往往存在失控。

### (二)学生“学会”和“会学”的问题

传统教学以教师为中心,在理论课程教授中,大多数教师注重概念定义知识讲授,忽略搜集学生的信息反馈,学生在学习中始终处于被动接受地位。教师注重“教”的方法,并未注重学生的差异性和个性化特征,忽略了教和学的相互影响。因此,传统教法减弱了实效性。在教学设计中,教师要最大限度的发挥教师和学生的潜力,重视从知识传授到能力培养的转变。只有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培养学生有学会和会学的能力,提升学生学习积极性,学生才会形成正向学习动机,克服学不能用的实践障碍。

### (三)重“理论”轻“实践”的问题

高等教育应为社会和经济发展培养“适销对路”人才的同时需要重视素养教育。传统教学观中教学就是传授书本知识。授课重点放在教师教授理论知识,学生学习理论知识上。教学重点强调学生通过思维、记忆和联想等方式进行学习,并未重视学生素质培养和能力锻炼。例如网络传播伦理与法规课程,教师的知识传授主要是对学生进行智力培养,提升学生智慧。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社会功利化容易消解大学使命意识,媒介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不平衡,平台“流量为王”的特性等无不体现出追求功利作为价值取向的特性。课程目标需重视学生逻辑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提升学生对知识体系构建和创新技能,使学生朝着复合型全媒化的人才方向发展。

### (四)“同一目标”与“差异化”的问题

传统教学方式考核以学生期中+期末考试分数为测评标准,注重考查学生的记忆力。教师在课堂上产生“灌输式”教学趋势,忽视学生作为教育主体的地位和作用,单一化的教学形式不能满足不同主体的教育需求,不利于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漠视学生的个性差异。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容易产生畏学、厌学的情绪。“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改革中,重视教师引导,师生双向交流互动,教师在

授课过程中需要细心捕捉学生输出的微小反馈信息,及时调整教学方法,重视多元化考核方式。通过考查学生在认识和运用新媒介的能力、使用和引流信息能力等媒介素养内容,重视学生差异化,实现全面化、立体化考核评价,进而提升了学生学习自主性。

## 二、云班课 + BOPPPS + 教学评价反馈模型的教学实践

课堂教学是实现教学目标与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途径,是教师为学生传授知识、培养能力、综合素质的重要场所,也是确保教学质量不断提升的有力保障。云班课促进教师利用信息技术更新教育理念、变革教育模式,提升教师数字素养和技能水平,有效推动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的深度融合,赋能课堂教学和专业建设高品质发展。BOPPPS 教学模式有助于教师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将内隐于教学素养目标中学生关于实践方式、逻辑思维和认识规律等对学生进行引导和教育,即重视学习和消化知识的能力、团队合作的培养,这与单一的知识传输的学习形成了有效互补。教学评价反馈便于教师更好掌握学生学习质量,形成教学环节闭环,为教师制定教学方案设计提供有效支撑。

### (一)“云班课”贯穿课前课后移动教学

云班课是一款移动教学工具,基于课堂即时互动反馈采集的行为大数据,将教师所发所有课程信息、学习要求、课件、微视频等学习资源都可以即时传递到学生的移动设备上,同时可以随即开展投票问卷、头脑风暴、作品分享、计时答题等互动教学活动。教师通过移动网络平台实现课堂内外信息即时互动,学生利用碎片时间随时随地在云班课进行预习、复习。在云班课模式下,课前预习、考勤签到、学生的经验值都能及时量化统计,教师可自行设计教学调研,在云班课了解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情况,通过获取数据不断提高教学水平。

### (二)“BOPPPS 教学模式”辅助线下教学

“BOPPPS 教学模式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新型教学模式,包括六个教学环节:课程导入(B)、学习目标(O)、预评估(P)、参与式学习(P)、后评估(P)和总结(S)。其中,课程导入部分为抛砖引玉,介绍即将学习的知识单元内容;学习目标是明确告知学生学习完知识单元后要达成的知识目标和素养目标;预评估为教师根据云班课上测验学生对知

识单元内容的掌握情况,即时调整教学的进度和深度;参与式学习指有效教学环节,师生互动参与知识单元内容的学习。在网络传播伦理与法规课程中,参与式学习包括“背景知识介绍—阅读分析案例—提出争议性问题—分组充分讨论—开展小组辩论—总结评估与反思”。后测为课后通过作业检测学生的学习效果,评估对教学目标的达成情况;总结是对课程学习内容的回顾和反馈。BOPPPS 教学模式打造以学生为中心参与的新型课堂教学模式,从而提高了课堂教学的效果。

### (三)“教学评价反馈”即时追踪教学效果

多数高校教学评价着重强调将课堂教学活动纷呈具体的一些指标进行评价,包括教师授课情况和学生学习情况。在教师授课方面,包括教学态度、教学准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手段等,学生学习情况包括学习态度、学习能力。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改革中,更需要重视学生反馈的信息反思。云班课注重多元化的评价体系,包括对课程理论知识掌握能力、内化知识、技能应用、创新知识和职业认同能力等,教师通过理论教学和项目作业的布置,对学生提交的课后作业进行分析和研究,实现对每位学生学习进度跟踪和学习成效评价。分层评价有利于教师更好掌握课程教学是否达到预期目标,为完善课程教学提供有效支撑。

## 三、云班课 + BOPPPS + 教学评价反馈模型在教学中的应用

云班课 + BOPPPS + 教学评价反馈模型从老师单向输出到学生单向听讲转向教师有效引导到学生自主探索的双向过程。通过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让学生在保持专注的同时,实现对课程知识的迁移和新知识的掌握。具体教学设计如表一所示。

### (一)推送“资源包”建构知识体系

在课前,教师可以在云班课群推送国家精品课程、慕课等网络教学视频资源,学生课前基于云班课预习帮助其厘清教学知识逻辑体系。在课前测验中,教师通过云班反馈数据了解学生自主学习状况,并根据学生的前测数据来确定整个教学过程设计。在此阶段,教师需要积极引导主动发挥学习的内驱力,做好教学活动前期的评价者和监督者,让学生建构和完善自我知识体系。

### (二)引入“翻转课堂”内化知识体系

教师在授课中引导学生参加课堂讨论、演讲、

辩论,展示等,是学生内化知识的过程。教师以课前学生自主学习存在问题和课程目标为导向,通过云班课数据分析调整教学侧重点,实现以学生为中心开展有差异化的教学。在课堂中以 BOPPPS 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加强对网络传播伦理与法规中伦理问题思辨能力的培养,在教与学中培养学生加强媒介素养教育,促成传媒类学生素养发展与提升。课后进行小组分配合作作业,开展教师评分、小组之间、小组内部互评,做好课堂与课后有效衔接。

### (三)预设“工作坊”实践知识体系

“工作坊”的核心内容为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讨论参与传播实践活动,提升学生的媒介实务能力。教师在课后建立后评估内容完善教学内容,学生可以通过社会实践、讨论答疑、读书报告等方式进行作业练习,将作业内容上传至云班课中;通过预设项目的实践,教师为学生提供真学、真练的学习环境,学生通过真学、真做了解网络法规与职业道德的具体要求。工作坊提升学生的伦理价值判断能力、伦理素养和媒介素养,实现人才培养和人才需求的“零落差”。

### (四)设计“多元考核”复盘知识体系

智能化教学平台和教学评价为传播类课程实践教学提供内容和设备支撑。教师将课堂教学和手机移动终端有效结合,在课前测验检查学生对知识点掌握情况,在“轻直播/讨论”中考查学生发言质量,在“作业/小组任务”中通过作业混合模式互评增加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云班课 + BOPPPS + 教学评价”模型重在“以学生为中心”进行教学实践,系统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智能反馈经验值,之后教师按照课程项目权重和云班课经验值形成学生最终成绩,形成多维度评价。

## 四、云班课 + BOPPPS + 教学评价反馈模型应用效果

网络传播伦理与法规课程重点考查从业者在海量信息时代分辨媒介失范现象,基于客观事实发布解决权威的新闻产品,同时加以内容解读和舆论引导。健康的舆论生态圈是媒体发挥社会功能的重要前提,新媒体伦理道德规范也是智媒时代内容生产者不可或缺的能力。在信息过载时代,新闻的深度解读、社会热点事件的思考和新闻策划力都是从业者所必备的能力。云班课 + BOPPPS + 教学评

价反馈教学模型对于避免媒介失范现象的优势有以下几方面:

(一) 互动化的教学设计与探索实践沉浸式课堂

立足于智媒时代传媒类人才核心竞争力要求,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和主体作用,通过云班课 + BOPPPS + 教学评价反馈模型使教师实时掌控学生的学习情况,及时调整与优化教学资源,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构建价值观和传播伦理,强化对理论课程的认知。云班课基于学生的经验值奖励也提升了课堂教学的实际效果,使师生建立起良好的互动合作关系。

(二) 智能化系统辅助提升教学效率

云班课通过高质量的辅导与学情分析,抵消教学者在互动度和感知上的劣势,打通学生整条学习链条。无论课前测评,课中互动还是课后作业都能体现对教学结果的双向反馈。在场景学习中,学生可以实现自主探索和个性化学习。云班课根据学

生的学习速度快慢等个性差异,可以在课程评价周期之内,通过与教师、同学互动,达到掌握知识的目标,实现学习进度与学生不同掌握程度间的平衡。

(三) 有助于优化学生学习态度

云班课 + BOPPPS + 教学评价反馈模型确保教师教学设计灵活调整,在授课中通过有感发力的场景预设,师生沟通互动帮助教师引导学生自主探索实现知识建构和迁移,增加学生有效学习时间。通过智慧教学手段,充分体现学生主体地位,打造“教、学、测、评”一体化的智慧课堂,激发学生潜能,让教学更精准有效。

教学改革是国家新时代需求,教师是教育改革的先行者和实践者。教师通过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改革冲破实践和空间界限,让学生的思想、思维和认识上发生转变,激发学生潜能,实现受教育者和教育者之间的实时交流与互动,提升课堂质量和学生满意度,让教学工作焕发生机活力。

## 参 考 文 献

- [1] 遵循三大规律的通识教育课程思政模式创新——以清华大学“写作与沟通”课为例[J]. 梅赐琪.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21(03).
- [2] 基于 BOPPPS 模型的混合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J]. 李婷,梁海峰,商森. 大学. 2021(43).
- [3] 基于 BOPPPS 模型逆矩阵的课堂设计[J]. 顾丽娟,龙海波,周鸣宇. 教育教学论坛. 2019(48).
- [4] 混合式教学模式下的基础会计学课程教学活动设计与实践[J]. 李婉琼,万新焕. 商业会计. 2021(03).

## The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Mosoteach + BOPPPS + Teaching Evaluation" model in media courses

Zhang Jing, Li Rui Jiang, Rui ping

(Modern College of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130; Xi'an Peihua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125; Modern College of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130)

**Abstract:** In the era of knowledge economy, based on the popular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increasing employment pressure of college students, college education has realize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Knowledge imparting" to "Ability training", but it is easy to ignore the student-centered knowledge system to build quality-oriented educ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research group set out from the six stages of boppps teaching mode, combined with the blue ink cloud class to carry out the course teaching, and formed the implementation flow chart with the feedback of teaching evaluation.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this paper gives feedback and evaluation to the curriculum practice, and provides the scheme design for the teaching reform from the idea to the practice, aiming at providing the referenc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ixed teaching reform of the media courses.

**Key words:** Mosoteach; BOPPPS; teaching model



【高职教育教学】

# 1 + X 证书制度实施的价值诉求、现实困境 与创新策略

王 静

(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 徐州 221000)

**摘 要:**1 + X 证书制度实施是职业教育的重大制度创新,亦是国家系统推动技能人才评估机制改革、凸显类型教育特色的重要引擎。在全面推行普职融通环境下,1 + X 证书制度实施有助于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深化“三教”改革与构建终身教育体系。通过剖析当前我国 1 + X 证书制度实施中面临的书证深度融通难度较大、资源分配效能低、系统化评估机制尚未完善、校企合作有待深入的现实困境。鉴于此,应以组织融通为导向,构建校企命运共同体;以机制融通为核心,建立动态化评估机制;以资源融通为宗旨,盘活职业教育及培训资源;以课程融通为目标,稳步推进证书职业标准融入课程体系,保证 1 + X 证书制度稳步实施。

**关键词:**普职融通;1 + X 证书制度;技能型人才;产教融合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 - 2885(2023)01 - 51 - 07

1 + X 证书制度是推动产教融合、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健全职业技能培训机制的重要方向。自 2019 年国务院发布《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职教 20 条)以来,全国累计启动 4 批 1 + X 证书试点工作,获得显著成效。2021 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通过开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激发职业教育体系培训功能、厘清职业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之间内在逻辑,实施 1 + X 证书制度”。2022 年 3 月,国家追加启动涵盖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化农业等 10 个职业技能领域的 1 + X 证书制度试点工作。普职融通作为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在学籍监管、学生成长、招生制度和课程融通方面深化 1 + X 证书制度变革,为学生多样化选择和多路径发展搭建桥梁。在普职融

通日渐深入背景下,落实 1 + X 证书制度可以重塑普职“产学研协作”学习生态、畅通复合型技能人才渠道、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特别是普职融通过程中,国家发挥互派师资队伍、协同设计课程、实行学分互认功能,益于 1 + X 证书制度高效实行。可见,加速驱动 1 + X 证书制度实施不仅是完善职业教育发展体系的必要途径,亦是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

## 一、1 + X 证书制度实施的价值诉求

(一)基础价值诉求——开拓多元成才渠道,矫正职业教育歧视

2020 年国家开启 1 + X 证书制度试点,重点强调将证书制度与教师队伍、实训室建设等人才培养渠道有机融合,畅通技术技能人才成长通道。2022

收稿日期:2022 - 11 - 22

基金项目:2022 年江苏高校“共建高质量的外语教育新生态”专项研究课题《高职院校外语课程思政教学融合的理论及对策研究》(2022WJYB043)。

作者简介:王 静(1983 -),女,江苏徐州人,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英语教育教学。

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新《职业教育法》,明确提出“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具备同等重要功能”。在这一系列政策作用下,各院校立足普职融通重大战略,开辟多元化成长渠道,提升不同院校学生实践能力、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为1+X证书制度实施指引方向。

一方面,畅通技能人员成才渠道是实施1+X证书制度的基础性价值诉求。普职融通环境下,国家通过提升技能人才培养质量、畅通人才培育和评估渠道,全面实施1+X证书制度,助力职业院校办好职业教育工作、纾解就业结构性矛盾。其一,普通院校和职业院校立足人才培养途径,协作设计课程、互派师资队伍,有效践行1+X证书制度,开拓技能型人才培养渠道。其二,各院校融合X证书培训内容与学历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设计完善化课程体系,全面畅通技能人才培养路径。其三,普职院校在良好普职融通机制基础上,深化普通教育阶段教育改革、全面共享教育资源,实施1+X证书制度,益于为学生群体提供正确发展路径。

另一方面,矫正职业教育歧视是1+X证书制度全面实施的基本诉求。各院校采用融通互认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学业成果的方式,健全职业教育类型考试制度,有助于矫正职业教育歧视,加速1+X证书制度实施进程。2021年人力资部门出台《职业院校毕业生参与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的相应问题通知》(简称《通知》),明确提出“取消以学历和名校作为聘用人才的硬性要求,防止以毕业学校、国外学习方法作为就业限制条件事件发生,保证1+X证书制度公平有效实施”。《通知》着重强调要矫正职业院校就业歧视问题,设置技能操作相关履行职务,将实践测验能力控制于50%之内。由此可知,矫正职业教育歧视,全力将学历证书与职业技能证书有机联系,是普职融通背景下1+X证书制度全面实施的基本价值诉求。

(二)核心价值诉求——推动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融合发展,打破教育壁垒

1+X证书制度一般将X证书开发与运营主体设置成培训评估组织,反映职业教育活动和学生职业生涯发展所需求的综合能力。培训评估组织是连接政府部门、高职院校、行业企业的重要桥梁,可将企业生产环节中新型技术、新型要求有机融入于职业技能标准。2022年1月,国家发布《有关做好本科层次职业院校学士学位授权和授予工作的意见》,提出“本科职业教育院校要借鉴普通本科教

育构建标准,助力学生全面熟悉本门学科的专门知识、基础理论和基础技能”。借此,各院校立足普职融通大环境,以发挥国家政策优势为目标,有机融合不同教育类型,可打破教育壁垒,驱动1+X证书制度实施。

其一,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融合发展,是1+X证书制度全面实施的核心价值诉求。普职融通视域下,职业院校构建协作办学模式,逐渐形成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等多主体融合的新发展格局,利于1+X证书制度有效实施。就职业院校而言,立足“双证书”制度,各院校借助1+X证书制度设计科学化技能评估标准,能够助推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有效衔接,为1+X证书制度与学历教育有机衔接提供助力。

其二,非学历和学历教育深度结合,是有效落实1+X证书制度的核心价值诉求。普职院校有机结合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优势,推进办学形态多样化,可驱动职业教育形成一体化格局,助力1+X证书制度顺利实施。通过普职融通方式,消除职业与学历教育之间壁垒,是国家1+X证书制度有效实施的关键。一方面,在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毕业生有限条件下,普职院校助推继续教育扩展学科影响力,有效衔接非学历与学历教育,可推进1+X证书制度实施进程。另一方面,有效践行1+X证书制度,指引普职院校完善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融入不同类型教育,打破非学历与学历教育难以融合壁垒。从取得1+X证书渠道而言,职业院校利用正式学习渠道和非正式学习方法,可取得1或X证书,能够夯实非学历与学历教育有机融合基础,益于1+X证书制度实施。按照职教20条规定,普职院校借助1+X证书免费进修课程,掌握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培训内容,可助力相关人员考取正式学历证书。由此可知,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高度衔接,是普职院校实施1+X证书制度实施和驱动“课证融通”的核心价值诉求。

(三)现实价值诉求——推进产教融合,健全职业教育教学标准体系

开拓职业教育理念,打通普职、终身、学历和非学历教育之间边界,实现教育资源协同化共享,是新时期职业院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选择。由此,立足普职融通背景,各院校以产教融合方式,高度衔接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可完善职业教育教学标准体系,为1+X证书制度有效实施提供指南。

一方面,优化产教融合方式,是普职融通视域

下 1+X 证书制度实施的现实价值诉求。职教 20 条准确提出开启 1+X 证书制度试点工作,鼓励技能人才获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和学历证书。1+X 证书制度作为职教改革的重要方法之一,其全面推广与运用有利于深化产教融合。普职院校以产教融合为目标,全面践行 1+X 证书制度,可畅通科学化探寻普职融通路径,强化职业教育适应性。例如,2021 年 7 月,吉利职业院校与吉利汽车湘潭公司建立联盟,共同开展 1+X 证书制度试点方案开发业务。职业院校作为 1+X 证书制度的实施主体,在试点制度过程中,助推学校与企业组织协作,驱动职业教育三教改革。自 2021 年 4 批 1+X 证书试点工作启动以来,产业、企业的主动性与内驱动力已经被全面激发,前 3 批总共遴选 78 家培训评估组织,累计提交 92 个 X 证书,第 4 批总体遴选 602 家申报主体,并提交 984 个证书。

另一方面,健全职业教育教学标准体系,是普职融通视域下 1+X 证书制度实施的现实价值诉求。在教学质量提升过程中,职业教育标准发挥着指引性和基础性作用,具有完善职业教育标准体系的重要功能。就标准内容而言,政府有效对接科学技术发展态势和市场需求,按时将新型工艺与新型规范引用至专业教学、课程标准,能够为实施 1+X 证书制度指引方向。职业院校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融入企业职业能力测验标准之中,充分体现职业教育教学内容的先进性与适应性,可丰富职业教育标准内容,为 1+X 证书制度贯彻落实提供指南。就标准体系而言,此体系囊括国家、行业企业、地方与团体等多主体标准。学历证书一定程度上可彰显人才培育的全面化、基础化和系统化价值。学历证书的教学标准要求与行业组织、国家、地方部门之间通用性标准有效匹配。通过社会化机制筛选培训评估组织,开发职业技能等级标准,可推动各团体与企业组织积极利用专业化教学标准体系,促使 1+X 证书制度全面实行。

(四)目标价值诉求——助推普职资源互通,实现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2021 年党中央出台《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若干建议》,提及“到 2025 年职业本科教育招生数量不能低于高职院校的 10%,综合设置职业教育技能人才培养机制,彻底打通由中职教育、高职教育到本科层次的技能人才培养‘桥梁’”。在这一政策机制驱动下,普职院校立足普职融通战略,打破资源融通单一发展路径壁垒,全

面实施 1+X 证书制度,可推动高职教育内涵式建设。

一方面,普职资源多元互通,推进高职教育内涵式发展,是 1+X 证书制度实施的重要目标价值诉求。各院校利用普职资源融通,整合不同地区设施设备、教师资源,优化 1+X 证书制度,可打破普职长期分离状态,全面实现人才共同培养目标。一是各院校以普职资源融合方式,打破普通教育重视理论、职业教育重视实践的固定形式,确保 1+X 证书制度有效实施,能够驱动高职教育内涵式发展。二是各院校“横向”打通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资源渠道打通,优化现有人才培养模式,可驱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为 1+X 证书制度全面实施创造良好条件。

另一方面,普职融通课程资源,驱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是 1+X 证书制度实施的核心目标价值需求。教育部门融通教育和信息资源,有效结合知识技能与生产实际,发挥 1+X 证书制度实施价值,可促进职业教育领域课程资源充分利用。其一,普职院校立足全国统一化职业技能标准,在选聘教师与建设学科体系过程中,参照职业技能标准实施 1+X 证书制度,能够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其二,教育部门促进职业院校由“以就业为导向”转向“以就业和升学并重”模式,培育精细化与高标准化复合型人才,可进一步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 二、1+X 证书制度实施面临的现实困境

(一)机制难题:系统化评估机制尚未完善

1+X 证书制度作为新型职业教育制度,已深入“三教”变革、“岗课赛证”综合育人环节,为中职和普通高中人才培养、教育教学监管和评估模式改革提供助力。但是,普职融通环境下,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缺乏高质量职业技能等级标准,加之系统化评估机制尚未完善,极大阻碍 1+X 证书制度有效实施。

一是普职院校缺乏专业化试运行评估机制。大部分职业院校存在 1+X 证书制度实施系统的自我调整机制僵化、求变积极性不足问题。在推广与筛选方面,相关执行部门缺少完善性专业化试运行评估机制,存在忽视区域和产业结构之间协同发展问题,致使 1+X 证书制度实施困难重重。从不同区域而言,经济发达区域普职院校 1+X 制度试点

实施效果良好。但是,经济落后区域具备发展潜力的院校较少,加之系统化评估机制有待完善,导致普职院校 1+X 证书实施受到阻碍。细究其因,自 1+X 证书制度深入实施以来,大部分普职院校推出一系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但多数通过培训机构通道开发 1+X 证书,缺乏科学化评估机制,造成普通院校 1+X 证书制度实施举步维艰。

二是技能证书系统化评估机制有待完善。普职院校考评机制倾向于一项或多项技能运用。然而,部分院校素质教育的重视度不够,产生了 1+X 证书制度评价方法单一、评价主体不确定等问题,不仅阻碍学生掌握专业技能,还制约学生获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现阶段,参与鉴定群体主要为技校毕业生、职业院校学生为主,部分鉴定人群来源于服务行业群体,但普职院校参与职业技能鉴定人员较少,主动参加职业技能鉴定群体仅占据应参加鉴定群体的 40% 左右。并且,既有 1+X 职业技能鉴定考试从国家题目库抽选,考试评估机制有待健全,致使相关部门技能鉴定过程中产生考试内容和企业生产要求严重脱节问题,极大影响 1+X 证书制度落实效果。

三是 1+X 证书等级标准化建设机制亟待健全。普职融通视域下,1+X 证书更新换代的速度难以与产业发展速度相契合,证书等级标准化建设机制亟待完善,制约 1+X 证书制度实施进程。同时,由于缺乏系统化调节机制,导致院校技能等级标准缺乏规范,阻滞 1+X 证书制度有效实施。

### (二) 分配难题:资源分配效能低

自普职融通加速推进以来,政府和教育部门将优质教育资源投入至不同普职院校,推动 1+X 职业技能证书制度实施。普职院校通过政府投入资金辅助建立实训基地,助力学生掌握职业技能,并考取职业技能证书顺利踏上工作岗位。然而,政府部门和教育机构拨款支付资金与设备难以惠及大学生上岗阶段,加之诸多教育资源未充分向社会层面开放,造成了重复投资和资源浪费。

就企业层面而言,普职融通视域下,1+X 证书制度实施迫切需要企业深度参加,且对具备参加证书改革资质的企业提出更高要求。但是,由于政府针对企业实施 1+X 证书制度资源投入分配效能相对较低,导致行业中多数小微型企业无法参加 1+X 证书制度改革。尤其是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处于相对封闭式办学模式下,企业难以追踪产业发展情况,产生了社会职业类岗供给不充分和人力

资源供给无效局面,极大制约 1+X 证书制度落实。

就职业院校层面而言,普职院校 1+X 证书制度实行的资源分配效率不高。部分院校 1+X 证书制度实施资源分配与投入未充分显现公平性,引致证书效力不足和社会认可度不高问题,加剧资源恶性循环。特别是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融通过程中,1+X 证书制度实施所需资金、人员调配未做到科学统筹安排,加之 X 证书的公信力和认可程度有待验证,使得“营养不良”与“营养过剩”现象凸显,严重制约 1+X 证书制度深入实施。据澎湃新闻网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 4 月,国内诸多培训评价组织关于行业企业专家与人员安排比例不足 40%,制约人力资源高效配置,造成 1+X 证书相关培训质量难以提高。

### (三) 融合难题:书证深度融通难度较大

普职融通环境下,立足国家专业化教学标准和职业标准,普职院校制定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相关人才培养方案。然而,各院校面临着缺乏完善化职业培育和培训氛围、人才培养目标和岗位需求之间匹配性不强等问题,加大书证融通难度。

第一,部分试点院校 X 书证融通存在盲目性。普职院校“为试点而试点”,造成证书制度落实要求与普职院校实际状况、专业化人才培养体系之间产生偏差。例如,在书证结合方面,中职院校、高职、中职和本科等院校难以与原先人才培养目标岗位有机统一,致使书证融合难度较大。与此同时,部分院校专业化人才培养目标与特定证书相对应的岗位能力要求之间差距较大,增加书证深度融通难度。通过参与考核的学生反映可知,近年来多数证书难度依旧偏高,总体通过率不高;部分 1+X 证书难度较低,整体通过概率偏高,加大书证融通难度。

第二,缺少融通 1+X 证书的方式和渠道。当前,诸多普职院校 1+X 证书制度依旧处于初级探索时期,缺乏书证融通创新方法和渠道。一方面,书证有效融通的专业化指导方法有待完善。如今大部分 1+X 证书融通工作处于摸索阶段,缺少统一化实施标准,无科学化设计和指导方案。多数中职院校和普通高中对 1+X 证书制度的解读不够深入,引致教师关于 1、X 之间关系的理解不够深入,难以将书证融通落地实行。另一方面,部分普职院校缺乏试点工作的统筹布局,造成 1+X 证书制度实施效果不佳。普职融通视域下,多数院校将 1 和 X 之间关系片面视作简单重叠,设计诸多“X”证书

相关认证培训,使得大学生学业和教师教学压力加剧。

#### (四) 协作难题:校企合作有待深入

在普职融通环境下,1+X 证书制度逐渐开始渗透于普职教育,增强职业教育培育人才和企业自身期盼的匹配度,传统“校热企冷”局面相对缓解。但普职院校在1+X 证书制度实施环节与企业用人单位合作效果欠佳,难以充分发挥1+X 证书制度实施作用。

一是企业与院校协同参加1+X 证书制度落实动力不足。制度实施前期作用不显著,导致企业将工作重心放置于管理和运营领域,由此产生校企共同实施1+X 证书制度效率不高问题。中职院校与普通高中领域有关校企合作不顺畅,致使企业在1+X 证书制度实施过程中作用弱化。实施1+X 证书制度之后,企业尽管在考试科目与考核手段方面参与动力增强,但未改变1+X 证书制度实施依然以培训机构和院校为主情况。在教学内容、职业技能层面,企业与学校之间达成良好协作,但职业教育供给与企业需求难以协调,导致企业参加1+X 证书制度实施动力依然不足。并且,多数企业1+X 证书制度的“职业化”特点不显著,职业技术等级证书含金量有待提高,阻滞1+X 证书制度实施。

二是缺乏新型产教融合平台。职业教育作为教育类型的重要形式,其典型特点在于完全依靠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然而,在招生机制影响下,普职院校缺乏1+X 证书制度共同实施平台。针对1+X 证书制度试点,教育部门明确规定,“证书研发必须核心企业参加,领头企业应参与认证研发,且代表行业最高标准”。然而,普职院校缺乏新型协作平台,制约制度实施进程。另外,考点院校X 证书培训与鉴定相关硬件与软件设备投入不足,缺乏智慧化共享制度平台,导致企业依旧处于初期参加,严重阻碍产教融合进程。

### 三、1+X 证书制度实施的创新策略

(一) 以组织融通为导向,构建校企命运共同体

2021年,教育部门和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有关在职业院校实施1+X 证书制度试点方案》,提出“全国各省在政策制度、资金管理与项目开展方面鼓励职业院校积极参加实施试点,以此驱动各院校与企业等部门达成合作”。故此,在普职融通良

好环境下,各院校应协同教育、人社与教育行业,衔接企业、学校、行业与培训评估组织和政府部门,建立校企命运共同体,促使1+X 证书制度有效实施。

其一,创建引企入校模式,全面彰显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实践性与可行性。职业教育属于类型教育,旨在培育高素质技能型人才。普职融通环境下,各院校应以组织融通为导向,设立引入优秀企业进入校园模式,开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符合学生发展、满足企业人才培养需要,驱动建立校企命运共同体。与此同时,中职院校和普通高中应通过校企合作,达到1+X 证书标准与人才培养方案有机融合效果,以高水平企业标准指引培育人才方向,深化三教改革。例如,各院校应以组织融通为方向,积极借鉴金职伟业和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1+X 产后恢复项目实施诸多工作,丰富产教融合方式。并且,中职院校和普通高中应规定职业技能等级标准、核心技能点、核定培训设备要求、教材目录、体例与资源建设任务清单,驱动1+X 证书制度有效实施。

其二,设立普职院校和产业园区协作平台,创新技能型人才培养模式。在普职融通大环境下,各院校应以组织融通为主导理念,建立产教融合命运共同体,成立由职教集团与产教融合型企业组成的认证制度,推动1+X 证书制度全面实施。例如,普职院校应积极与所属区域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园区和试验区达成合作,重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发展格局,助推1+X 证书制度深入践行。并且,普职院校与省内外企业应联盟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设计符合人才发展需求的1+X 证书制度。其三,推行教师和企业专家替换岗位办法,增强职业教育实践效能。普职融通背景下,各院校应以组织融通为发展方向,采取教师与企业专业互换岗位办法,构建符合产业发展、校企合作和社会认可度较高的学校与专业群,助力校企命运共同体建立。在此基础上,普职院校应有效衔接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和学历证书,积极参与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试点项目,为全面践行1+X 证书制度提供方便。

(二) 以机制融通为核心,建立动态化评估机制

普职教育阶段以学校协同育人为动力,推动中考招生由单一考定终身转向多层次选择、由学生被动选择转变至自主需求、由普职分流转向普职融通。由此,基于普职融通环境,我国应以机制融通为中心,建立动态化评估机制,有效践行1+X 证书

制度,助力普职教育形成阶段联合育人模式。

第一,以创新型人才培育机制融通为核心,制定灵活化技能人才培育效果评估制度。普职融通视域下,国家应深化中职院校复合型技能人才培育模式变革,夯实大学生全面发展基础,促使1+X证书制度全面践行。由此,教育部门、证书培训评估组织和职业院校应以重构普职机制为核心,建立动态型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效果评估制度。就教育部门视角而言,应注重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契合行业人才培养需求,开展复合型技能人才培育效果评估工作。就培训评估组织视角而言,应积极开展相关调查与研究工作,侧重监测自身与行业企业之间协作程度、契合职业标准情况和新技术新工艺要求。就普职院校视角而言,应建立以学生为核心的发展性评估制度,重点评估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科学情况,契合学生全面发展与个性化发展需要,以此加强职业教育技能人才培育适应性。第二,以健全技能制度为核心,完善技能型人才评估机制。普职院校应以机制融通为关键,深入职业资格制度变革,建立健全以职业资格评估与专项职业能力考核为主的技能型人才评估制度,推动1+X证书制度有效实施。与此同时,普职融通背景下,政府部门应与各院校达成联盟,构建多样化、科学化与社会化的技能人才评估机制,优化1+X证书发放制度,完善职业分类动态调整机制。此外,普职院校应升级职业技能测验标准,构建多层次、有机衔接的职业技能评估机制,增强1+X证书制度评估监管。

(三)以资源融通为宗旨,盘活职业教育和培训资源

21世纪以来,国家高度重视职业技能等级标准的优化升级,且在增强师资队伍建设和资源配置和科研层面大量投入优质资源,助力多类型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继而推动1+X证书制度全面落实。借此契机,政府部门应以资源普职融通为宗旨,有效利用教育和培训资源,引导普职教育院校参加证书研发、授予,助推1+X证书制度有效实施。

其一,激发政府资源优势,积极实行1+X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培训。国家应以资源融通为宗旨,在充分利用政府资源基础上,扩大1+X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培训规模,鼓励中职院校和普通高中生主动加入培训。与此同时,相关部门应延长1+X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培训期限,将中短期培训延长3-6月,切实保障各项培训质量。其二,盘活师资项目功能,撬动1+X证书制度试点师资培训资源。

全国各省教育部门应以多渠道聚集资源为宗旨,积极整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相关师资培训资源,融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和标准。并且,教育部门应以资源融通为宗旨,整合1+X证书制度试运行教师队伍培训资源。政府部门应发挥融通不同区域优势,开展师资培训项目的渠道功能,将1+X证书制度试运行教师队伍培训引用至普职教师培训计划之中,挖掘培训相关资源。一方面,普职院校应聚集教学创新队伍相关资源,开发境外培训技术项目,培育“种子”教师队伍。另一方面,相关培训评估组织应主动配合,确保1+X证书制度安全试运行,推动教师队伍培训项目顺利开展,助推1+X证书制度实施。其三,高效挖掘技工学校和种类职业培训机构资源,彰显技能培训灵活性。普职院校应以资源全面融通为核心宗旨,有效挖掘不同院校1+X证书培训资源,全面开展针对性强的技能培训,凸显培训技术的灵活性功能。

(四)以课程融通为目标,稳步推进证书职业标准融入课程体系

1+X证书制度是职业教育迈向新时代的重要标志。普职融通环境下,政府部门应激发社会各界力量参加职业教育发展的动力,助力普职院校1+X证书制度开发标准和专业课程设计有机融合。由此,普职院校应采取以课程融通为目标,稳步促进证书职业标准融入课程体系,有序实施1+X证书制度。

第一,重构证书职业标准融入普职课程制度链条。院校间应重视在1+X证书制度实施过程中充分体现学习成果,深度解析职业技能等级标准相应要点,以证书代替课程,助力职业技能等级标准与课程体系之间全链条融通。一方面,各院校应以X证书专班模式渗入至创新实践课程或专业核心项目化实践课程体系之中,为1+X证书职业标准融入普职教育指引方向。另一方面,不同院校应以课程融合为目标,探寻新场景X证书专门课程体系,积极推动普职院校混合式教学模式变革,满足学员定岗、跟岗和认识阶段关于X证书的培训考证需要。第二,高度衔接专业课程设计和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标准。普职院校应以融合课程为目标,针对衔接产业、工学融合、提高质量目标,将专业课程内容和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标准有机连接,推动1+X证书制度全面实施。首先各院校应力求以职业资格证书为导向,在课程设计方面积极融合实践教学,将能力培育与工作岗位有机结合,转变课程形式。其次普职

院校应以课程融通为核心目标,从课程设计、教学计划、理论教学和实训教学方面,将相关内容转化成专业课程。普职院校应采取专业课程教学内容与1 + X 证书考核办法,助力1 + X 证书制度有序落实。

### 参 考 文 献

- [1] 赵坚. 上海高职院校1 + X 证书制度试点:特点、举措与推进思考[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2(4).
- [2] 韦幼青,孙振东.“普职融通”的出场语境及价值向度[J]. 贵州社会科学,2022(2).
- [3] 刘友林,朱莹,吴南中.1 + X 证书制度视角下职业教育新生态及其形成路径[J]. 成人教育,2022(4).
- [4] 张国民.1 + X 证书制度的价值意蕴、现实困境与优化对策——基于职业教育“三个面向”的视角[J]. 中国高教研究,2022(4).
- [5] 李春鹏,范广辉.1 + X 证书制度背景下基于帕累托优化的产教融合实践及模型构建——以京东物流集团为例[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2(7).
- [6] 刘林山.类型教育视域下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要义、现实问题与推进策略[J]. 教育与职业,2022(7).

## Value Appeal, Realistic Dilemma and Innovation Strategy of the 1 + X Certificate System Implement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ooperation of Gener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Wang Jing*

(Xuzhou Polytechnic College of Bioengineering, Jiangsu, Xuzhou 221000)

**Abstract:** The 1 + X certificate system implementation is a major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engine for the national system to promote the reform of the evaluation mechanism for skilled talents and highligh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ype education. Under the environment of comprehensive implementing cooperation of gener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 1 + X certificate system implementation will help alleviate structural employment conflicts, deepen the reform of “teachers, teaching materials, teaching methods” and build a lifelong education system. By analyzing the current implementation of the 1 + X certificate system in China, the practical dilemmas it faces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the difficulty of in - depth integration of documentary evidence, the low efficiency of resource allocation, the incomplete systematic evaluation mechanism, and the need for further school - enterprise cooperation. In view of this, it should take organizational integration as the guide to build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schools and enterprises; take mechanism integration as the core to establish a dynamic evaluation mechanism; take resource integration as the purpose to revitalize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resources; take course accommodation as the goal to steadily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certificate professional standards into the curriculum system, so as to ensure the steady implementation of the 1 + X certificate system.

**Key words:** cooperation of gener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1 + X certificate system; skilled talents; integration of enterprises with vocational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青少年论坛】

## “Z世代”的新特征、困境与对策

吴俏萍 李文杰 隋月红

(中国计量大学 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Z世代又称互联网世代,是美国及欧洲的流行用语,指出生在1995-2009年间受到互联网、即时通讯、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等科技产物影响很强的一代人,他们的思想和行为特征受到中国社会环境新变化的较大影响。近年来,经济发展与数字化深度融合发展的态势明显,新冠大流行强化了数字经济向无接触方向的渗透,这种变化将会较为深刻地改变未来生产生活方式,文章以杭州调研的事实,揭示Z世代的新特征、时代性,存在的群体性困难与成因,从帮扶新时代年轻人成长、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角度,提出推进国家未来高质量发展的对策。

**关键词:**Z世代;Z世代的新特征;Z世代发展问题;数字化

**中图分类号:**D66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885(2023)01-58-04

### 一、Z世代的新特征——基于杭州的调研

杭州被称为青年型城市,户籍青年人口比例达21.6%,高于20.6%的全国平均水平,杭州也是全国的数字之都,2022年8月至10月,通过访谈、问卷调查法和文献调查法,以青年人口较多的杭州市为调查区域,研究获取了Z世代新时代特征。

本研究按照整群抽样的方式,以年轻人口占各区人口的比例为标准,选取下城区、钱塘区、西湖区、滨江区,再随机抽取四个区中的两个街道,采取拦截式访问的方法,拦截900余名群众,获取了323位Z世代人群的问卷。

#### (一)数字原住民

根据调研与访谈,Z世代受科技影响巨大,网络资源及数字文化承担了这一群体的启蒙教育导师的角色,这一群体更加依赖数字化消费的便捷性,也助推了“懒丧宅”文化的形成。此外,Z世代清晰地认识到当前科技的发展程度,对更高质量的服务和定制新品的需求不断增加,他们高度依赖线上服务平台,在网络直播,短视频等新兴数字化平台上消费量庞大;在工作偏好方面,Z世代不再拘泥于“铁饭碗”,他们有更为丰富的职业选择,拥有多重职业和身份的“斜杠生活”逐渐在这一群体中流行,网络主播、自媒体创作者、自由摄影师等新兴职业成为他们彰显个性与爱好的标志。据调研样本统计,即使是休闲方式,仍有70%的Z世代愿意

收稿日期:2022-11-1

基金项目: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资助项目(202110356034);国家社科基金《我国标准“走出去”与贸易强国战略研究(18BJL102)》、浙江省普通本科高校“十四五”教学改革项目《长效协同机制下数字化服务贸易国际化人才培养(jg2022027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吴俏萍(2002-),女,浙江温州人,中国计量大学本科生,研究方向:国际经济与贸易。

李文杰(2002-),女,浙江衢州人,中国计量大学本科生,研究方向:金融工程。

隋月红(1982-),女,湖南株洲人,中国计量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国际贸易与理论经济、标准经济与国际化。



通过线上方式进行,其中,短视频和游戏是他们参与积极性较高的两项活动。

### (二) 独而不孤

大量Z世代青年因为工作或者学习选择离开家乡,来到大城市,他们单身独居,没有家庭生活,成为了“空巢青年”,杭州为例的街头拦截显示,平均每10人中有2至4人是“空巢青年”。他们追求有效社交,工作与生活的界限清晰,较难与同事发展亲密关系,调研显示,他们的同事关系亲密密度、同事依赖度和同事接触频率各均值在五级评分量表里都为“3分”,即一般水平。此外,调研中发现,Z世代与父母关系“亲而不近”,他们与父母的交流频率不高,平均效应值仅为中等水平“3分”,但是与父母的关系较为融洽,相关问题的效应值为“4分”,这意味着,父母的情感支持是他们极大的心灵慰藉。而作为地缘社会关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同乡关系和邻居关系,在五级评分量表里的均值分别为“2分”和“3分”,表明Z世代的城市邻里关系、同乡关系等地缘关系甚至要弱于远在他乡的父母。然而,很大一部分Z世代青年却自愿成为这一群体,享受其带来的孤独,呈现出“独而不孤”的特点。他们愿意“花钱买寄托”“一人食”“一人游”等孤独经济的产物受到他们的青睐,宠物也成为他们别样的情感寄托。

### (三) 躺平青年

Z世代经历了超越前几代人的教育竞争,内卷伴随他们进入大学乃至工作中。然而,在激烈的竞争下,Z世代出现反内卷、反竞争的行为,“躺平”“佛系”成为他们的口头禅。但是,他们对激烈的竞争以及目前仍旧存在的阶级固化、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等现实具有清醒的认知,Z世代的“躺平”并不意味着完全放弃,调研显示,这种心态只是极度“内卷”情况下暂时的心理慰藉,样本中有73%的被调查者在业余仍旧会在网上自学专业知识与技能。

## 二、Z世代发展问题及成因

### (一) 数字化的破坏效应

我国的数字经济发展势头正盛,数字化与经济深度融合带来了极大的创造效应,提高了社会生产效率,产生了新业态、新模式,使企业产品与服务更加契合消费者的需求,让Z世代能够享受到更为便捷的服务和灵活的职业选择。但是,对未来劳动力市场主力军的Z世代来说,数字化转型让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可以通过“机器换人”的方式减少劳

动力要素投入,这将导致企业对从事标准化职业的劳动力的需求下降,使Z世代面临较大的就业压力。再者,新业态驱动了Z世代的“斜杠生活”,极易让Z世代陷于“全面但平庸”的泥潭。数字化可谓又给Z世代群体带来了深刻的破坏效应。

#### 1. 机器换人对Z世代提出的挑战

根据宏观经济学失业理论,工资刚性会使得公司给予员工的实际工资高于均衡工资水平,此时,劳动力的供给会超过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会产生结构性失业现象,并且最低工资法将非技能型工人和缺乏经验的工人的实际工资强制维持在均衡工资水平之上,因而企业会减少对这部分劳动者的需求。Z世代的现状十分契合这两项失业人口的特征。

“招工难”“人口红利消失”等紧迫问题使得制造业企业抓住数字化这一契机,加快“机器换人”的速度。“机器换人”导致了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再度减少,甚至于机器自动化的高度准确性和稳定性要优于人力劳动,替换了高度标准化、流程化的工作岗位,反向地增加了企业对传感器技术、数据采集技术、代码编写、软件架构等具备创造性的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所以,当前正在学习或已经掌握某些高标准专业技术的Z世代青年,进行自身技术的更新与创造性发展,抑或扩充自身的技能迫在眉睫。

#### 2. “斜杠生活”增加未来不确定性

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催生了“个人+平台”的方式,让个人成为企业的“合作者”而非“雇佣者”,使个人拥有更加灵活的就业方式。这让Z世代化身具有多个职业和多重身份的“斜杠青年”成为可能。但是,职业多样化通常需要以技能的专业化为前提,只有专业化才可以让劳动力具有可雇佣性与市场适应性。然而,Z世代的“斜杠生活”会让他们的对于各种技能与职业浅尝辄止,对某一技能的认知含糊不清,模棱两可,造成全面但平庸的局面,极易降低这一群体的入职成功率。此外,即使成功拥有多个职业,为了达到继续留在企业的绩效,Z世代需要对各个岗位投入同样的精力,如何平衡多个职业的时间又成为一个现实问题,职业朝不保夕成为他们的一大难题。无论是入职成功率的降低还是解雇概率提高都将影响Z世代未来收入的稳定性,增加不确定性风险。

#### (二) 城市化下Z世代归属感低

传统的中国社会为以伦理维系的“熟人社会”,在熟人社会中,人们日常见面,在生活上相互

合作,基于情义的原则组织关系,依靠礼俗维系共同生活。然而,城市化的推进拓宽了人们交往的界限,加速了人员的流动性,知识得到快速传播,创新与新技能获取便捷,也推动了人们与更多的陌生人打交道。传统的“熟人社会”带来的安全感与归属感被高度城市化下的“陌生人社会”中的知识交流与商业活动所抵消。此外,城市化下的住房问题对于已步入社会的Z世代来说是一大困扰,他们发现越来越难以通过自身力量在大城市购置房产,而以租房形式解决住房问题也减少了他们的城市归属感。

### 1. Z世代难以从“脱嵌”到“再嵌入”

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Z世代的个体化进程也在不断加速。贝克认为个体化具有三个维度,即“脱嵌—去传统化—再嵌入”,“脱嵌”为个体从原本的家庭关系,阶级关系等社会关系和社会形式中脱离出来,“再嵌入”为个体受到新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制约,重新嵌入到新的社会关系或社会结构中。青年群体脱离原有的固定的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网络,摆脱传统社会观念的束缚,来到陌生城市,通过工作、社会活动、兴趣组织等新的社会关系或社会结构重新融入到城市是这一群体个体化的表现。然而,城市化导致社会关系逐渐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变,虽然使得青年不再紧紧依附于传统的亲缘与业缘所创造的共同体中,表现出极大的“脱嵌”状态,但是这一转变将Z世代有限的人际交往时间分散在与大量的陌生人的交际中,导致人与人之间接触的浅表化。此外,城市化加速带来的繁忙工作挤压了休闲时间,让Z世代更加清晰地划分工作与生活的界限,更加注重有效社交,导致他们更加难以“再嵌入”新的社会关系中。

### 2. 人际关系冷漠带来的自我封闭

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的紧张工作和生活导致都市里生活圈的人们之间互不关心,高度城市化下,同事之间交流的割裂,带来了人际关系的淡漠,社会交往质量严重下降,虽然Z世代享受着孤独的乐趣,但是人毕竟具有社会属性,完全不感到孤独的“空巢”Z世代青年只占很小的比例,孤独感仍旧存在于这一部分Z世代群体中,调研数据显示,有74%的青年有较重甚至是严重的孤独感。冷漠的人际交往环境更加无法缓和青年的孤独感,久而久之,个体孤独感容易导致青年对所在城市产生厌倦心理,使他们愈发难以融入城市之中。加之互联网社交形式多样化,青年群体越来越沉浸于虚拟的社

交欢愉之中,陷入自我封闭,在现实中成为被网络空间所分隔的“孤岛”,完全脱离于空余时间的现实社交圈,自我封闭程度增强。

### (三) 高等教育职岗分层缺位下的内卷

自动化、人工智能对高度标准化工作的替代,让劳动力市场出现极化现象,工作岗位高度集中分布在不能被机器所替代的低技能服务业与高技能职业两个极端,处于中间位置的中等技能的职岗被机器替代,大大加剧了追逐高学历的“独木桥”效应,高等教育的有效分层被提上日程。

#### 1. 高校人才培养的同质化

根据美国学者马丁·特罗著名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理论,一国的高等教育会经过“精英化——大众化——普及化”三个阶段。我国的高教事业已经迈入大众化并逐渐接近普及化。然而,我国高校办学思路仍旧停留在以精英教育阶段为标准的时代。

原本高等教育的分层正是展现各类高校特色,发挥各自优势的有效途径。然而现实中,高校间存在着无形的鄙视链,促使了各层级高校生内卷严重。在办学理念上,职业高校相继照搬本科大学的办学路子,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哄而上办热门专业、选择办学成本较低的人文社科专业等现象,对职业规范高但技能要求不高的职岗培养不够重视,造成培养人才的应用型特征不明显。综合视野下,高等教育三个层级的Z世代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目的变得功利化,在校中焦虑浮躁之风盛行,一方面,专业选择倾向于追求精英化;另一方面,学习目标变得短视化,需要投入大量时间精力而短期回报微薄,尝试性探索活动和实验难以获取他们的注意力。快速爬升更高一级成为青年选择专业门类的重要标准,而某些关键技术、需要知识与技能积累的专业成为了冷门专业,人才培养的结构与产业发展需求脱节,使得人才培养陷入同质化。

#### 2. Z世代选择的单一化

高等教育中的“重点高校”“普通高校”和“职业高校”等层级本可发挥各自所长,为社会提供多样化的人才,但是,长期以来,社会的单一认识驱动了各高校学生普遍追求向上一层级的跃升,社会中存在的学历偏见促使这种“可能选择”成为一种“必然选择”,让原本的高等教育职岗分层机制成为了高等教育的爬升机制。

访谈显示,在本科毕业生初次就业时,重点高校的学生在职业类别、地位级别和收入等方面优于普通高校毕业生,聘用人才的标准对就业的影响使得

Z世代不得不考虑通过专升本、考研等方式进入更高的学府,抑或是得到更高的学位消弭院校差距,教育分层叠加高等教育大众化带来的学历贬值使得Z世代竞争更加激烈,为了获得竞争的胜利被动进行单一化的选择。

### 三、解决Z世代发展问题的对策建议

#### (一)鼓励创新性竞争

身处数字化发展日益迅速的今天,尽管数字化与Z世代就职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青年群体需要利用创新创业精神抵消数字化的破坏效应。因此,国家和地方政府需要鼓励创新创业,提供支持性政策;青年群体则可以以兴趣和意愿为导向,培养自身长处,打造独特的竞争优势,形成各具特点的创新竞争态势。另外,借助新科技浪潮,围绕“兴趣经济”发展而来的新职业形态,使得曾经“不务正业”的职业转正,出现了球鞋鉴定师、品酒师、宠物入殓师等新职业类型,Z世代青年也可以紧跟这一趋势,依托线上平台,将自身兴趣拓展为新职业形态。

#### (二)完善职业保障体系

数字化让青年有更多样化的职业选择与灵活的工作与生活的时间安排,但“斜杠生活”也增加了Z世代入职的不确定性和被解雇的风险。为了缓解这种不确定性,政府应积极落实职业保障制度,建立完善的职务保障,明确将员工开除和调离原岗位的基本情形;在职业培训方面,政府应与高校共同开发公益性质的新技能专业知识培训,将高校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使得“斜杠青年”在零工经济下拓展职业选择,提高其技能的专业性,保证可雇佣性。

#### (三)城市给予青年更多归属感

高度的城市化带来了物质生活的富裕,却也带

来了Z世代青年情感的空虚,削弱了他们对城市的归属感。Z世代本质上是充满活力的群体,只有当城市的活力得到释放,城市才能具有多样性,青年才能在城市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更好地融入城市。因此,政府在推进城市化时不应只追求城市规模与人口的扩大,还应力求城市活力的释放,包括城市的创新活力、城市生活的舒适、城市服务的精细等方面,政府可根据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化地引进外商投资,发展城市群,加强国内各地区之间的产业投资合作与对口衔接,发挥知识溢出效应,促进各城市的创新活力。还需加大财政投入,修筑青年公寓、廉租房、公租房等,帮助青年改善生活条件,减轻生存压力,让青年“有房可住”。此外,政府应设立公益性质的心理咨询组织,针对“空巢青年”和失业青年等具有特殊要求的青年群体给予心理疏导,安抚这类特殊群体的消极情绪,引导其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和价值观。青年自身也应积极投身社交活动,加强线下交流,拓展个人的社交圈,以此排遣孤独感,增强对城市的归属感。

#### (四)改变学历偏见,加强校企合作

高等教育分层的缺位以及社会层面的学历歧视加深了Z世代低效的内卷,就业单位应破除“唯学历论”的招聘标准,让招聘要求与岗位要求相适应,与劳动力的学习、工作经历相匹配,从劳动力需求层面转变学历偏见的不良局面,避免出现人岗不匹配、高学历者无法到与之能力结构相符岗位的人才浪费现象,从根本上解决高校学生学习过于功利化的问题。高校与企业也应直接对接,了解企业需求,让课堂的理论知识更加专业化与精细化,结合企业实习的方式使学生更能适应市场需求变化。

### 参 考 文 献

- [1] 任程远.“Z世代”消费驱动的新型经济形态:基于调研数据的分析[J].商业经济研究,2022(20).
- [2] 吉永桃,冯建军.陌生人社会中人的境遇与道德教育的重建[J].南京社会科学,2022(11):69-77. DOI:10.15937/j.cnki.issn1001-8263.2022.11.008.
- [3] 梁爽,陈雪娇.“在云端”:智能媒介技术推动下的青年职业衍生与青年文化延展[J].中国青年研究,2022(11):22-29. DOI:10.19633/j.cnki.11-2579/d.2022.0153.
- [4] 郑璐.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障的政策障碍与建议[J].就业与保障,2021(10).
- [5] 魏坤朋.高等教育分层背景下的考研选择与考研分化[D].沈阳师范大学,2022. DOI:10.27328/d.cnki.gshsc.2022.000463.

(下转第66页)

【青少年论坛】

# 自媒体环境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高宝全 贺姗姗

(黑龙江科技大学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0)

**摘要:**无处不在的自媒体环境已经成为影响大学生价值观塑造的新变量,自媒体在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负面影响。一些大学生对自媒体的过度依赖和非理性使用,导致其价值目标失控,本我存在虚拟化,进而使得价值实现过程呈现技术化、低俗化特征。通过对自媒体背景下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分析,提出大学生价值观塑造的引导策略,即引导大学生回归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劳动实践,回归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交往实践,政府与平台的融合共治,推动自媒体环境与大学生价值观的塑造从“冲突”走向“整合”,实现二元世界的虚实共生。

**关键词:**自媒体;大学生;价值观;影响;应对策略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885(2023)01-62-05

自媒体是一种用户主导信息生产和传播,以移动通信技术为支持,允许用户随时以语音、文字、图像、视频等形式生成、评论、转发、分享内容的移动化、数字化和便捷化的信息发布平台。当代大学生作为自媒体环境的活跃群体,其思想行为和价值取向必然受到自媒体的强烈冲击。从大学生心理需求分析,站在现实社会的视角看待大学生价值观发生变化的根源,以马克思关于人的价值理论为指导,以“人的价值就是作为客体的人的认识和实践活动对作为主体的人的各种需要的满足”为依据,引导价值观的形成。人类创造出自媒体,在自媒体环境下依靠技术进步,丰富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实现自身发展。但是,大学生在运用自媒体的过程中却反被其所控制,特别是处于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常常受到自媒体隐蔽而持续的价值诱

导,出现了主体意识淡化和批判意识缺失的普遍现象。因此,研究自媒体环境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及应对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实践和时代意义。

## 一、自媒体环境对大学生价值观影响的现状

### (一)自媒体环境下当代大学生价值主体现状

#### 1. 主体价值目标的失控

自我是价值实现的主体,自媒体环境下大学生价值实现过程中自我虚拟化特征明显。拉康的镜像理论认为,人的自我认同是通过他人的承认来实现的。在自媒体环境下,当代大学生将虚拟身份建构和群体凝视作为自我价值实现的过程。大学生的真实需求被虚假需求所取代,网络技术催生的信息茧房和网络“意见领袖”的话语霸权,导致主体

收稿日期:2022-11-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思政专项“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在我国高校传播中的意识形态风险及防范研究”(项目编号:20VSI125)。

作者简介:高宝全(1983-),男,山东茌平人,哈尔滨工程大学博士研究生,黑龙江科技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

贺姗姗(1996-),女,陕西咸阳人,黑龙江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在现实世界的多元价值目标缺失,主体对个人价值目标缺少独立判断,价值目标的主体控制权被剥夺。主体的本我形象被边缘化,主体需要通过客体的认可来体验“自我价值”实现的满足感,价值实现的内容成为了迎合客体而虚构出来的内容。网络大V等网络名人在一定程度上垄断了网络话语权,这些“意见领袖”传播的信息相对单一,导致大学生尚不明确的价值目标在自媒体的舆论旋涡中被“同质化”。对自媒体的过度依赖导致大学生丧失了主体意识,被非理性所控制,主体行动动力减弱,逐渐放弃对主体价值目标的追求。

## 2. 主体物质存在的失位

自媒体环境中交往的主体都是以各种抽象的符号形式存在的,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媒体环境中通过给自身塑造不同的形象与他人交往,现实中的一个人可能具有多个虚拟身份,多元的虚拟身份导致当代大学生主体的自我认同困难。在自媒体环境下,主体的身体不需要真实出现,主体的物质本我展现呈现“缺场”状态,现实的声音、容貌、体态、气质等均可退场,物质本我被一串串数字和符号所取代。大学生沉溺于打造完美的虚拟自我而忽略了对现实自我的关照,在日复一日的虚假满足中,主体对本我的形象认定变得模糊,主观的臆想、刻意地呈现和精心的塑造替代了客观的真实形象,从而给自我概念的重构带来矛盾和冲突,造成了主体自我价值的迷失。

## (二) 自媒体环境对大学生价值实现过程的影响

### 1. 价值实现途径呈现技术化特征

自媒体环境下,当代大学生价值的实现更多地依赖于网络和技术,在粉丝经济、流量为王的驱使下,作为工具的自媒体技术成为了奴役人的工具。“自媒体”逐渐涵盖了人类所有的生活方式,很多大学生都做着依靠自媒体技术一夜暴富和成名的美梦,把大部分精力用在研究自媒体平台的应用上,用在如何发布博人眼球、迎合大众的信息,全然不顾人之为人的一些基本生存功能已然丧失,如感知、计算、记忆等,长期浸泡在自媒体环境中,很多大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放弃了思考、放弃了独立,放弃了精神与意义,放弃了依靠自我的力量实现价值的初心。再者,大学生在虚拟生存和现实生存之间频繁切换,碎片化、表层化的表达和阅读方式,使其失去理性、耐心、创造力和深入思考的能力,推送功能等“隐蔽性”技术设计,导致主体的价值选择权

被强制统治。

### 2. 价值实现方式呈现低俗化特征

从需要满足方式上来看,自媒体环境下人的需要满足方式比较单一,主要集中在主播与粉丝的互动、刷礼物、点赞、打赏等来体现个体的价值,这并非自我潜能的真正发挥。这种虚化的价值实现方式并不是现实的实践路径,必然会带来异常的行为结果,即使是极少数成功的大学生网红明星们,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自我价值,似乎无可厚非,但更多的还是依靠低俗的表演来满足人们的窥视欲和猎奇心理。而且,这种虚化的自我价值实现方式,在自媒体时代会快速地扩散,为更多的青年提供消极的榜样和不良示范。

## 二、自媒体环境对大学生价值观影响的根源

### (一) 自媒体环境对大学生价值观影响的心理根源

#### 1. 源于人的心理需要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最基本的两种需求就是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自媒体环境下,虚拟的网络空间难以对人提供现实的知觉,人的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受到抑制,人的需要以一种虚化的方式表现出来。投入到虚拟社会交往的人饥饿感往往会降低,神经系统的过度兴奋造成生物钟混乱,睡眠的需要也会降低,具体表现为自尊、人际关系和自我实现等心理需要的非理性膨胀。自媒体时代,主播与粉丝之间互动更多的是满足交往和自尊的需要,人的信息传播和娱乐性质的才艺表演占很高比例,话语表达的门槛被降低,从而满足更多人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自媒体环境一方面抑制了人的生理需要,另一方面又诱发了人的心理需要,并通过降低低层次需要的感觉阈值而让人直接进入到了更高层次的需要,造成了个体生理需要和心理需要的倒置,人的真实需求被虚假需求所取代。

#### 2. 源于大学生特殊群体的心理特点

首先,大学生经过了高中紧张的封闭式学习生活,到了大学之后会自然出现“心理放松期”,网络则成为了当代大学生心理放松的最佳媒介。其次,大学生正处于自我独立意识高速发展期,迫切需要成为他人关注的焦点,在现实世界中,当大学生难以得到他人的关注和尊重时,就会通过网络自媒体来获得心理安慰。自媒体时代,尤其通过直播方式获得的代入感能够让大学生体验到聚光灯下被大

家关注的感觉。再次,大学生掌握了一定的知识文化,其自我实现的欲望更加强烈,当现实生活难以实现其人生梦想,自媒体就成为当代大学生自我实现的有效方式。

(二)自媒体环境对大学生价值观影响的社会根源

### 1. 社会关系的物化

社会关系物化理论认为,人生产出来的商品反过来奴役人自身,因而人自身也成为了商品。自媒体时代的来临,给大学生的需要满足和价值实现提供了多种渠道和途径,但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控制和奴役人的工具。而人之所以会沉浸在自己所发明的工具之中,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寻求满足,其本质原因在于现实世界的一些生产关系的物化导致社会关系存在物化倾向,虚拟世界不过是现实世界的反映。在自媒体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现实世界人际关系的反映,人在虚拟世界所得到的满足感,恰恰是在现实世界中无法获得的一种虚拟替代性满足。在网络世界中,经常发表言论的键盘侠们,在现实世界中往往是沉默寡言的人,他们很难在现实中获得话语权,也缺乏现实的表达能力,人在现实世界中难以满足自身的心理需要,就会在网络中寻求满足的渠道。

### 2. 资本逻辑的操纵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自媒体环境中,在“流量为王”的利益驱使下,人人都坚信可以通过流量争夺快速成为明星网红,获得资源财富。自媒体已经沦为价值增值的工具,在这样的资本逻辑背后,大学生沉迷于轻轻触碰指尖就能名利双收的幻想中,无视金字塔结构的世界,也不想承认大多数粉丝群体只是个别人成功的注脚。自媒体时代能够一夜成名的梦想,其实大部分是幻想,往往掩藏着内在的残酷。在网红经济刚刚诞生之初,成功的概率相对会大,而当人人都想成为网红,所有人都急迫地冲向这根独木桥时,最后的结果可能是桥断梦空。网红经济已经形成了一个产业链条,人人都知道成为网红、成为明星会获得巨大利益,但网红们并非是像想象中的那样唱几首歌、表演一个节目就能够一夜成名。在网红成功的背后,有一个巨大的产业或者公司在包装、运作和投资,自媒体与各种盈利模式叠加,充当资本的吸金术,资本运作像一只无形的手在控制着自媒体时代的网络世界,网络主播必须和资本相结合,投靠到大公司、大平台,采用商业推广、网络营销策划等多种公关手段来进

行包装和打造,才有可能成为明星。为了迎合观众的需要,主播必须放弃自身的需要,符合公司和平台的利益和要求,所以即使成为了网红明星,也并非是其真正本我价值的体现。

### 3. 网络秩序的失衡

虚拟世界源于现实世界,映射着现实世界的冲突与统一,与现实世界同属于人化的自然。网络社会是现实社会的延伸,应得到综合有效的治理,人的行为边界应当被明确。然而,自媒体环境下个人观点表达不受时间、空间、环境的限制,具有即时性、偶发性、随意性等特点,给网络秩序管理造成了困难。由于网民规模巨大,参与主体广泛活跃,少数群体歪曲的价值观念经多媒介交叉传播和舆论环境的发酵,造成网络秩序失衡,网络舆论群体狂欢、泡沫激增、情绪极化和商业化等现象频现,网络舆论经常会呈现非常态化的表现方式,如情绪化、盲从的宣泄、嘲讽、谩骂,而不是客观、理性的评判和分析,甚至有人为获取经济利益游走于法律的边缘。自媒体虽然具有自主性,但更应该凸显其作为一种工具的公共属性和社会责任,坚持崇德向善,确保自媒体流淌着“正义的血液”,始终不偏离主流价值观的正确指向。

## 三、自媒体环境对大学生价值观影响的应对策略

### (一) 劳动实践:实现从“虚拟”回归“现实”

马克思主义哲学意义上的实践概念是指“感性的人的活动”,他在分析人的价值时,指出人是现实的、感性的人。人的需求满足必须建立在现实基础之上,人的身心发展离不开实践活动。自媒体环境下价值观受到冲击是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积极参与劳动实践,特别是参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劳动实践,实现从“虚拟”回归“现实”。劳动实践可以满足生而为人的各种需要,首先,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是其他需要满足的基础,吃喝睡眠、居住环境等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需求,是人的生命得以持续的现实条件,这种需要在人未成年时理应由社会和家庭给予满足,而在成年有社会劳动能力之后,应当由个人通过劳动创造价值来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虚拟满足只是一种补充,当代大学生要树立自力更生、劳动光荣的观念,将现实的劳动作为满足自身基本生活需要的现实路径。自媒体技术为人们实现价值提供了一条快速通道,但实际上这种价值的获得并不深刻,也不可持续,

而现实劳动创造的价值具有叠加效应,并可维系下一个价值的创造。

### (二) 交往实践:实现教育力量的整合

虚拟交往丰富了大学生传统的交往方式,但这种方式也极大地冲击了人与自然的交往互动以及人在家庭、学校、社会中的现实实践,消解了现实活动中产生的激情和热情,“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大学生应该投身现实,在自然、社会、学校、家庭等现实环境中展现真实自我,关注自我内心的真实心理需要。心理需要是在现实生活中积累起来的高级情感需求,包括爱与归属的需要和尊重的需要,沉迷于自媒体的当代大学生往往在现实世界中缺乏爱的表达能力、感受和体验能力,缺少自我价值的认同,大学生要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尽量去体验现实的成就感。当然,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的塑造与矫正不应仅凭借一方之力,这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协同教育,给予大学生展示才华的机遇,引导他们走出网络,投入现实世界,帮助青年一代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学校要不断创造环境和条件,畅通大学生接触自然,接触社会、接触新人物、新事物的通道,让青年大学生体验现实世界的情感价值,激发其找到在现实中实现价值的方法和途径。社会、家庭、学校不能将学习作为青年大学生发展自我和实现价值的唯一途径,如果在现实世界中价值实现的途径过于狭窄,那么必然会压抑人的诸多天性,抑制其潜能的发挥。青年大学生需要在集体活动中建立积极的同伴关系,在彼此的交往中竞争与合作,充分体验获得爱和尊重的过程。

### (三) 加强监管:实现政府与平台的融合共治

虚拟世界的内容需要管理和规范,不能成为无政府主义的自由领域。张明仓教授在《虚拟实践论》中对我国学者关于网络伦理的探索成果总结概括为四个方面:关心公益,造福社会;平等互尊,互利互惠;以诚相待,杜绝欺诈;维护网络安全,反对“数字化犯罪”。现实世界对虚拟世界的道德指引和法律约束是二重世界和谐共生的制度保障。虚拟社会中,互联网技术本质是劳动资料中起决定作用的生产工具,如果技术同人类发展的根本利益背道而驰是应当被禁止的。政府相关部门必须建立起强大的网络监控体系,在宏观设计和微观操作层面同时发力,建立信息资源共享长效机制,打通信息互通的壁垒,走出信息交互渠道模糊的困境,促

进多种舆论交错融合、多种舆论场域联通共治,可在重点技术平台或企业设置专人专岗开展监督指导。平台要在政府指导下运用新技术赋权网络治理,实现“以技治技”,建立常态化、数字化、动态化的监测和预警系统,形成协同共治的治理进路,构建多主体共同参与的网络治理新范式。未来,伴随人工智能逐渐渗入人类生活,人工智能将与哲学、认知科学、神经科学交叉融合来探索人工共情,这需要有前瞻性地推进治理技术进化的研究和运用。

### (四) 虚实共生:实现从“冲突”走向“整合”

“共生”概念源于生物学领域,指不同生物之间形成的紧密互利关系。哲学意义上的共生主要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联系,其前提是承认对方的独立性和固有价值。自媒体时代人生存的现实场域与虚拟场域共存、现实生存与虚拟生存并存,认可虚实存在之间的差异性及其彼此存在的价值,构建虚实共生是解决大学生价值虚化的必经之路。虚拟世界对于解放精神生产力虽然具有强大的功能,但也会使人对现实世界产生排斥和厌倦,二重世界的发展现状导致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出现冲突,虚拟与现实融合的新价值观尚未完全确立,大学生需要平衡好虚拟与现实的关系,科学合理利用自媒体,实现从“冲突”走向“整合”。虚拟存在以工具性的方式而存在,其最终目的还是服务人的现实发展和现实存在状态。既要考虑到工具理性的实用功能,又要考虑到价值理性的引导作用,摒弃和避免负面作用,将个人价值利用网络直播途径迅速传播,扩大为社会价值,从而实现的大学生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如鼓励科学家、工程师和教育工作者进行网络直播,传播和普及科学知识,引领大学生价值观;鼓励工人技师和各行各业的普通劳动者走上网络世界成为主播,培养大学生劳动意识;鼓励专业的心理学工作者成为主播,走进当代大学生的内心世界,帮助大学生了解自我。

自媒体作为一项新技术,既是包袱又是恩赐,不是非此即彼的结果,而是利弊同在的产物。不能抗拒和否认自媒体带来的技术红利和社会进步,但是却不得从前瞻性的角度去充分评估其潜在的弊端和缺陷,顺势而为、违害就利、有效转化,优化和重塑网络空间的价值引导策略,推动自媒体技术为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而服务。

## 参 考 文 献

- [1] 刘娜. 自媒体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及对策[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6, (07).  
 [2] [美] 尼尔·波斯曼. 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M]. 译者:何道宽.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 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4] 张竑. 虚拟实践研究[D]. 中共中央党校,2019.

## The Influence of We – media Environment on College Students' Values and Countermeasures

*Gao Baoquan, He Shanshan*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00)

**Abstract:** The ubiquitous we – media environment has become a new variable that affects the shaping of college students' values. While we – media carries forward the theme and transmits positive energy, it also inevitably brings negative effects. Some college students' excessive dependence on and irrational use of We – media have led to their value goals out of control, the existence of virtualization of the id, and thus the value realization process is characterized by technicalization and vulgarization. By analyzing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values in the context of We – media,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uts forward the guiding strategies for college students' values shaping, that is, to guide college students to return to the labor practice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to return to the communication practice of human and human, human and society, and human and nature, and to govern together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government and platform, promote the shaping of the self – media environment and college students' values from "conflict" to "integration", and realize the coexistence of virtual and real worlds.

**Key words:** We media; college student; sense of worth; influence; Coping strategies

(上接第 61 页)

## New Features, Difficulti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Generation Z"

*Wu Qiaoping, Li Wenjie, Suiyuehong*

(China Jiliang University, Zhejiang, Hangzhou 310018)

**Abstract:** Generation Z is a popular term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They are a group of young people born between 1995 and 2009, also known as the Internet Generation. It refers to a generation of people who are greatly affected by technological products such as the Internet, instant messaging, smart phones and tablet computers. Their ideological and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are greatly affected by the new changes in China's social environment. In recent years, the trend of deep integr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igital development is obvious. The COVID – 19 pandemic has strengthened the penetration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n the contactless direction, and this change will profoundly change the future production and life style. Based on the facts of research in Hangzhou, this article reveals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of Generation Z, their epochal nature, existing group difficulties and causes,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lping young people in the new era to grow and play a mainstay role,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to promote the country's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Generation Z; New characteristics of Generation Z; Development of Generation Z; Digitization



# 职务犯罪治理的经济学研究

李 韬 张 毅

(陕西警官职业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00)

**摘要:**研究基于职务犯罪判决书数据,检索提取主体的年龄、级别、文化程度、犯罪动机类别、犯罪次数等相关变量,引入犯罪经济学相关理论假设和成本-收益模型,对职务犯罪的深层原因机制进行分析,进一步阐述职务犯罪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抑制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预期惩罚成本提升有助于降低职务犯罪几率,为此,提出了筑牢思想根基、构建系统性治理体系、科学有效的防控体系和完善职务犯罪刑罚制度等对策,以期为职务犯罪的治理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撑。

**关键词:**职务犯罪;经济分析;治理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885(2023)01-67-05

十八大以来,随着国家反腐工作力度的加强,地方基层官员职务犯罪数量不断增长。根据1999-2021年《中国统计年鉴》中职务犯罪案件数据,可以发现2013年以来,检察院受理职务类犯罪案件数量和检察机关立案侦办案件数量均呈上升趋势,2017年立案率最高达到77.6%,一方面反映出党中央对反腐的高压态势,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地方基层管理人员职务犯罪多发高发的实际情况。因此,厘清地方基层管理者职务犯罪的背后动因,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对打造“阳光政府”,促进地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当前学术界面临和研究的重要课题。

文章以陕西省近10年来515份职务犯罪判决书数据为基础进行分析探讨,认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适用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国家法治体系构建、国家治理能力提升都应当基于对治理对象矛盾关系的精准识别。从经济学前提假设出发,讨论职务犯

罪的商品属性、非法所得货币的功能限制,以及职务犯罪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影响,提出职务犯罪的防治措施。

## 一、职务犯罪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影响

职务犯罪获得的收益显著高于正常工作收入,会对人们造成扭曲的激励,影响社会生产力;职务犯罪使得政府代理人身份认识错位、生产要素分配扭曲,进而损害生产关系。

职务犯罪会对劳动力产生扭曲性激励。第一,保证较高的教育投入增长率,保障和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扩大对劳动者的健康、教育和培训支出,能够显著提升劳动力质量。然而,职务犯罪中学校工作人员占3.11%,其中50%因为校舍建设,50%因教育经费支出;医院工作人员占2.53%,其中53.85%因医药合同审批,46.15%因医疗资金支出。教育和医疗的腐败严重影响劳动技能、劳动能力、劳动参与度。第二,容易产生扭曲的就业观。

收稿日期:2022-11-3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2021年度一般专项科研项目“职务犯罪的政治经济分析及治理”(项目批号:21JK0058)。

作者简介:李 韬(1969-)男,陕西商洛人,陕西警官职业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职务犯罪。

张 毅(1987-)女,陕西西安人,陕西警官职业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刑法学、思想政治教育。

统计数据显示,职务犯罪人员的平均经济收入相当于一个普通城镇居民 50.78 年的收入;职务犯罪主体攫取其他劳动者劳动成果,在某种程度上会引发就业观错位,甚至代际传递,尤其是对大学生就业产生较大影响,造成基层自治组织民主缺位。2014—2019 年自治组织贿选案件 144 起,黑社会性质组织操控基层选举 363 起;2016—2020 年国家公务员报名人数分别为 128 万人、133.8 万人、165.97 万人、135.34 万人、139.58 万人,考录比分别为 46.11:1、49:1、58:1、93:1、57:1。无论是干扰基层选举,还是热衷于考公务员,均某种程度上反映出部分个体希望得到某种身份特权,获得攫取权力。第三,损害劳动资料效率。文章统计的 515 起案件涉案的 97585.35 万元,其中现金形式为 38357.08 万元,通过货币乘数公式可以计算得到用于资本投资的资本额为 722854.4444 万元,严重制约着资本的流通,影响资本要素供给。第四,造成劳动对象错配。515 份判决书中有 206 起属于劳动对象的配置,占 40.08%,其中包括自然资源的配置、市场许可等。根据上文计算社会成本与职务犯罪收益比为 26.3:1。

职务犯罪产生生产关系扭曲。一方面,职务犯罪会造成产权关系扭曲。职务犯罪所利用的公共职权的所有权属于人民,政府是人民意志的代表机构,政府工作人员仅是代理人,在实施犯罪过程中代理人将代理权视作所有权进行处置。在行使代理权的过程中委托人与代理人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同时由于委托人众多出现无人监督“公地悲剧”情况。另一方面,会造成价格扭曲。根据费雪方程式可以计算出全部都是现金的流通速度为 1.76,全部都是银行存款的流通速度为 7.41,而职务犯罪的现金中又有 16.07% 没有用于流通,职务犯罪的货币流通速度仅为 1.48,降低了货币流通速度。

## 二、职务犯罪的成本收益分析

### (一) 犯罪主体的描述性分析

年龄结构。研究显示职务犯罪主体大多是具有有一定社会阅历、个人理性和政治理性的中年工作人员,40 岁以上占 78.64%。30 岁以下占 3.88%,30—35 岁占 7.38%,36—45 岁占 27.38%,46—55 岁占 41.94%,56 岁以上占 19.42%。

学历结构。职务犯罪主体大多具有良好教育背景,具有较高判别能力。调研显示,4.85% 的接

受过研究生及以上教育,39.81% 接受过大学本科教育,23.69% 接受过大学专科教育,8.93% 接受过高中或中专教育,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者 95.5% 的属于基层自治组织工作人员。

犯罪案由。涉案罪名里具有较强的职务“寻租”性质,在职权范围内追求利益最大化。从研究犯罪案由上看,工程建设占 12%,公共财政支出占 38%,公共资源交易占 17%,金融信贷占 8%,人事任命占 2%,审批权寻租占 19%,执法司法占 4%。

职务结构。95.56% 的主体是利用直接负责权进行职务犯罪,越权犯罪的主体很少,53.01% 是部门正职、16.12% 为部门副职、30.87% 为工作具体实施人员,其中部门副职中 96.39% 是在其分管职责范围内进行犯罪。

通过对 515 个样本主体的年龄、学历、犯罪案由、职务结构等特征的描述,发现职务犯罪主体具有较强的“理性”能力,符合经济学分析的“理性人”假设前提,可以利用成本—收益分析模型对职务犯罪行为进行分析。

### (二) 职务犯罪的成本收益分析

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指出,经济分析能够解释人类的所有行为。而职务犯罪属于寻租行为,是犯罪主体为了寻求高于普通市场水平的收益而进行的特殊行为,因此以经济学相关假设为前提,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法对犯罪主体的职务犯罪行为的深层原因机制进行分析,有利于相关部门有针对性地制定和采取措施遏制贪污犯罪行为,维护市场公平公正,提升社会治理水平。

#### 1. 成本收益模型

犯罪经济学假设犯罪主体是“理性人”,在忽略不同种类犯罪行为的具体原因后,所有犯罪主体均是通过比较犯罪成本和犯罪预期收益来决定自身是否采取犯罪行为。对于单个职务犯罪主体而言,在决定是否进行相关犯罪之前,会对自己实施犯罪行为的预期效益( $G$ )和需要付出的成本——包括机会成本( $OC$ )、预期惩罚成本( $EC$ )进行比较,成本和收益的比较结果即是职务犯罪净收益( $NG$ ),用公式表示: $NG = (G - OC) - EC$ ,其中, $G - OC$  表示犯罪收益减去犯罪人付出的金钱、时间、精力之后所获得的利润,当  $G - OC > 0$  时,犯罪主体只存在犯罪可能,当且  $> 0$ ,即犯罪“净利润”大于预期惩罚成本时,职务犯罪就会发生。具体决策过程如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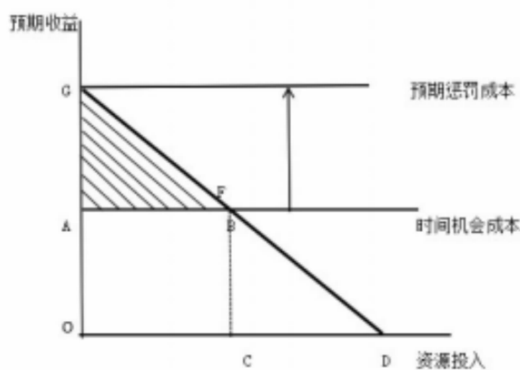


图 1

图 1 中横轴代表职务犯罪主体前期为了实施犯罪而投入的成本(包括实物成本、机会成本等),纵轴代表犯罪主体的预期收益(物质收益和精神收益),图中的代表犯罪者的机会成本,表示职务犯罪主体投入相同的时间、精力和金钱采取其他合法行为所产生的收益,假设这种收益固定不变,曲线就表示犯罪的预期收益随着前期犯罪资源的投入而发生变化,二者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投入的犯罪资源越多,犯罪主体所获得的犯罪收益就会越少。一般情况下,理性的犯罪主体会在进行犯罪时投入的资源不会超过,此时机会成本为矩形的面积,犯罪所获得的利润为三角形的面积。从图中可以看出,影响犯罪主体是否会进行职务犯罪的因素有两个:一是犯罪的机会成本。犯罪的机会成本提高,犯罪主体投入相同的资源通过合法途径将能得到更大收益,那么犯罪者的犯罪动机就会减弱,犯罪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但是机会成本的提高依赖于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政策保障等方面,短时间内难以明显变化。二是预期惩罚成本。虽然相关法律对各种犯罪行为的处罚规定都进行了明确界定,但是随着国家对相关犯罪行为开展“特殊行动”时,犯罪者被捕获的几率将大大提高,同时,被捕获后犯罪者的自身声誉等条件会降低,对今后从事其他合法活动也会产生不利影响,这都使得预期惩罚成本将大大提高。因此,基于以上分析,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制度建设,严格法律执行,通过高预期惩罚成本,来抵消犯罪所产生的经济利润(三角形 ABC 的面积),使犯罪主体放弃犯罪。

## 2. 职务犯罪的收益分析

职务犯罪的收益是指行为人利用手中所拥有的公权利实施谋取私利的行为,从而获得某些非法

利益。这些非法利益既包括财物、财产性利益,也包括非财产性利益。即行为人通过实施犯罪可以获得某些所预期的直接物质经济利益,也可以获得心理上的满足或某些扭曲的价值观认同,甚至于其他收益。

## 3. 职务犯罪的成本分析

(1)直接成本。直接成本是行为主体为实施职务犯罪所直接投入的人力和物力。当前,我国职务犯罪的主体多是从事公务的人员,也就决定了直接成本较低。如贿赂犯罪中的受贿罪和行贿罪属于对合犯,二者存在诱发关系,主要表现为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行贿人和受贿人相互利用、各取所需,受贿人往往可能只需打个电话或者暗示下相关人员,即可实现行贿人所期待获得的利益。

(2)机会成本。在犯罪经济学中,机会成本一般指时间成本,即从设计犯罪到犯罪活动实施结束,罪犯如果放弃作案而从事其他合法活动所能获得的最大收益。在职务犯罪中,犯罪的机会成本越低,人越倾向于犯罪。如机会成本与期望收益不均衡。非私营单位工作人员大都是通过招考录用,部分人员报考多次才录用,考录的机会成本期望较高,加之中国“官本位”“铁饭碗”的思想长期存在,非私营单位的工作人员将身份当作资本投入计算期望收益。据统计,2020 年非私营部门平均工资水平为 6.52 万元/年,私营部门平均工资水平 3.75 万元/年,前者高出后者 73.95%,2018 分别为 7.98 万元/年、4.78 万元/年,高出 76.50%,这种差异使其预期收益高出社会必要劳动补偿。根据 2020 年统计数据,全国国企、事业单位、公务员共有科级干部 90 万、处级干部 60 万、司局级干部 5 万、省部级干部 3000 余人,竞争的激烈使得其对内部差异较小感到不满,寻求自我补偿。有研究指出,组织内部薪酬差距越小,高管利用职务之便进行侵占犯罪的可能性越大;而外部薪酬差距越小,高管利用职务之便进行侵占犯罪的可能性越低,与本文研究结论大体一致。

(3)惩罚成本。在犯罪经济学中,犯罪的惩罚成本是最重要的成本。其主要由三部分构成:犯罪惩罚的严厉性、犯罪惩罚的及时性和犯罪惩罚的确定性。当前,我国犯罪的惩罚成本主要同犯罪惩罚的确定性和惩罚的及时性成正相关关系,即当惩罚几率和惩罚的及时性越大,惩罚的成本也就越高,职务犯罪的几率也就随之降低。

### 三、职务犯罪的防治措施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认清职务犯罪的经济本质是职务犯罪法治体系构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构建的基础,是实现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的根本保障。

(一)提升理性认识水平,筑牢不想腐的思想根基

无论级别高低,职务犯罪成本远远高于其收益。职权不是投机的资本,更不是豪赌的筹码,而是其为民服务的职责。分工更多的是一份使命,均衡利己与利他的辩证关系,国家公职人员必须树立法治观念、系统观念和初心意识。只有从思想上筑牢抵御职务犯罪的防线,才能更有效地遏制犯罪动机和犯罪行为。

依法治理,系统性处罚。有些人认为公职人员犯罪成本和收益显著失衡,社会中“高官低判”是普遍现象。从样本数据看,厅级干部职务犯罪人均涉案金额为1105.3万元,没收所有违法所得,平均判刑8.17年,平均罚金89.05万元,平均自由罚为0.74年/百万;处级干部人均职务犯罪额为241.55万元,没收所有违法所得,平均判刑4.68年,平均罚金55.24万元,平均自由罚为1.94年/百万;科级及以下人均职务犯罪额为101.41万元,没收所有违法所得,平均判刑2.94年,平均罚金29.36万元,平均自由罚为2.9年/百万。职务犯罪伴随着尊严、社会地位等方面的无形风险,刚性受贿金额决定量刑这一惩罚规则掩盖其真实犯罪成本,控制腐败惩罚的边际递减效应后,能够得出高级别贪官腐败惩罚更重的结论。

均衡利他和利己的辩证关系。加里·贝克指出,人们理性追求效用最大化,利他主义可以和经济学中的理性行为一致起来。现阶段,职务犯罪被查处比例仍较小,假设社会执法司法水平可以破获1/3的职务犯罪案件,理性社会计划者为弥补公共利益必须对犯罪者施加其侵占资金3倍的惩罚。从样本发现,所有职务犯罪主体都要上缴违法所得,83.07%主体并处罚金,92.8%的犯罪主体被判处3个月以上自由罚,出于理性减刑预期19.33%的主体选择自首。因此,公职人员从利己角度出发谋求利益最大化的方法就是做到利他、为人民服务,才能以最小成本获得最高收益。

加强法治观念和初心意识培训。深入开展党风廉政教育培训,时刻警醒公职人员预防职务

犯罪,提高其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能力。此外,通过各种职务犯罪的真实案例,对犯罪原因、犯罪动机、犯罪客体及犯罪所造成的影响和社会危害等进行解剖、分析,警示警醒公职人员,从而进一步增强其法制观念和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意识。

(二)构建系统性治理体系,提升源头治理能力

在职务犯罪的防治过程中,我们应制定包括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等全方位的治理体系,且凝聚相关职能部门以及社会公众,形成打击预防合力,将职务犯罪行为从源头予以遏制,进而减小犯罪的可能性。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需要法治作为保障,职务犯罪的治理也应始于法治体系构建。自治组织工作人员占职务犯罪的24.71%,主要是由于监督管理法律体系未完善、某些组织自我管理能力较低、部分地区法治建设相对薄弱,且司法部门工作人员业务能力不足等。因此,在职务犯罪的治理上,必须继续推进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和构建。

提高执法和司法效率。统计数据显示,2012—2019年案件从受理到侦办完成平均时长分别为2.1年、2.32年、1.78年、1.68年、1.31年、1.43年、1.18年、0.81年,执法司法效率明显提升;2012—2019年犯罪发生超过三年被立案侦办的比例分别为12.00%、12.50%、23.73%、19.23%、29.07%、43.75%、44.90%、36.36%,案件侦办越来越深入。案件责任落实到人,提升执法司法人员专业素养,建立健全终身负责制,是提升执法司法效率、落实深度侦办的保障。

构建“老虎苍蝇一起打”的系统化治理体系。从犯罪主体结构看,基层自治组织人数占25.49%、平均实施5.76次犯罪行为,基层科员人数占21.60%、平均实施10.79次犯罪行为,科级干部占30.74%、平均实施8.24次犯罪行为,处级干部占24.12%、平均实施9.64次犯罪行为,厅级干部占4.47%、平均实施13.05次犯罪行为。自治组织长期以来是监管盲区,加强政府对基层自治组织的领导和管辖,不留法律死角;基层公务人员和基层干部人数众多,应当加强民主监督和内部监督,将犯罪制止在萌芽状态;高级职务犯罪领导大多长期实施,其犯罪行为更具隐秘性(48.44%的主体共同犯罪,仅有13.64%厅级干部实施过共同犯罪、100%的将资产转移到亲友名下),应实施“网格关联”监督。

简政放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一直实行双轨制,一方面激发了市场活力,另一方面也容易产生“寻租”行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渐发展成熟,应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减少政府干预,除涉及国家、人民安全的重要资源配置由政府主导之外,其他符合市场比较优势的资源都由市场配置,从源头杜绝职务犯罪。

(三)构建科学有效的防控体系,加强不能腐的技术支撑

信息时代职务犯罪侦办现代化。5G时代,信息、数据已经成为社会的生产力,职务犯罪的手段也越来越信息化。例如,犯罪方式信息化、支付手段虚拟化(虚拟货币、网络凭证等)、货币转移国际化等,对侦办来说也是一个有利的优势,网络的每一次操作都会留下访问记录,对固定证据有一定帮助。故应建立起银行、户籍、第三方支付(支付宝、微信等)、金融账户、固定资产登记、大宗商品、外汇交易、虚拟货币等立体关联网络体系,构建身份、关联人员、账户信息的预警机制。

引入独立第三方评价体系。打破公共权力代理者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矛盾。构建全国性专家库,主要由院校教师、科研院所研究人员、企业专家人才等组成,按领域、分行业进行精准划分入库。所有专家由电脑随机从库中进行匹配,避免共谋情况出现。如资源配置、项目审批、工程建设等多部门专家综合评审;公共部门财务由监察部门、审计部门、专家学者、财务公司人员联合审计;人事任免与考核委托制,通过座谈、访谈、工作量统计、工作成果现场考察、基层调研等方式全面了解,对任期“德能勤绩廉”综合评价。

(四)完善职务犯罪刑罚制度,强化不敢腐的法律威慑

为了确保司法的严肃性和可行性,强化职务犯

罪的威慑力,在处理职务犯罪案件时,应始终坚持罪刑相适应原则,使得犯罪主体得到应有的惩罚,确保刑罚真正执行到位,发挥出法律打击职务犯罪的作用。

我国刑法对贪污罪、受贿罪设置了最高的法定刑—死刑,立法者本身的立法意图是为了遏制职务犯罪率的上升,达到一般预防的目的。也有一些国家并未通过对职务犯罪设置死刑以期达到一定的威慑效果,但这些国家职务犯罪的犯罪率并不高。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其存在一整套完备的反腐败法律制度。这些法律制度预先设定一定的标准,规定人们的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以及违反这些标准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不断完善和法治文明的进一步深入发展,死刑的设置不应再作为打击职务犯罪极限手段。《刑法修正案(八)》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立场出发,取消了13种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对部分犯罪死刑的废除说明了死刑的作用有限,其并非万能。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如果要废除死刑,惩罚的确定性和及时性就要明显提高。如果没有提高,就要调整刑罚结构,增加行为人犯罪的惩罚成本,从而达到抑制职务犯罪的效用。

#### 四、结语

当前职务犯罪案件涉案金额呈上升趋势,犯罪领域也不断扩展和蔓延。这些犯罪行为的发生有其特定的规律,也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只有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原则,通过精准识别、针对性预防和教育、高效和深入的侦办机制才能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防治体系。

#### 参 考 文 献

- [1] 劳东燕. 受贿犯罪的保护法益:公职的不可谋私利性[J]. 法学研究, 2019, 41(05).
- [2] 朱孝清. 检察机关如何行使好保留的职务犯罪侦查权[J]. 中国刑事法杂志, 2019(01).
- [3] 刘艳红. 职务犯罪案件非法证据的审查与排除——以《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之衔接为背景[J]. 法学评论, 2019, 37(01).
- [4] 顾永忠. 公职人员职务犯罪追诉程序的重大变革、创新与完善——以《监察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为背景[J]. 法治研究, 2019(01).
- [5] 梁娟. 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预防体系构建[J]. 江西社会科学, 2019, 39(02).

(下转第84页)

【法律与社会】

# 结构交换论框架下警察职业倦怠的缓释研究

康世庄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北京 100091)

**摘要:**警察职业倦怠研究作为热点之一,经历了从思辨到实证研究的发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介于职业倦怠的是微观个体心理效应和宏观社会结构影响的复杂纠缠结果,现有的实证研究大都忽略了诸多混淆变量对职业倦怠的产生的内在性问题。以系统的开放性原理为逻辑起点,理清警察交换行为与警察职业倦怠的关系,并在结构交换论的视域下探究交换的不同环节可能引发警察职业倦怠的要素及其演进,结合警察群体的特殊性,提出科学的缓释警察职业倦怠的对策。

**关键词:**警察职业倦怠;开放性原理;结构交换论;微观交换;宏观交换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885(2023)01-72-07

美国临床心理学家 Freudenberger 于 1973 年首次提出职业倦怠(job burnout)这一概念并描述为一种“身心枯竭或情绪耗竭的状态”。在公安实践中,警察的职业倦怠已经广泛影响到警察所处的社会关系的各个层面,与警察群体相交互的社会系统都将受到冲击。公安机关人民警察作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秩序稳定的重要力量,警察群体稳定、良好的情感结构对警察正确行使权力,依法履行职责具有重要的驱动作用。

基于系统开放性原理,可以将结构交换论作为分析警察职业倦怠现象的工具。系统开放性原理认为一切事物都以系统的形式存在,任何有机系统都是耗散结构,系统只有与外界不断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才能维持其生存。警察(群体)作为系统而存在,其熵不断增大,系统(警察)需要与外界的良好交换才能维持其存在。如果交换不能顺利进行,系统(警察)自发耗散并呈现为职业倦怠。其次,警察职业倦怠的形成与其交换行为密不可分,不仅需要对警察个体的微观交换进行研究,而且还

要考察警察群体在分化的社会结构之间的宏观交换。由于行为交换论无力解释警察的非利益至上行为以及警察(群体)在宏观结构中的间接交换,因此本文将结构交换论作为弥合警察微观交换与宏观交换之间的桥梁,以发现和解释警察职业倦怠在不同交换环节、不同层面的存在形式,探究导致警察职业倦怠在微观和宏观层面产生的驱动力量。

## 一、微观交换框架下的警察职业倦怠的产生

### (一)警察微观社会交换进程

布劳认为,个体之间的交换要经历“吸引——竞争——分化——整合”这四个阶段,如图1所示。警察个体的微观交换始于中介价值(报酬)的吸引,即个体与他人发生交换的倾向性。例如在“警察个体-群众”这一交换关系中,有两对吸引关系:一是警察个体和某一群众之间的相互吸引,二是警察个体与公安机关这一组织之间的相互吸引。群众希望警察秉公执法,维护自身的权益,警察也希

收稿日期:2022-10-28

作者简介:康世庄(2000-),男,陕西榆林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治安治理。

望在帮助群众这一过程中收获自我效能,满足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或者职业使命感等;公安机关赋予警察个体内在性报酬(自我实现、尊重、支持、正义感、荣辱观、制式服装等)和外在性的报酬(金钱、财富),而警察个体履行职责、规范执法,满足公安机关对警察个体的要求。类似的交换过程不断循环往复,最终使双方建立能使他们的社会交往稳定化的共同纽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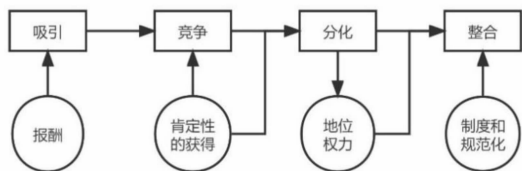


图1 警察微观社会交换进程

在微观的交换过程中,个体之间的交换并不是惟一的。群众不会只会接受一位民警的帮助,公安机关也不会只与一位民警缔结关系,而竞争关系由此外显。处在竞争劣势的民警发生交换的机会自然变少;而更具有才能、争取到更多肯定性评价、尊敬和服从的民警获取权力的可能性越大。在竞争的过程中,处于竞争劣势的民警不能获得符合期待的“报酬”,并作为一个系统与外界交换动态失衡,因此易出现职业倦怠的倾向。事实上,由于社会和个人资源配置有限,并不能够保证每个民警在“权力角逐”中都能实现同质的社会交换以获得期待的报酬,某些警察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就成为了必然。在这样的前提下,警察职业倦怠的预防、干预就需要将关注的重点放在如何调适那些竞争失败的警察的意识——通常是那些书面考核绩效不高者或者受群众投诉者

随着竞争的发展,同质的交换主体之间的地位逐渐发生了分化,个人权力由此产生。权力和地位的产生导致了警察个体的分层。在这个层级结构中,权力既可能是以合法性价值为基础的权威,也可能是强制性的实力。这便是微观结构交换的整合结果。

(二) 警察微观社会交换中可能引发职业倦怠的要素与矛盾

在警察个体的微观交换过程中,警察交换行为受多种要素调控,交换进程的隐含着诸多矛盾。这些要素和矛盾既是评估警察交换行为是否保持动态平衡的窗口,也是警察职业倦怠产生的根源。

1. 警察微观社会交换中的要素

(1) 警察交换关系中的“权力”“权利”与“义务”

“权力”和“义务”的存在贯穿警察交换行为的始终。布劳并未将“权力”与“权利”进行区分。实际上,竞争导致地位分化而产生的是“权力”,即权力主体对客体在一定范围内的支配力量;而“权利”则是缔结交换的双方所天然具有的,要求自己或者对方作为或者不作为而享受到的某种权益。这种“权利”“义务”与个人或者群体的社会独立性有关,即:社会交往中义务不平等就会使一方获得“权利”,而另一方失去社会独立性。社会资源的持有与索取是“权利”“义务”诞生的根本原因。

1) 个人如果持有他人需求的资源,就产生了要求别人就某事作为或者不作为的“权利”;反之,索取者依赖于资源的持有者,因此产生了就持有者要求的作为或者不作为的义务。

2) “权利”可以实现向“权力”的转化,具体需要合法化的“权威”以及“强制性实力”两个媒介。“权威”来源于索取者的赞同,而“强制性实力”来源于社会资源的绝对占有。

布劳只看到了个体在交换中“地位”的绝对性而过于强调独立性在个体的社会交换中的地位。但个人或者组织在社会交换关系中的独立性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而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持有者与索取者的地位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而当过于强调持有者(索取者)的“权利”(义务)以及持有者的独立性地位时,就会出现资源交换的失衡。例如,在“公安机关—警察个体”的交换关系中,虽然公安机关拥有要求警察个体作为或者不作为“义务”的“强制性实力”,是这一不平等交换关系中的“资源持有者”,但是公安机关的良好运转同样依赖警察个体的“作为或者不作为”。此时,警察转化为“资源持有者”,公安机关则是索取者,并有向其提供资源的“义务”。



图2 警察交换关系中权力、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同理,在其他分化而来的警察个体与外界的交换关系中,其他交换主体也有向警察个体提供资源的“义务”。当今社会人们片面强调警察个体在社

会交换关系中索取者的地位以及“义务”的绝对性,而忽视了警察个体在社会交换关系中的持有者地位以及“权利”的相对性。而且警察从事高风险、高应激、高负荷的工作,外在性报酬却相比于其他社会职业较低,导致警察个体的资源交换呈现主观和客观的失衡。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缔结交换关系的双方天然具有要求对方或者自己作为或者不作为的权利和义务;警察在交换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二者相互依存,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片面强调警察“权利”的相对性和“义务”的绝对性就会破坏系统交换的平衡,导致职业倦怠。

### (2)“社会—警察”资源交换的趋于平衡

当个体间的资源交换出现极度不平衡时会出现以下几种情况:

1)大多数持有者会对索取者进行惩罚以修正其行为,只有少部分持有者会进行激励;而且惩罚可能会适得其反;

2)大多数索取者会减少资源的付出。而面对惩罚时,索取者的行为较奖赏难以预料,因此,当警察个体的交换关系出现不平衡时,作为开放系统的警察会调整自身的行为从而在警察交换的过程中减少资源的付出以维持自身的耗散。同时警察可能会伴随出现不满、焦虑等情绪。而此时持有者通常会使用惩罚作为修正其行为的手段,这种消极情绪可能会因此叠加。

### (3)其他替代资源的威胁

个人如果对于相同的战略资源可以通过其他途径、环境获得,那么他就会获得相对于原途径、原环境的相对独立性。资源的持有者相对失去了“权力”,索取者也就不必再履行“义务”。公安机关与其他国家职能部门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其与社会群体的广泛接触性、执法的强制性、职责职权的正义性、独有的荣辱观、甚至是不同于其他行政机关的制式服装。这些不同于其他职业的特征让警察职业能够给予警察个体丰富而独有的内在性报酬。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为得到这种“资源”所进行的高风险、高强度、高负荷的先行行为以及较低的外在性报酬依然是部分警察出现职业倦怠而选择“替代资源”的重要原因。

## 2. 警察微观社会交换中的矛盾

### (1)社会共同利益与警察私人利益的矛盾

交换主体之间既有共同利益也具有冲突性的

利益。显然,“社会—警察”之间的交换关系要求警察个体付出大量时间、精力,正确行使职权履行职责、做国家和人民的忠诚卫士,而尽管多数警察个体也有着类似的自我实现的需求,但是为实现共同利益,“社会—警察”这一交换关系需要警察个体进行尽可能的劳动。当警察个体为自身的某些利益,包括身心健康、自身欲望、家庭利益等,不可避免地产生逃避义务的心理时,共同利益与冲突利益的矛盾就会愈加尖锐,极易出现职业倦怠的倾向。

### (2)职业吸引与反抗的矛盾

吸引的纽带把个体凝结成一个整体,但吸引本身也面临着两难的困境。一方面,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品质使一个人能吸引一个群体;另一方面,这一品质也对其他人的交换地位构成威胁。例如互联网企业的高薪资能够吸引网络安全警察从业人员转业,但在“公安机关—警察”这一交换关系中会对公安机关相对于警察的交换地位构成威胁。

### (3)赞同与其价值的矛盾

“赞同与其价值的矛盾”本质上是边际递减效应。当警察个体表现出色时,“公安机关—警察”之间的交换关系中的资源持有者会给予其一定的物质或者精神方面的强化,以促使其继续保持这种行为。但正强化的频率过高或者强度过大,正强化的效果会减弱甚至逐渐消失;而正强化的频率过低则会导致警察个体的不满。

同理,惩罚在修正个体的行为方面同强化一样占有重要地位。惩罚由以下五个基本命题构成:

1)强化在于增强个体的行为,惩罚在于消除个体的行为;

2)惩罚出现的原因是个体不符合组织目标的行为;

3)适时适度的惩罚可能消除个体的行为;

4)当个体出现“坏”行为时没有出现“坏”结果时,个体会出现侥幸心理。长此以往惩罚便会失去应有的作用;

5)惩罚可以修正行为,但其后果较强化难以预测。

本文将其描述为“惩罚与其效益的矛盾”——适时的惩罚会修正警察个体的行为,但是频率过高或过低、程度过大或过小,都会引起警察个体的不满。因此需要审慎使用惩罚以调控警察个体的行为。



综上,可以列举出警察微观交换过程可能导致职业倦怠的要素和矛盾如下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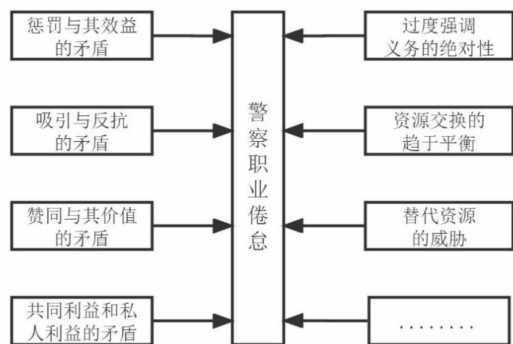


图3 警察微观交换过程中导致职业倦怠的要素和矛盾

总体而言,警察个体的微观交换经历了吸引、竞争、分化、整合四个过程,在微观结构中主要进行以“报酬”(内在性报酬和外在外性报酬)为中介的直接交换。竞争导致地位的分化和权力的产生,同时伴随其中一方交换主体“自愿承认权力的有效性”和强制性实力的催化,权力逐渐发展为合法化的权威,同质的交换个体(警察)之间的群体规范产生,规定着一方交换主体的交换行为,最终制度和组织得以凝聚和确立。在警察制度确立之前,警察职业倦怠的产生主要集中于个体间微观交换的不同环节,个体心理效应是主要的驱动。

## 二、宏观交换框架下的警察职业倦怠的演进

警察个体之间的微观交换在群体规范的作用下逐渐固化、聚合,伴随按照垂直参数和水平参数划分的社会结构的异质性和不平等性成为社会的属性,制度化、组织化表征着警察所处的社会环境开始分化为不同层次的结构——公共部门与公私企业、人民群众和执法相对人等组织、群体之间的界域逐渐得到划分,并且各自独立作为以不同参数划分的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制约警察个体的交换行为。警察交换行为的主体由个人上升至群体,交换的性质由直接扩展到间接;交换由先于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创造过程转变为受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制约的过程。此时,就需要对警察群体在宏观交换行为进行考察。

在宏观层面对于警察职业倦怠的分析,首先需要明确警察群体产生职业倦怠的组织环境,以及将研究对象由警察个体上升至群体之后,探究充当群

体间接交换的中介价值对于警察职业倦怠产生与发展的作用。

### (一)警察职业倦怠的组织环境:警察制度的确立

从权力到权威,再到权威到群体规范,最后确立为制度,这个过程衔接了微观结构的交换与宏观结构的交换,具体体现为警察制度的确立以及警察群体对于制度合法性的认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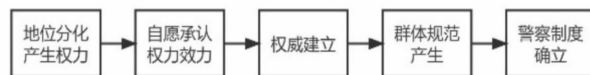


图4 警察制度确立的过程

根据警察微观交换过程,通过交换获得“权力”能够强迫“索取者”服从命令,但是这样建立在功利基础上的交换是不稳固的,对于时刻面临“替代资源威胁”的公安机关而言更是如此。因此公安机关和人民群众等社会集团、组织或者群体就必须实现相对警察群体的权力到权威的转化。权威最本质的特征是“要求服从的强制力不是来自上级而是来自下级群体自身的规范”。因此,资源的持有者如果能按照“公平性”和“互惠规范”与警察群体发生交换,并使其获得的内在性或者外在性报酬超出其期望(例如群众给予警察锦旗、感谢信,或者公安机关内部授予勋章等),警察群体就会对“资源持有者”的权力的合法性表示赞同——共同的忠诚感和群体规范就会出现,由此伴随产生的由服从转化而来的群体义务标志着权威的产生,而权威的确立而警察制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警察制度的确立使得警察个体(群体)的交换行为在制度的轨道上有序运行。

与此同时,警察职业倦怠的产生也不再仅局限于个体交换环节而与群体、组织、集团之间更加复杂的间接交换有关,制度和规范是警察职业倦怠的主要驱动。显然,使警察群体维持和保有对公安机关和人民群众权力合法性的赞同,并延伸至固定下来的,关于公安机关的制度性规定以及由此衍生的公安机关的宗旨,对于从意识层面缓解警察的职业倦怠有着正向作用。

### (二)警察宏观社会交换的中介与作用

警察制度确立之后,警察群体正式在警察制度和群体规范的指导下,在由不同社会集团、组织、群体组成的宏观社会结构中进行交换。这些制度和规范甚至公序良俗等蕴含着警察与不同社群进行

交换的中介价值以及应然的认同。

### 1. 共同价值的作用

微观结构的交换以个体之间的心理学效应为驱动,即充当个体之间交换的媒介是对交换双方具有吸引力的介质,譬如奖赏、赞同、服从、财富等“报酬”。而宏观结构的交换大多是间接的,成本与报酬并不能即时的兑现,因此需要某种机制来传递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结构。布劳设置的“共同价值”为宏观社会结构中复杂的间接交换提供了一套共有的标准,使得参与的双方能够以同样的情景定义进行交换,即充当不同社群之间交换的中介价值不再是微观交换中的“报酬”,而是共同价值。

布劳所设置的“共同价值”与“共同利益”内涵相近。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中的“共同利益”既可以是构成利益关系的利益主体之间利益内容的相同性,也可以是社会集体生活规则和规则认同意义上的相同性。明晰警察群体宏观交换的媒介之后,可以将警察交换行为的模式抽象为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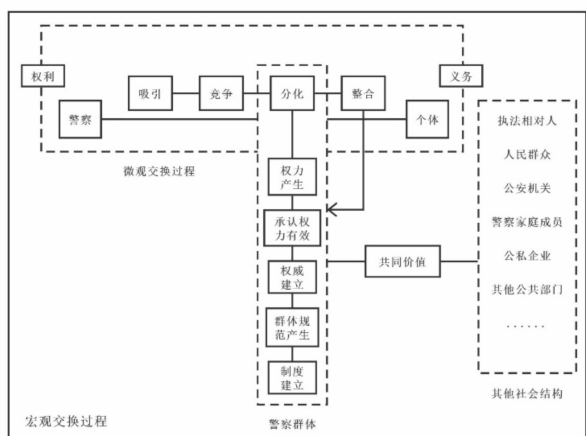


图5 警察交换行为的模式

### 2. 共同价值缓释警察职业倦怠的功能

布劳认为“共同价值”是宏观结构中复杂间接交换的调解手段,在调停群体和组织间的间接交换时,“共同价值”提供了标准。在调停警察职业倦怠这一复杂交换矛盾时,“共同价值”可以作为调停的中介。“共同价值”缓释警察职业倦怠的功能主要体现在调和警察在社会关系中的思想意识或者个体心理。

在按照不同参数划分的宏观社会结构中,与警察群体发生交换的社会集团、组织、群体纷繁复杂不能穷举,具体包括公安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党政机关等公共部门、公私企业、人民群众、执法相对人、警察家庭成员等。例如在“食药警察—市场监

督管理局”这一交换关系中,双方缔结的直接或间接交换关系难以使用微观交换的模式予以描述,但可以就促成三者之间宏观交换关系的共同价值进行考察。

在食药警察确立之前,市场监督管理局等行政执法部门往往出于本位主义考虑,对食品犯罪进行“以罚代刑”,给公安机关对于食品、药品案件的侦破和界定造成了一定障碍,而参与其中的民警可能会出现自我效能感丧失、成就感降低等情感体验,从而出现职业倦怠的倾向。在《刑法修正案(十一)》完善惩治食品药品犯罪的规定、食药警察确立之后,公安机关关口前移,提前介入食品安全案件,二者之间建立了共同的政治价值观,即“依法严厉打击食药犯罪,维护社会秩序和安全”。在一致的价值观的驱动下,三者各司其职,形成了良好的社会交换和互动关系,从而起到缓释警察职业倦怠的作用。

此外,共同价值的正向与否决定了交换的正向性。例如在“警察群体—公私企业”交换关系中,如果警察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权谋私,而公私企业因贿赂等违法行为实现警察公权力的异化而获得非法利益,这对畸形的交换关系仍然能够正常进行。但是在警察群体中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这样的共同价值,但是却对于改变这些非正常化的群体规范或者价值观无能为力,极容易出现正向价值观崩塌、人格解体、自我效能感降低等现象,从而引发职业倦怠。

因此,共同价值是警察宏观交换的中介价值;正向、一致的共享价值观可以促进警察进行良好的社会交换,畸形、相异的共享价值观则可能导致职业倦怠。

## 三、警察职业倦怠的缓释

综合上文在分析框架下得出的关于可能导致警察职业倦怠的诸多要素与矛盾以及结论,可以从队伍建设和组织管理两个方面提出纾解对策。

### (一) 队伍建设

#### 1. 提高警察依法履职能力,增强社会交换吸引力

警察是否具有充足的社会资源决定警察个体的社会交换能否顺利进行。警察吸引交换的特质便是履行职责的能力。切实提高民警依法履职的能力,加强执法规范化建设水平,提升公安队伍的

形象,从而提升民警在社会交换中的“吸引力”,帮助建立良好的警察交换关系,是预防和干预警察职业倦怠的第一道关口。

## 2. 树立正向一致的共同价值,塑造健康的组织文化

共同价值是警察宏观社会交换的中介价值,具体可以体现为公安机关内部健康的组织文化。正确积极的组织文化可以保证良好社会交换的顺利进行,使得民警在思想意识层面维持积极的态度,从而预防和干预警察职业倦怠。因此公安机关必须构建和培育人民警察“忠诚”“为民”“公正”“廉洁”的核心价值观,加强公安机关思想政治工作,建立健康的组织文化,培养人民警察公正廉明、英勇善战、无私无畏、雷厉风行的优良警风,使其对人民警察的思想道德和行为方式起到主导作用,做到慎微、慎欲、慎独、慎交、慎权。

## 3. 明晰权利义务的相对性,树立对民警的正确期待

无论是微观还是宏观结构的社会交换,双方缔结交换关系就标定了双方都有要求对方作为或者不作为的“权利”和作为或者不作为的“义务”。警察群体在交换过程中付出时间、精力甚至是生命,但是仍然不能满足一些群众或者其他组织的过高期待,使得民警不能获得期待的“报酬”,破坏警察交换关系的平衡,从而产生职业倦怠。因此,在积极稳妥推进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建设、着力提高民警依法履职能力的同时,也清晰地界定警察法定职责的范围和提高人民警察的执法公信力。

### (二) 组织管理

#### 1. 拓宽心理健康干预视野,锚定服务对象

根据对警察微观交换的过程分析可知,针对民警的心理健康干预机制的服务对象不能只局限在已经出现职业倦怠的民警身上,还需要将视野扩展至潜在的对象,即在交换竞争中处于劣势的警察。此外,针对民警的心理健康干预机制需要具有丰富公安工作经验的人以担任心理咨询师等职位。这是由人民警察在形成心理健康问题的特殊环境等因素决定的。

#### 2. 综合评价能力,完善晋升指标

在结构交换论的框架下,个体间的竞争催化了地位分化和权力的产生。但是仅凭在竞争中的表现并不能得出对警察的客观而全面的评价。因此在实践工作中,仍然需要对仅以书面考核绩效为基

准的晋升模式进行改良,设立更加全面、更加客观的晋升指标,发掘公安机关内部的全面、可靠人才。

## 3. 维持民警社会交换平衡,避免替代资源的威胁

在警察群体与外界发生交换时,交换双方主观评价和客观实际意义上的交换价值的质与量决定了交换关系是否平衡。在“持有者或者索取者在长期不平衡的条件下会通过调整自身的行为或者选择替代资源以使交换关系趋于平衡”的前提下,如何维持民警社会交换的平衡,从而规避替代资源的威胁是避免警察职业倦怠的重要窗口之一。在外在性报酬方面,公安机关的薪资水平和待遇虽然高于其他公务员,但是相比于近年来新兴的各种职业仍然比之不足。在购房、偿还贷款、维持家庭运转等压力下,警察薪资仍然有提高的空间。在内在性报酬方面,应当加强公安机关内部对于表现突出民警的表彰或者给予其他形式的赞同和支持,满足民警对内在性报酬的期待。

## 4. 协调冲突利益,保障民警合法权益

公安机关作为“资源持有者”为实现共同利益需要警察个体进行尽可能劳动,而警察个体为自己自身的个人利益(包括身心健康)不可避免地产生逃避义务的心理。这种“社会共同利益与警察私人利益”的矛盾在实际中表现为公安工作与警察家庭的矛盾、公安工作与警察个体自身身心健康的矛盾、公安工作与警察个体欲望的矛盾等。作为这一社会交换关系最为尖锐的矛盾,极易引起警察职业倦怠的产生,因此需要妥善应对。

## 5. 从严治警,审慎使用惩罚

公安机关在警察制度确立后,作为资源的持有者要求警察个体作为或者不作为的强制性实力。如果警察个体一旦违背了职责义务,为了维持“社会—警察”之间的交换关系的良好运行,就需要“资源持有者”对其依法依规进行惩罚。通过结合“惩罚与其效益的矛盾”以及关于惩罚的五个基本命题表明,对于警察个体施以惩罚时,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为:

### (1) 对于警察个体需要适时适度惩罚

过于严苛的惩罚会挫伤警察个体工作的积极性,导致警察职业倦怠;过轻的惩罚会导致警察个体产生消极怠慢的侥幸心理,导致警察职业倦怠。

### (2) 结合个体情况实施惩罚

惩罚的后果较奖赏难以预料。对于大多数警

察个体来说,惩罚具有消除不良行为的效果,而对于某些个体来说,严格的惩罚会适得其反,让其产生“破罐子破摔”的心理,进而导致职业倦怠。

#### 6. 从优待警,及时、正确运用奖励

从优待警是我国新时代公安队伍建设的方针之一,主要是指从政治待遇、工资津贴、执法权益、医疗保险伤亡抚恤等各个方面维护、增强人民警察的合法权益。除落实《人民警察法》中关于人民警察奖励的相关规定之外,还应当完善人民警察晋职、晋级、晋衔措施,合理提高人民警察的薪资待遇和社会福利等。这不仅可以促进人民警察的工作积极性,还可以避免“替代资源的威胁”,有效防止警察职业倦怠的产生。正确运用奖励制度,防止出现边际递减效应。

## 四、结论

警察职业倦怠不仅作为个体心理现象的存在,

更是警察(群体)自身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自发耗散、不能与外界进行有效交换的产物,在此还要受到外在社会结构的制约。因此警察职业倦怠是横跨多学科、多研究领域的复杂问题,仅用某一种理论或者行为模型不足以涵盖职业倦怠在个体和群体之间的发展过程。在该项研究之中,必须时常更新和吸收优秀理论,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结合公安实践工作才能对警察职业倦怠的缓释起到更好的指导作用。

加强对警察职业倦怠的源头治理,从系统化的眼光看待警察个体(群体)自身及其所处的环境,将职业性心理疾病预防、干预和处置措施的关口前移,并在公安机关内外树立正向一致的共享价值观,从思想意识层面加强教育和管理,并使其引导警察的行为,降低警察职业倦怠的概率、频率。

## 参 考 文 献

- [1] Herbert J F. Staff Burnout[J].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1974,30.
- [2] 周三多. 管理学—原理与方法[M],第七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84.
- [3] 刘潇蔚. 社交媒体上的自我表露与隐私权保护[D]. 南京师范大学, 2019.
- [4] 饶旭鹏. 论布劳的社会交换理论——兼与霍曼斯比较[J]. 甘肃政法成人教育学院学报, 2004(1).
- [5] 李玲玲, 梁疏影. 公共利益:公共政策的逻辑起点[J]. 行政论坛, 2018, 25(4):6.

# Study on Relieving Police Burnout under the framework of Structural Exchange Theory

*Kang Shizhuang*

(People's Public Security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91)

**Abstract:** Based on the systematic openness principle a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ce exchange behavior and police job burnout, and provides an analysis framework of police job burnou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al exchange theory. It explores the factors that may cause police job burnout in different links of exchange in the micro structure, and finds and explains the evolution of police job burnout under the restriction of social structure in the macro structure. Combining with the particularity of police group,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cientific countermeasures to relieve the police job burnout

**Key words:** Police Burnout; Principle of Openness; Structural Exchange Theory; Micro Exchange; Macro Exchange

【优秀传统文化】

# 融合在场:数智时代下“Z世代” 传承家风的创新路径研究

许明星 高月

(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2;安徽师范大学 安徽 芜湖 241002)

**摘要:**“数智时代”改变了传统家风的语境,作为当下传承的主体,“Z世代”在价值理念、行为偏好等方面具有独特性,使家风传承面临新的问题。聚焦于特定时代的特定群体,以“集体记忆”的框架阐述家风,并将“Z世代”置于主动地位,以其数字特性倒逼家风新的书写;在梳理家风“家国同构”的历史脉络和“Z世代”社会化过程中,聚焦于家风在社会距离、心理距离和文化距离方面的困境,重点讨论数智赋能下,“Z世代”传承家风的创新性路径:在传统文化基因和时代特点的交织中强调“融合在场”的要点,通过“内核固本”“形式开源”和“场景升华”来完成记忆的延续、再现和规训,这不仅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回应了青少年思政教育和以人为本的要求,也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时代转换和国家形象书写的立体折射。

**关键词:**家风;“Z世代”;集体记忆

**中图分类号:**G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885(2023)01-79-06

家风是集体记忆在社会最小单位中的表征。记忆具有互文性,时代变迁改变了传承语境,现代社会与传统的家风场域也无法同步匹配和契合,家风若得不到有效赓续,人们就会迷失精神信仰的方向,中华文明也就无从彰显。作为当下青少年群体的“Z世代”是传承和书写记忆的主力军,其与生俱来的“数字属性”在传统家风的碰撞中产生了错位和罅隙。面对“数智时代”的新需求,如何活化家风、促进“Z世代”对家风的创新性传承与发展成为当下亟待解决的命题。

## 一、集体记忆表征下的家风和“Z世代” 的社会化过程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风是一个家庭及家族的价值理念、道德风气长期沉淀的结果,集中反映了我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内涵与思想,同时又在家庭层面彰显和具化了民族秉性与民族精神,继承了传统文化也指向着现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提升我国文化实力的重要媒介。无论是传统早期的家族本位、集体主义时期的集体本位以及改革开放后的个体本位,家风的本质是有关家庭道德的集体记忆,无论是家庭,还是国家,“必须经年

**收稿日期:**2022-11-23

**基金项目:**本文系安徽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新媒体语境下红色文化的数字化传播研究”(SK2020A0109)、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攻坚项目“红色文化在心理育人中的应用研究(SQYR20210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许明星(1991-),男,安徽宣城人,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助教,研究方向:应用心理学。

高月(1990-),女,安徽宣城人,安徽师范大学讲师,安徽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新闻传播学。

累月借助集体记忆,借助共享的传统,借助对共同历史和遗产的认识,才能保持集体认同的凝聚性”。家风是社会风气的晴雨表,它使个体道德水准与国家价值理念达成统一,一旦形成,就会内化为主体的深层记忆和“惯习”,并在家族中代代相传。

家风是不断被建构和书写的动态概念。对于“Z世代”而言,传承家风的过程是其社会化过程,是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这契合了库利的“初期群体”理论,即家庭是自我和人格得以充分发展的来源,也是个人继续群体价值观并作为自己行为的依据。如今,“Z世代”的社会化模式相较于以往发生了变迁,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给“Z世代”的社会化进程带来结构性影响,最终造成“社会化主体泛化”“社会化控制弱化”和“社会化进程压缩”等后果,给家风的传承带来了新的命题。但目前研究多聚焦于“Z世代”的群体观念和消费潜力,这些被视为发展活力的因素在关于传统文化传承中风险的关注却相对不足。在传统和时代的碰撞中,对家风的探讨多围绕青少年价值观养成等思政教育、传统家风的内涵解读及当下政治指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红色家风、相关领域运用等,鲜有从集体记忆的“大文化”视角的论述,更未有置于“数智时代”下的适配性和数字记忆的有关分析。同时现有研究中多有关注领导干部、教师及乡村村民的群体写照,对自带数字基因的“Z世代”还未有涉及。故此,数智时代下针对“Z世代”的家风探讨,在现实价值和意义上还存有一定的研究空间,这既是对历史发展和当下现实问题的回应,也是对未来发展中科技和人文命题的新思考。

## 二、轴心偏移:数智时代“Z世代”传承家风面临的困境

集体记忆的生成依赖于稳定的时空环境,依赖于传受双方的同步在场。“万物皆可数字”的时代,家风的传承也面临转型。“Z世代”的游牧属性,使其在转型进程中时有偏移集体记忆的轴心,在社会距离、心理距离及文化距离上呈现出变化。

(一)社会距离:高频的流动和内容耗散的“代际递减”

家风所面临的困境,首先表现在时空转型的“社会距离”上,即客观存在的差异程度。家风的培养和实践,是在家庭场域中将个体的实践经验

(记忆)内化成意识和思维方式的过程。人最初的社会化是从家庭开始的,长辈的“言传”及“身教”与子辈的“遵守”及“践行”不断形塑着家风,同时家庭成员间相互“表率”和“印证”更是强化着这一记忆,在这一循环过程中,主体拥有了参照系,在记忆模型中逐渐形成了自我和人格。但传统家风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概念,流动的现代社会中,相对闭合、稳定的环境被解体,小型的原子家庭取代了“多世同堂”,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使得父辈在空间上的流动几率增加,家庭近亲之间生活在不同城市,一年之中除了节假日的团圆以外,只剩下一种简单信息连接,小家庭的感情正在趋于单薄,大家族的观念正在走向瓦解。父辈借助于智能技术的便捷性更加忙于奔波,本该属于“家庭”下的场域也不断被“办公室”所挤占,传统家族下的集体记忆退场,家庭的社会功能不断弱化。

另一方面,随着主体的更替,家风也会因时间的推移而产生代际递减。数字和智能技术的催化,这种代际递减的速度被加快,传承记忆的物质性载体被数字符号击退,“0”和“1”已成为嵌入日常生活新的媒介和生产方式,人的主体性被掩盖,客体却逐渐“主体化”。自带网络基因的“Z世代”,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和长辈大不相同,其生长所依赖的“符号世界”在内容和形式上发生了变化。传统社会化模式下的“实体流程”逐渐让渡“虚拟现实”过程,作为“Online”一族,“Z世代”沉迷于数字化、智能化所带来的便捷,父辈所秉持的传统家风仍扎根滋养于物质媒介中,他们各自埋头于铺天盖地的任务清单,传者不再耳提面命地对后代进行严格意义上的“言传”与“身教”,受者也在不同的频道中“自娱自乐”,成长于不同文化体系与社会现实中的两代人被囿于截然不同的困境中,故在不对称历史逻辑里,“数字移民”和“数字土著”之间的代际差异被放大,缺乏了稳定的环境和滋养的土壤,因而也无法生成深入人心的记忆。

(二)心理距离:对权威的祛魅及个性彰显构建的区隔

“数字原住民对中国的社会结构、社会空间以及社会关系产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极大地重塑了传统上基于血缘和地缘的中国社会关系”,作为数字原住民的“Z世代”,家风传承不仅在于社会距离的复杂性,更在于这种社会关系的改变会导致“心理

距离”的扩大,即个体在认知和情感上与他人的亲疏远近关系。于家风而言,这是决定彼此是否乐意交流和付出情感的因素,即赖于彼此的“亲密无间”。传统家风场域中,父辈的“榜样形象”是高尚权威、无所不知的,子辈也在认知、接受、模仿和内化的渐进式过程完成对父辈的学习和效仿。但数智时代,“Z世代”获取信息的方式多元化,其社会化风险早已不是“有无选择”的问题,而是“如何选择”的问题。后喻文化中,子辈拥有与父辈相较量甚至是高于父辈的文化资本,他们不再依赖家庭的教化,取而代之的是在虚拟社区中寻找知识构成,并开始质疑父辈一贯坚守的理念。虚拟世界的“随时在场”,任何知识和经验均可在网络中获得回应,而父辈由于无法及时跟进时代发展,对信息的编码和解码能力似乎也显得“不合时宜”,相比之下,“Z世代”触屏社交所带来的引导性、号召性被前置,情感煽动下逐渐高于家庭所获的教诲,父辈权威被模糊与消解。这种情感上的祛魅是“Z世代”对家庭亲密关系的冷漠和逃离,从根本上侵蚀数千年来的家庭伦理体系,进一步促使传统家风的“无所适从”。

心理距离还表现在“Z世代”自我建立的区隔。信息的共享和传播需要有“共通的意义空间”,即对事物有约定俗成的理解。但在“反哺”的当下,父辈在子辈看来已多少是“不懂行”,“Z世代”所热衷的事物在父辈看来也是难以理解。“Z世代”是自己的旗手,具有高度自治、高度流动性,在日常交往中,往往以“饭圈文化”“盲盒文化”“二次元”“黑话暗语”等竖起与父辈的屏障。同时,“Z世代”注重消费,愿意为体验乐趣买单、注重颜值偏好及为爱豆打榜,面对生活中的压力,更是借助社群连接彼此,形成佛系“反内卷”。此外,“Z世代”对成功的定义与父辈也相差甚远,面对世俗的选择,呈现出精致的利己主义,这些都与父辈们所尊崇的“勤劳致富”“克己节俭”“无私奉献”格格不入。久而久之,通过具有门槛的圈子文化和自成一派的语言体系,“Z世代”逐渐建立起自身与父辈间的区隔,亲密关系开始从家庭出走,从“血缘”和“地缘”转向了虚拟的“趣缘”群体,虚拟社交的狂欢加剧现实交往的疏离感,家庭本位的观念被淡漠,传统家风也丧失了其原有的功能。

(三)文化距离:数字依赖下的主体异化及认同危机

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最终带来的是文化的冷漠感,即对于“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将要去何处”的困惑,会逐步造成历史纵深感和地域认同感的丧失。“Z世代”热衷在虚拟和现实中穿梭,通过“虚实分身”随时随地入场和退场。VR、AR等技术虽提供某种可供性,但同样也带来了屏障和阻隔,使得“Z世代”的情感寄托逐渐依附于数字中介。沉迷于体验与快感,“Z世代”的生命经验被纳入到一方屏幕中,主体之间的交往愈发依赖数字连接。当现实和虚拟失去界限,“Z世代”对虚拟和现实差异下的生命体验也产生混淆,人机交互过程中,他们难以辨别与之交流的是人还是机器,“认识后遗症”下也不再知道自己真正的需求是什么,在与机器的博弈中人似乎成了机器的延伸。同时,长期对数字的依赖使得“Z世代”的注意力稀缺、想象力匮乏,思维趋于表象化,主体的能动性也被禁锢。对数字屏幕的狂热而对最终指向的本体却“不关心”,长此以往会致使情感连接的退场,现实缺位最终导致意义流失的“主体异化”,这些都从根本上侵蚀了家风传承的根基。

“Z世代”具有令人惊叹的能量,也具有潜在的政治挑战性,中国千禧一代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代人都更多地接触外国文化并受到西方影响。处于初级阶段的数智化,监管体系还未成型,“Z世代”的好奇心和新鲜感强,常借助数字技术在国际范围中任意接收信息,这就带来了多元文化冲击的风险,遭受西方的价值入侵和意识干扰,稀释我国的主流话语。如西方对个性主义的宣扬,动摇了“Z世代”关于“对与错”的判断标准,他们开始盲目西化,在面临抉择时价值观犹豫游离,片面化质疑我国的传统理念,如传统家风中的“忠孝节义”被曲解为“愚”,“先人后己”被扭曲成“缺乏主体性”,“谦逊有礼”被认为是固步自封,同时“男尊女卑”思想被放大抨击。这些都是以割裂历史脉络和时代关联的片面性否定及扭曲化解读,是西方通过“控制人们的记忆来控制了人们行为脉络”的手段。“Z世代”心智不甚成熟,在西方价值观冲击下逐渐权责失衡、行为失范,在潜移默化中,主体的身份开始模糊,焦虑感萌生,作为民族“心智”和“精神”的集体记忆缺失,最终带来的是记忆的偏

移和文化认同的危机。

### 三、固本、开源、升华:数智时代“Z世代”传承家风的创新路径探索

面临家风传承的困境,需要我们深刻把握“Z世代”的特性,借助于数智赋能的潜力,在新的场域中活化家风,对记忆进行的延续、重现和规训,这也是在继承集体记忆的同时建构新的集体记忆的过程。

(一)内核固本:家风的“习俗习惯化”,在日常实践和仪式中延续记忆

家风是不断建构的过程,它不断吸收时代基因进行自我调适和重新框架化,无论是早期的“八德”,还是如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他们都秉持着向上向善的深层内核,借助家风的时代张力,我们要守牢家风内核,以发展的视角对其培根铸魂,丰富其外延并做好当代叙事。

康纳顿曾提及,身体实践和纪念仪式是群体记忆延续的重要环节。“Z世代”倾向于虚拟社交,物理身体的退场使其仪式意识欠缺,对各项实践也难以做到“事必躬亲”。要破除这一难题,一方面要强化“Z世代”在真实世界的体验,将家风融入日常化的仪式和实践,通过潜移默化的反复教育将家风内核规约为自觉遵守的理念。另一方面,在强化现实体验的同时要充分发挥数智技术优势,让生活场景从二维平面转换为3D立体,强化对记忆元素的复刻及撰写,如利用算法对“Z世代”进行精确画像,生成日常行为偏向的用户图谱,利用大数据预测“Z世代”的需求动向,把握其变化规律,从而进行智能推荐和个性化分发,让“Z世代”在沉浸式语境中更好地培养家风。

日常化的仪式和实践即培养“Z世代”的习俗习惯。习俗习惯是一种日常化了的仪式,同时依赖于主体的身体实践,通过家风习俗习惯化的培养,可以促使日常“习惯”演化成为一种持久的“惯习”。祭祀活动、家庭礼仪、节日典礼、纪念日等,它能以强大的力量将主体拉入到一个固定的场域接收操演,如春节体现的是“孝悌恭友”“敬畏自然”的内涵,清明节传达“缅怀先祖”“继志述事”的精神,甚至日常的礼貌用语和问候也是对“称尊长,勿呼名”“路遇长,疾趋揖”理念的继承。通过日常仪式,可以让参与者激活头脑中的深层的记忆,获得集体的身份认同和归属感。此外,“Z世代”在日常习俗习惯中是深刻的践行者,在身体实践中,“成员

通过身体的参与丰富、立体、深刻地感知集体记忆,并能够将记忆保存在自我意识之中”,从而把身体的“外化”感知“内化”为情感触动,如疫情期间,不少“Z世代”亲身投入抗疫实践,从而在动态化中完成其“成人礼”。故,将“Z世代”带入习俗习惯的各种语境至关重要,大到祭祀扫墓、升旗仪式,小到家庭生日会、亲子会和礼貌问候,甚至是日常的拥抱和鼓励,餐桌习惯养成等,都可以在固定的行为中把家风意义嵌入“Z世代”的生活。通过身体的触发和仪式感的强化产生记忆的“连接性转向”,有关家风的内核得到了远超日常生活的强化。

(二)形式开源:家风的“再媒介化”,在官民共同书写中重现记忆

“Z世代”是家风传承的主体,其数字特性倒逼家风新的数字形式,这是对记忆“再媒介化”的过程,即把通过其他媒介展示的“文献”以新媒介形式加以展现,从而突破时空的桎梏完成“意义的相遇”。

“万物皆可饭”的契机下,要让优秀家风成功出圈,就需要以“Z世代”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裂变传播,目前,“Z世代”五大通用语言是电竞、二次元、国风、手办及硬科技,我们可以将家风元素充分融入这些通用语言中,同时进一步利用VR、AR等技术寻找新的“媒介”,搭建多元复合的全息化、多模态的矩阵。如当前火热的短视频形式,虽已涌现相关作品,但在“年轻态”话语方式、“轻量化”表达内容和“互动化”体验上需要进一步发力。同时,“再媒介化”需要进一步精确垂直,深挖“重体验消费”下的交互形式,通过“数智证据”的在场,契合“Z世代”的游戏基因,让主体在AI电竞、潮玩、行为表演、云分享等娱乐中接收家风的熏陶和记忆的刻写。

随着技术的发展,个体记忆之于集体记忆已不再是弱势地位,“Z世代”在新的交往模式中产生了很多数字形态的记忆,这就要在家风“再媒介化”的过程充分发挥民间书写的力量,让“Z世代”用自己的方式诉说自身,在多方创作的助力下强化形式的开源,全面覆盖年轻人的生活场景。对于“Z世代”而言,要破除代际壁垒,使家风深入人心,就赖于小众圈层、IP跨界、文化出圈和内容共创的“解码器”。目前,很多家风节目都是在官方层面进行编码书写,传播效果有限。而“Z世代”具有强大的自我表达意愿,他们拥有多面身份和各自专长,基于自我解码的发声有时更能带来圈层传播和共情



传播。如以3D动画形式解读爱国教育的《那年那兔那些事儿》、以垂直创意的“服饰演变”展现百年女性形象等,在“大题”的立意下,以喜闻乐见的形式完成了“小做”的微观表达,更能带来情感共鸣。

(三)场景升华:家风传承的“机制化”,在虚实互通中规训记忆

数智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虚实共生的“元宇宙”悄然而至,对传统的内容生产、经济消费和用户体验和交往方式都进行了颠覆。“Z世代”作为最早且最容易无缝对接进元宇宙的群体,对信息的处理和行为方式的改变直接影响家风何去何从的问题。目前,家风的载体从物质层面逐渐转移到数据或符号上,如以往的“耳提面命”“言传身教”的媒介也延伸至视频电话、穿戴设备等虚拟场景中的比特流。囿于“Z世代”和其父辈的不对称在场,就需要在元宇宙的契机下将“父辈”的范畴扩展到“Z世代”生活的方方面面,以人机协同、即时互动的方式取代单向的宣传,在虚实互通中进行数据赋能,盘活现有资源、开拓更多记忆场景并完成精准推送,通过家风的场景联结共享和整体传播,在“浸渍家风”中搭建传承的常态化机制。

一方面,我们要充分运用VR、AR、MR和XR等数智技术和共创共享的发展潜力,为用户提供沉浸式的交互和体验,利用各项仿真技术,为家风提供了新的“记忆之场”。如借鉴于《人民日报》推出的“文物演唱会”、河南卫视的“考古盲盒”等让文物开口说话,实现时空穿越、让已故先辈复生,站在后辈面前进行对话交流、通过模拟历史场景以“情景再现”的方式再塑古今,将“Z世代”置入特定的记忆语境全方位把握家风内涵的由来,以及在家风博物馆中置入“虚拟数字人”解说员或者借助于数智化催生的虚拟纪念馆、云端博物馆等场景,甚至是在日常游戏、支付界面等嵌入家风元素的头像和边框等,这些都是将“Z世代”的特性和行为偏好

元宇宙中的充分发挥,全方位嵌入消除代际壁垒。另一方面,家风是“为未来构建当下记忆”,在家风传承的“机制化”进程中,还需要通过各项场景的展演,不断规训这一双栖记忆,在立体的“见人见物见生活”,完成记忆的“融合在场”。这就要加强对各种数字记忆媒介和数字内容进行全面收集、保存、整理和融合的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在平台、软件、工具及相应的智能设备中构建多重证据参照体系。家风传承的常态化机制的搭建,将家风刻入“Z世代”的骨子和灵魂,这是赋予集体记忆建构的根基,也是“Z世代”由“文化自知”“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的必经之路。

#### 四、结语

“Z世代”作为当下家风传承的主体,在新的时空语境下逐渐偏移集体记忆的轴心,在社会距离、心理距离和文化距离上愈行愈远。面对数智时代的新需求,如何活化家风、促进青少年对家风的创新性传承与发展成为当下亟待解决的新命题。借助于数智赋能,我们要充分挖掘家风的多元“场景”,发挥“Z世代”的数字创造力,通过内核固本、形式开源和场景升华中完成记忆的延续、再现和规训,在“融合在场”中实现“以家风促民风,以民风塑国风”。但要注意的是,我国的数智化还处于初级阶段,“元宇宙”的泡沫风险也带来家风传承的相应挑战,尤其是有关人机融生、芯片植入等伦理性的问题将在家风的语境中进一步探讨,当机器和人的界限开始消失,“赛博格”下家风传承的主体模糊,数字记忆的依赖性又会面临新的问题,家风及记忆的本位是具有温度的人而非冷冰的机器属性,如何以与时俱进的思维做到主体坚守,传承好包括家风在内的传统文化是我们进一步需要关注的问题,这也是关乎青少年发展、民族自信和国家形象书写的重要命题。

#### 参 考 文 献

- [1] 张庆园. 传播学视野下集体记忆的建构——从传统社会到新媒体时代[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97.
- [2] 李琦,徐佳妮. 话语策略与价值引导——对近年来家风类文化节目的探析[J]. 中国电视,2021(10).
- [3] 李成. 中国千禧一代:驾驭数智时代社会经济的多元与差异[J]. 文化纵横,2022(02).
- [4] MICHAEL FOUCAULT. Film and popular memory: an interview with Michel Foucault[J]. Radical philosophy, 1975, (11).
- [5] 张丽,周传金. 聚焦“Z世代”群体,创新短视频表达方式[J]. 全媒体探索,2022(Z1).
- [6] 夏翠娟. 构建数智时代社会记忆的多重证据参照体系:理论与实践探索[J/OL]. 中国图书馆学报:1-21[2022-05-16].

## Syncretizing Presence: Research on the Innovation Path of "Z Generation" Inheriting the Family Style in the Age of Numerology

*Xu Mingxing, Gao Yue*

(Anhui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of Commerce and Trade Anhui Wuhu 241002;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Anhui Wuhu 241002)

**Abstract:** "The age of Number Intelligence" changed the context of traditional family style. As the subject of current inheritance, "Z generation" is unique in value idea, behavior preference and so on, which makes the inheritance of family custom face new problems. The existing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universal influence of family style and the consumption potential of "Z generation", On this basis, this study made a thought transformation, Focusing on a specific group in a specific era, expounds the family style in the framework of "collective memory", and puts "Z generation" in an active position to "Reverse Force" the new writing of the family style with its digital characteristics. While sorting out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isomorphism of the family and the country" and the socialization process of the "Z generation", the focus is on the predicament of the family style in terms of social distance, psychological distance and cultural distanc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nnovative path of carrying on the family style of the "Z generation" under the "Numerical Intelligence Empowerment". The key point of "blending presence" is emphasized in the interweaving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gene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memory continuity, reconstruction and discipline are accomplished through "kernel consolidation", "formal open source" and "scene sublimation". This is not only a response 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people-oriented requirement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but also a three-dimensional reflection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writing of the national image.

**Key words:** family style; "Z generation"; collective memory

(上接第 71 页)

## An economic study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official crime

*Li Tao, Zhang Yi*

(Shaanxi Police Vocational College, Xi'an, Shaanxi 710000)

**Abstract:** In this paper, Using the data of 515 judicial documents of official crimes in Shaanxi Province in the past 10 years, this paper searches and extracts the relevant variables such as the subject's age, grade, educational level, motive to commit crimes, number of times, etc., using the cost-benefit model,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ep cause mechanism of job-related crime, and further expounds the restraining effect of job-related crime on productivity and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xpected cost of punishment increases and helps to reduce the probability of crime by taking advantage of duty. Therefore, this paper proposes to modernize the governance capability through accurate identification, targeted prevention and education, and efficient and in-depth investigation mechanism, we will build a governance system that is corruption-free, corruption-free and corruption-free, and strengthen the systematic, comprehensive and source-based governance of official crimes.

**Key words:** Official crime; Economy analyses;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优秀传统文化】

# 闽粤赣客家传统民居建筑的主要特征及文化溯源

洪开荣

(云浮市博物馆 广东 云浮 527300)

**摘要:**自西晋五胡乱华之后,来自中原地区的客家移民定居后在闽粤赣边区形成了民居聚落群。民居建筑忠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面貌,是城市的凝固记忆,是社会变革与文化变迁的历史见证。为适应闽粤赣边区的特殊地域环境,客家民居在建筑材料、规模、形态上都包含了坚固性、安全性、封闭性以及合族聚居性,也体现出中原汉文化顽强的延承性,在住宅的基本结构、造型、空间布局、对外关系上保持着对原乡中原民居传统的承袭。

**关键词:**客家传统民居;主要特征;文化溯源

**中图分类号:**K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885(2023)01-85-08

中国传统特色古建筑,包括四合房、窑洞、吊脚楼、傣家竹楼、毡包等种类极其丰富,奇伟壮阔。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客家古建筑文化却异乎寻常,独具匠心,这类建筑堪称一绝,被誉为中国建筑史上的活化石。闽粤赣边是传统客家文化传承的策源地,处于客家民系播迁、融合、发展的中心地带。客家民系自西晋五胡乱华之后迫于生计陆续从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向南方各省迁徙,在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大迁徙以及各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之后,逐步形成了一种价值统一、内容多元的客家文化体系。在整个客家文化体系结构里,客家民居是客家先民社会生活最深沉、最厚重的载体,也是观察探索客家文化面貌的重要路径。我国现存的传统客家民居数量多,分布广,其中的土楼系最神秘、最吸引人的一种民居类型。以考察当下闽粤赣传统客家民居的演变作为切入点,回顾和审视其曾经走过的历程和所经历的变迁,通过传统与现代的对话探索闽粤赣传统客家民居未来的保护传承之路。有利于闽粤赣传统客家民居基础性研究的完善,进一步挖

掘和传承传统客家民居中的核心价值和精髓理念。

## 一、客家古民居的分类

客家传统民居的建筑风格极具多样性,根据其建造形状区分,主要包括土楼、中原府第殿堂式围屋、围龙屋、四合院式的“四点金”“大夫梯式”土楼、四周设有走廊方便通行的走马楼。

### (一)土楼

土楼主要集中分布于东南一带的福建、江西、广东三省的客家地区,自西晋以来就作为客家先民的典型民居类型。它是利用未经过焙烧程序而仅做简单加工的原状土质材料夯实、建造,体现木架结构的特色,根据建造形状土楼主要包括方楼和圆楼。

现存的圆形土楼中建筑体量最大的是位于龙岩市永定区高头镇高北村的“承启楼”。其直径72米,整个建筑群由3圈直径不同的圆楼构成,最外圈的圆楼最高,最内圈的圆楼最低。直径最大的圆楼周长可达231米,楼高13.3米,楼层共有3层,

收稿日期:2022-11-11

作者简介:洪开荣(1984-),男,广东云浮人,文物博物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史前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

每层由 69 个房间组成,共有房间 207 间。第二圈为单层圆楼,共有房间 46 间。第三圈为单层圆楼,共有房间 39 间。土楼的中心建有宗祠供奉祖先,宗祠外围建有圆形护墙,内部为八角形建筑。祠堂前面有露天平台,两边建有长廊,布局紧凑,建筑艺术高。土楼内部凿有 3 眼水井,满足客家先民的日常生活用水需求。而位于永定县湖坑镇洪坑村的振成楼,该圆形土楼则是按照八卦图修建,建筑风格设计奇特。振成楼由 2 圈圆楼构成,外圈圆楼楼层 5 层,每层有房间 52 间,内圈楼层 2 层,功能齐全,由讲学堂、藏书楼、花苑等组成。土楼还在祠堂的前边建有一座供演出的戏台,当有戏曲演出时,居住在楼内的客家先民就会在戏台前边的露天空地或站在内圈土楼二层的廊道上看戏。

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顾问史蒂汉斯·安德烈先生在考察了土楼后赞美道:“这是世界上没有可以相比的,十分稀少、神话般存在的山村建筑模式。”1985 年 11 月,取自振成楼和天坛的建筑风格制作的中国南北圆形建筑模型在洛杉矶国际建筑模型展览会上展出,振成楼从此名闻天下。1987 年我国发行的中国民居邮票(福建民居),其建筑风格就属于上述的圆形土楼。

### (二) 中原府第殿堂式围屋

中原府第殿堂式围屋主要集中出现于粤东北、闽西南一带以及其他客家民系文化的发祥地和客家人的重要聚居地。此种类型的客家民居在建筑风格上颇似中原汉族府第,布局严谨,轴线明确,外观均衡、格调典雅、庄重、主次分明、轮廓起伏。

位于蕉岭县蓝坊镇的“钜美堂”就是一座通称为“两堂两横”式房屋,即两个厅堂,两列“横屋”。进入大门后,整个建筑坐北向南,顺中轴线依次为下厅堂、方形天井、上厅堂、正房。天井两侧设有 2 间侧厅,上厅堂与左右侧的天井与横屋用巷道连接起来。入大门前要经过一片空地,是为禾场,供居民夏夜乘凉,农忙时节亦用于晾晒稻谷等。同时辟有一口半圆形水池,用于收集整个建筑物天井所排出的雨水,既可养鱼、浇灌菜苗,还可以作为消防贮水设备。屋后的小山普遍栽种果树,既增加当地居民的收入又调节了私家庭院的小气候。良好的植被环境有效避免了水土流失,主体建筑的附近还建有杂屋,一般是作为厕所、畜圈或用来堆放农业工具等杂物,体现出

客家先民对环境卫生十分重视。建筑内部的房间、巷道、天井、厅堂的布局均体现出中国古代共同的人居理想与建筑原则,因此整座土楼显得错落有致、布局紧凑。

中原府第殿堂式围屋建筑面积可大可小,对于人口规模比较大且地势比较开阔的,通常建造成“四堂四横”体量更大的殿堂式围屋。

### (三) 围龙屋

围龙屋通常建造在地势平坦、视野开阔、人口稠密的平原、丘陵或冲积台地,田畴广阔。在滥觞期一般只建造宗祠以及两侧的横屋。随着土楼客家先民子孙繁衍,人口数量急剧增多而需要增修扩建的,如果围龙屋的后面地势平坦开阔,便选择于左右横屋和祠堂后面的空地建造平面呈半圆形的围屋——宛如游动的蛟龙从背面围护宗祠,故曰围龙屋。值得注意的是,围龙屋一般以经线作为整座建筑的中轴线,中轴线的两侧互相对称。而大门前的地堂(禾场)、半圆形的水池,恰好与宗祠及其背面的围屋构成一幅太极图。

蕉岭广福镇石峰村粟坝罗氏围龙屋,属于“四堂五横三围”的大屋。根据当地罗氏族人的讲述,第一围大概建于 180 年前,1945 年开始建第二围,1956 年筹建第三围。根据当地客家民俗,新建的房屋不能逾越三围龙,因此近年来当地客家人往往在第三围的背面增建一字型的走马楼以满足日常生活所需。俯瞰罗氏围龙屋,颇有旭日光芒的恢宏气象。

罗氏围龙屋有房间 326 间,整座建筑内部设有厨房、卧室、仓库、杂物间、畜棚、厕所等供 62 户人家日常使用。围龙屋内部开辟有多处天井,天井表面一般用鹅卵石铺砌而成,通常以几何图案的形式呈现。晴天可以用于晾晒稻谷等粮食,下雨时又可用于收集全屋的雨水。天井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确保建筑物良好的采光通风效果,遇到火灾紧急情况时还可以作为防火隔离通道使用。因此,许多游客在参观完后,往往赞美集居住、生产、防震、防火、防盗、防御于一体的围龙屋为“最具‘客味’的客家传统民居建筑”。

1987 年,美国作家玛丽·奥斯汀来中国访问期间参观了客家围屋后赞美说“这是迄今为止我见过的最吸引人的中国传统民居”。美国社会学家海曼曾说:“假如我要建造一座房屋,就要建造一座类似于客家围龙屋的房子”。

#### (四) 四合院式的“四点金”

四合院式的“四点金”的建筑形状属于方形土楼。以明清时期建造的居多,通常布局为二堂或三堂三横,通常于横屋两端增建一间高于整座建筑的攒尖式四方楼,即“炮楼”,围墙均有内宽外狭的瞭望台枪眼和监孔,用于抵御来犯之敌。“四点金”一般楼高三层,建筑内部栋、进、横较多,各个功能区之间由廊道串联,故曰“棋盘屋”。而方形土楼中体量最大的是位于龙岩市高陂镇上洋村的“遗经楼”,该建筑楼层有6层,高度17米。土楼的中间开辟有方形天井,其功能是采光、通风、雨水收集及排出,并在天井的中心部位凿有水井1眼。

#### (五) “大夫梯式”土楼

“大夫梯式”土楼主要出现在客家民系的聚居地区,其建筑风格与中原府第殿堂式围屋相近。为了适应复杂的山地斜坡环境,步入厅堂与横屋之后,随地势高起而逐渐升高。屋面不同材质重新组合,斑驳错落,屋脊飞檐层层叠叠,气势相当恢宏,宛似一只欲展翅腾飞的风凰,因此“大夫梯式”土楼又名“五凤楼”。其特点是中轴线贯穿中庭大厅,左右对称分布;有多个上下厅堂,主次分明,主体突出,房屋一层高过一层,房间正前面比后面略低;建筑物的正前方通常有大片的水田或修建一口池塘。

#### (六) 四周设有走廊方便通行的走马楼

在闽粤等客家先民的聚居地区经常见到的走马楼,是对方形土楼等包围式建筑结构上的简化与改良。走马楼在建筑形制上并非一成不变,建造者往往要考虑到山势、地形、方位以及需要承载的人口规模,一般为口字形、回字形、凹字形等。走马楼通常楼高三层,一层为堂屋、厨仓、厕所,二层为卧房、仓廩府库,其特点是二楼四周通常搭建悬空连廊。这样的建筑通风、防潮、防水,而且节省建筑材料,不需太多的工时。客家先民聚居地区地形复杂,这类客家民居大多包含了山地建筑的形态特征,普遍以环境为依托,将民居建筑与所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普遍受到当地居民的欢迎,这也是走马楼在闽粤客家人密集地区较为常见的原因。

如果客家人集中的地区,地势较为平坦,则习惯在纵向排列的民居外围增建一环圆楼。如果处于地势陡峭的山区,通常依山而建造,独立成行并在左右两侧及正门前修筑封闭式围墙,并于边上增建一座牌楼门,其建筑形状颇似锁头,因而当地客

家人又称之为“锁头屋”。

## 二、客家传统民居建筑的主要特征

以土楼、中原府第殿堂式围屋、围龙屋、四合院式的“四点金”“大夫梯式”土楼等为代表的客家传统民居建筑,均具有较明显特征及建筑艺术风格与装饰,而整体性、封闭性、防御性、内向性、聚居性,则是各类型客家民居共同具有的基本特征。

### (一) 坚固性

现存的闽粤赣地区的客家土楼,其建筑历史大都在200年以上,有的甚至达到了600年。在经历了长期雨水洗刷、多次台风地震,依然未遭损害,屹立不倒,足以说明它们的坚固程度。

这些坚固的客家民居,离不开客家先民对基址及周边地质环境进行细致考察,注重木构架的科学性、实用性与耐用性,用料考究,工艺精细。下面就简要介绍一下客家传统民居的建筑用料与施工工艺。

以土楼为例,其墙体厚度随高度递减,墙底最厚可达1.7m。在建造房屋基础、墙和台基时,在墙基底下挖出足够深的墙沟,在墙沟中堆砌大石,辅以石块和石灰、石膏等胶凝材料注水搅拌而成的混合物。接着以木板作模,内填黏土、杉木、石头和竹片,层层用杵夯固修筑墙体。夯筑墙体的主要原料取自当地广泛存在的红黏土,配以少量“添加剂”,如一定的糯米、熟石灰、石灰,经过捣碎、搅拌形成当地人常说的“熟土”,经过分层压实和分层夯实,形成了“三合土”,具有一定强度,耐水性较好。经过上述一序列复杂工序,土楼建筑的强度和防潮、防老化等性能得到了明显提高。其次是用麻刀和熟石灰,按照一定比例调和之后,形成了土楼民居外部墙体的修缮材料,一般为薄层多次涂刷于土楼民居墙体表面,因此能历经风雨剥蚀,巍然屹立不倒。《永定县志》曾经记录1922年当地发生的一场地震,持续了十多分钟,大地剧烈地颤抖,许多房屋已经成了废墟了,在经历了那场大地震后土楼等客家民居仍安然无恙。

### (二) 安全性

自西晋以来,客家先民为躲避战乱自中原黄河流域一带迁徙至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定居后,为了避免当地人的骚扰,防御盗匪打劫,抵御山中猛兽袭击,因此通常将所建的民居与居住在其中的客家人视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外墙加固和抵

御土匪进入内部仅仅是客家人打造安全环境的第一步,而是实现人与自然和建筑的共存与融合,将安全防护以统一的体系来设计建造土楼民居的。

有“东方古城堡”美誉的土楼,通常二层以下不开设悬窗,或开设立式长方形状的条积窗。客家传统民居一般都有完善的采光通风系统,譬如三楼以上的卧房一般开设有朝外的窗户,方便观察敌情、指挥作战和防护自己。客家民居的门框、门槛通常选用较规则的六面体石块砌筑而成,门板的厚度可达15公分,有的门上留有一到两个直径约15公分的孔,里面嵌上事先加工好的竹筒,其功能是如遇到土匪进犯等紧急情况,可作为射击孔或往土匪身上浇开水。有的土楼大门边还建有防火水槽,如土匪用火攻土楼,则防火水槽的水可以用于灭火。一些土楼民居自身已经十分坚固结实,十分重视防范意识的客家先民还为土楼外墙提供了夹墙支撑,在外墙已经被土匪炸毁的情况下,夹墙依然可以满足客家人防卫的需求。土楼等民居内配置设施齐全,能满足客家人的生活需求。客家人在天井中挖好的水井是被周边的土匪与外来的敌人围困时的唯一水源。碓、碾、磨则为客家人粮食加工的重要专用设备,因而敌人来犯时往往鏖战多时久攻不克,而当面对四角建有“敌楼”的四合院式的“四点金”无需持续多久就能迫使盗匪不战而降。

### (三) 封闭性

以土楼、中原府第殿堂式围屋、围龙屋、四合院式的“四点金”为代表的客家民居,建筑物内部的卧房、堂屋、天井皆与廊道、踏步、楼梯连通。然而从建筑外围看它却呈现出封闭性的一面,以客家土楼为例,它通常只有大门、后门各一扇,或正门的两侧设立两扇侧门。另外,中原府第殿堂式围屋、围龙屋、四合院式的“四点金”的横屋、半圆形围屋,都增建有敌楼。遇到土匪来犯,只需关闭大门就令其望而却步。

### (四) 聚族而居

土楼、围龙屋、四合院式的“四点金”“大夫梯式”土楼等客家民居,其建筑体量通常比较大,位于龙岩市永定区的“承启楼”有卧房207间,建筑面积达5461平方米。位于龙岩市高陂镇的“遗经楼”楼高六层,建筑面积达10297平方米,堂屋的数量竟达49个。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建筑学家茂木计一郎先生在参观完客家土楼后,不由赞叹道“此种壮丽的土楼建筑,不仅仅是一座规模巨大的民居,

更是成为一座小城市”。

客家人建造体量巨大的民居,也从侧面体现出其聚族而居的社会生活习俗。以“承启楼”为例,最多可以容纳75户,580人。蕉岭广福镇粟坝罗氏围龙屋,房间数量达326间,建筑物内部居住着罗氏族人53户,人口数量可达380人。虽然住户多人口多,但由于整座建筑内部设置了足够多的卧房、堂屋和天井,容易形成宜居的小规模生活单元。客家民居内的每户人家都能得到恰当、舒适的位置与安排,显得精致、舒适而优雅。

此外,祖祠是客家先民供奉祖先和举办祭祀活动的重要场所,客家族长族亲们有时为了商讨宗族的重要事务,一般选择在宗祠进行。每逢传统民俗节日,土楼内的各户人家都需要精心准备各类贡品带到宗祠上供。祠堂记录着客家人的光辉历史与优良传统,凝聚了族亲的力量,是宗族教化的圣殿,具有无与伦比的文化价值底蕴。

## 三、客家传统民居的文化溯源

至于客家民居,许多学者都认为客家民居来源于中原黄河流域一带,是早期客家人山西、河南一带躲避战乱往南方大规模迁徙时,中原黄河流域一带的建筑文化也随之传播到客家人落脚的福建、江西和广东一带。这种学术观点的科学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大多数学者往往浅尝辄止,没有深入研究。研究将依据传统文献记载,并结合考古发现,从客家民居的选址、布局、结构、建筑形制等方面讨论客家民居的发展演变与中原地区的古建筑文化的渊源与联系。

### (一) 客家民居文化的创生发轫

由夯土墙与木构架构成的土楼、中原府第殿堂式围屋、围龙屋,为客家民居文化的典型。然而,依据大量的考古发现,再结合文献记载,两广地区、闽赣、江浙沪一带的土著,通常称之为“百越”,其民居一般称为“干栏式房屋”,学术界普遍认为最早的干栏式建筑为河姆渡遗址的干栏式建筑,其建筑材料的主体为竹木,一般楼高两层,底层通常为畜圈和堆放杂物,二层住人。

西晋博物学家张华所著的《博物志》曾说淮河流域以南的广大地区,由于气候潮湿多雨,先民为了防水、躲避野兽袭击,便习惯于树上搭房居住。之后由于人口数量增多,对居所的审美意味以及舒适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于是在早期“巢居”的基

础上逐步发明了“干栏式建筑”。属于一种古老的木结构地面建筑。南方许多地区地势低洼,闷热潮湿,当地人们为了居住的地方能具备较好的隔热、通风与防潮性能,通常选择由一排排木桩、圆木、木板组成。以垂直的木柱为建筑基底,木桩的地上一端通过横梁连为一体,形成高于地面的木质底架,并在木质底架铺上一层木板,在此基础上构屋建房,抗震效果更好,稳定性更强。我国西南部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包括云南的傣族、拉祜族、哈尼族,贵州的侗族、苗族、土家族,两广的壮族、瑶族,台湾地区的高山族、泰雅族还保留有此类古老建筑风格。

古老的黄河流域,冬季气候寒冷干燥,在建造房子时通常选择建在平坦、干燥、向阳、背风的地带。生活在距今约70万年至20万年的房山区周口店的北京人,生活在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山顶洞人都是长期居住在天然洞穴之中。由农业革命触发的社会生产力进步,步入新石器时代后,黄河流域地区的先民逐步经历了由原始穴居到人工穴居、半穴居的居住形式,以及由巢居演变而来的干栏式房屋。

生活在距今五六千年前黄河流域陕西半坡村的半坡人,他们过着稳定的定居生活,并不断壮大聚落规模,其日常居所可以分为圆形或方形建筑两大类。方形房屋是半坡先民先挖好较浅的地沟作为房屋地基,采集附近的树干并于地基上紧密排列形成房屋墙壁,房屋中部选择较粗的木柱作为支撑整个建筑的骨干,因此半坡人建的方形房屋比较牢固。而圆形房屋则建于平坦地面,墙体也是由紧密排列得较细的树干组合而成,房屋中部一般有8根左右的木柱支撑整个构架。屋顶一般呈圆锥体,倾斜度较大。墙体和屋顶通常涂抹覆盖草泥土,防水性能较好。以木柱为骨架的草泥墙,客观上推动半坡人半地穴式房屋到地上建筑的演变。直立式泥土墙、独特斜屋顶反映了半坡先民的智慧,也奠定了我国古代建筑风格的基础。

引起专家学者注意的是,考古学者曾经在半坡人所生活的原始村落遗址发现,位于半坡人居所的中心部位的是建筑规模较大的方形房屋,多数学者认为它为当时半坡氏族公众议事和举行宗教活动等提供了公共场所。考古工作者在其北面发现的近50座房屋基址,总体朝南边,大体呈现出围绕方形房屋的半月形生活文化区。考古工作者还在

靠近西安半坡的临潼区域北姜寨遗址发现了距今约5000年的完整聚落布局,聚落中心为一个大型广场,通常为氏族首领组织全体氏族成员举行占卜等宗教仪式,或举办其他大型的集体活动所用。在广场周边紧密分布着6个原始村落,其居住者属于不同的部族,但所有住户的大门都采用朝向中心广场的统一布局。每个村落都建有一座规模稍大的方形房屋作为氏族部落议事、祭祀、宴饮、游戏的专用场所。此种原始聚落和住宅的分布特点与闽粤赣一带客家民居中的围龙屋极为相似。位于围龙屋中心的宗祠作为客家族人祭祖、尊贤、求神、娱乐、婚丧的场所,也和半坡遗址中心部位的方形房屋社会文化功能颇为相似。半坡原始村落房屋布局所蕴含的团结的空间形态,也与客家先民聚族而居、相互守望的社会生活习俗是一脉相承的,具有本质的一致性。

考古工作者在离半坡遗址不远的地方又发现了3处构造相对比较简陋的呈长方形状房屋基址,经过考证,这是当时的半坡人用于圈养牲畜的场地。说明当时的半坡人非常重视饮食卫生,人畜必须分开居住,这也与土楼等客家民居的布局理念是一致的。这与云贵川一带的普遍分布的“干栏式房屋”上层为卧房等生活空间,下层作为畜圈使用的生活方式截然不同。

1931~1971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安阳殷墟龙山文化层近700平方米的区域内发现了41座房屋基址。大部分学者认为这些距今3500年左右的房屋基址,对应的是直径在3.1米至6.2米的外观独特的圆形建筑。值得注意的是,在建筑形制上此类房屋与客家民居中的圆形土楼相近,在营造技艺上也是一脉相承,同根同源。先搭建房屋的底座,即选用附近的较为平整的砖石筑成明显高于周围地面的平台,再根据房屋的面积大小和布局预留相应的沟槽,最后使用预先配置好的草泥土在沟槽内筑起房屋的墙体,并在墙面上涂抹黄土或用石灰敷抹形成白灰面,拍打形成硬面。

综上所述,史前时期生活在黄河流域一带的先民其房屋营造技巧、生活习惯与闽粤赣一带的客家人是一脉相承,未曾中断的。因此如今的客家民居仍体现着厚重的黄河文化建筑风格特征。

## (二)夯土板筑溯源

客家民居的墙体,绝大多数为版筑夯造而成。我国传统房屋的夯土建造技艺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

史,古人在筑墙时,通常用两板相夹,选用黏性土填充于其中,用圆木棒弄均、填紧,称为“板筑”,之后逐渐发展成为“板筑法”。用土坯砌墙建造房屋是我国古代主要的建筑技艺,我国古代的长城、宫殿、城楼、角楼和民居建筑大多是采用版筑法建造起来的,如今北方农村干旱地区还经常采用此种传统的建造方法。据史书记载,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南匈奴贵族“赫连勃勃”在建“统万城”时,曾组织 20 多万的劳力用蒸土夯筑城墙。所选的建筑材料包括黏土、石灰等都是经过蒸熟的。建成的城墙分段验收,统治者为了严格控制夯实质量,规定要是筑造完工的城墙能被锥子扎进一寸深,该段城墙的工匠就会被处死,其尸体会被混在黏土中当建筑材料用。部分客家民居虽历经几百年的风雨浸蚀和刀兵之灾,依然屹立,完好如初。据《史记》记载:“商王武丁欲兴殷,梦的圣人,名曰说,视群臣皆非,使人求于野,得傅说。见武丁,武丁曰:“是也。”与之语,果圣人,举以为相,殷国大治。遂以傅说为姓,名为傅说。”

考古工作者还在位于河南淮阳县大连乡大朱庄西南隅发现了一座 4900 多年前的平粮台遗址,作为龙山文化时期的古城,顶部宽约 10 米,下部宽约 12 - 14 米,残高 4 米多,采用版筑法工艺建造。客家人在板筑墙体时,为了增强墙体的强度通常在夯土中夹杂一些竹片或树枝,就是所谓的“墙骨”。据史料记载,汉朝统治者在建造长安城时已经出现了类似客家人板筑墙体的建造方法。两汉时期河西走廊靠近沼泽一带的长城和烽火台质地较为坚固,这是由于当地树木匮乏,土壤粘结性较弱,只能就地取材,使用河滩中的芦苇作为“墙骨”,因而也增强了墙体的牢固性。

### (三) 客家民居的建筑材料、技术和艺术

客家先民在建造楼房时屋面用瓦通常选用筒瓦和板瓦,它们都是中国古代建筑物上常见的建筑用瓦。大量出土实物资料证明,西周时期,作为建筑用瓦的筒瓦、板瓦、瓦当就出现了。而到了春秋时期瓦的使用已经较为普遍了,由于瓦片的防水性能较好,因而春秋以后的民居屋顶坡度逐渐降低。

以客家土楼为代表的客家民居,其大门通常为双扇木门,门板非常坚固、厚实。古人认为一扇为户,两扇为门。《说文解字》解曰:“门,闻也。从二户。”《事务原会》等史籍也有关于黄帝始造门户的记载。距今 5000 年前的半坡、姜寨等原始聚落遗

址已经开始设门,安阳后岗、陶寺遗址均设有门槛。南宋罗泌所撰杂史《路史》记载道:“于是有圣人焉,教之编槿,而卢缉藿,而扉垣涂翳,以违其高卑之患;而违风雨以其革有巢之化。故,亦号有巢氏。”可见,客家民居的“双扇木门”,早在距今 2000 年前就已经出现了。河南境内出土了一件西周时期的青铜兽足方鬲,该件文物的下半部分以中原地区房屋的样式呈现,留有十字格的窗户,两个入口均设有双扇木门,并配置门环,可谓极为讲究。黄河流域汉代明器中常见的望楼以及岭南地区出土的楼阁式陶屋,都可见圆式窗户,黄河流域的先民把圆窗视作虎眼兽睛用于驱邪辟邪。客家地区的民居建筑和寺庙墙上也通常留有一扇左右对开的圆窗,也是受黄河流域一带宗教与民俗文化的影响。

客家先民建造民居通常设有天井用于收集雨水,并于天井与民居外的池塘之间设置暗渠,将天井内的雨水输送到池塘里。暗渠通常由鹅卵石铺砌或用陶水管。我国使用陶水管的年代很早,考古学界普遍认为最早使用排水管的是位于黄河流域的河南平粮台古城,埋于城门下的陶水管距今已有 4000 多年。河南洛阳二里头宫殿遗址和位于陕西省岐山县凤雏村的西周宫殿遗址均是利用陶制排水管道导流庭院积水。南北皆然,一直被沿用至今。

传统民居建造所忌讳的“五虚”之一是住宅没有水井和灶台。客家先民一般在天井的合适位置设有若干眼水井以便居民获得生活用水。北方黄河流域一带的农家也习惯于大院内的露天位置凿深水井,而在气候寒冷的东北农村地区则习惯于厨房内挖井取水。我国在庭院内挖井取水的历史十分久远,成都平原一带出土的汉画像砖中,大宅院的天井都设有水井。而在黄河流域一带的郑韩故城遗址中,考古工作者在其厨房位置发现了五眼水井和用于储存冰块以备夏天消暑用的冰窖。我国先民使用的水井可以追溯到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先民凿水井的过程中已学会利用木头增加井壁的牢固性,避免井壁坍塌污染水质,在井口还设有井台和井亭。

### (四) 殿堂式围屋溯源

客家先民所建造的殿堂式围屋,也是来源于中原地区的建筑文化。在黄河流域的河南、陕西一带,基于史料记载和考古挖掘,该地区的殿堂式建筑遗存数量都极为丰富。迄今为止我国最早的官



殿遗址是偃师二里头遗址,其台基东西长度达到110米,南北宽度将近100米,位于台基上面的殿堂基址,东西长度35米,南北宽度为25米。多数考古工作者认为这是面宽9间,深面的长度达4间,以编织竹条、木条为墙体的骨架,并抹草拌泥填充,屋顶有四个坡面并设有檐脊的木结构建筑。宫殿的大门则位于台基南部中央,基于柱穴的数量及其分布情况,其为牌坊式大门或穿堂式大门。显然这座3000年前的王族宫殿,是由堂、庭、门等构成的排列布局严谨、结构紧凑、主次分明的古建筑。其建筑样式与格局也为后世所沿用,同时开创了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的先河。

《仪礼》为儒家十三经之一,是春秋战国时代的礼制汇编。宋人依据该书记载,总结出先秦时期士阶层的住宅是沿着中轴线布局的两边对称的殿堂式木构建筑。位于前部的门,建筑的横向有3架梁的宽度,中央当心间为门,互为对称的两边次间为塾(也即堂屋)。门内通常设有庭院,穿过庭院后的功能区为厅堂,一般在此招待来宾和举办各种重大典礼。厅堂的两侧为东厢房和西厢房,其后面为用于寝卧的后室。后室与厢房的连接区域设置小门便于通行。整座建筑一般由堂、室、厢、庭院、廊道等功能区组成。无论是从空间的封闭性,还是基于建筑的布局、风格,都体现出中国民居的典型建筑形式,北京四合院和客家传统民居均为其发展演变而来。显然,夏商周时期的宫殿、殿堂和客家地区的传统民居在建筑风格和建筑形制诸方面均是一脉相承的。

#### (五)客家土楼文化探源

中国最早的楼是以城墙上的门楼出现的。有学者根据甲骨卜辞中的和,早在距今三千年前的先秦时期,当时的人们已经学会建造城楼了。公元前514年,吴王阖闾命伍子胥开始营建吴王城,据袁康所撰《越绝书》记载:丈七门三,皆有楼,其二增水门二,其一有楼,一增柴路。可见当时吴国的阖闾都城街道规模,远远超过同时期的北方黄河流域一带诸都城的街道。而春秋时期的范蠡修筑城郭,建置都邑,观测天文和土地,利用不过百里的封地建千秋万代的帝王事业。又选择卧龙山顶建造飞翼楼,作为象征天门的符号,用于压制吴国。然而,上述的城楼皆为深沟高垒的城墙,设置有悬眼、射口,可以居高临下、克敌制胜,因此,属于军事防御性建筑。

随着建筑技术的日益成熟,秦汉后期出现了楼宇殿阁。秦始皇设计的阿房宫虽然年代久远且没有完全建成,但据《阿房宫赋》:“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汉武帝则令人建造神明台和井干楼,据《汉书·郊祀志》卷下:汉武帝时“立神明台、井干楼,高五十丈,辇道相属焉”。到了东汉时期公孙述割据益州后,也曾经“造十层赤楼帛兰船”。

东汉时期,开始盛行带民居功能的楼宇。汉代文人创作的一首五言诗《西北有高楼》,诗中说楼上飘下了弦歌之声不禁让楼外人感到悲伤。只是说楼与浮云齐高,采用了夸张的手法。汉乐府中的一首乐府诗《陌上桑》写道“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采桑女罗敷都住楼了,可以看出当时楼宇已经比较盛行了。上世纪50年代,考古工作人员在位于今广州动物园的东汉墓葬中发现了一批陶质城堡型明器。这些明器是根据墓主人生前住宅的建筑风格和形制来烧制的。基本建筑布局为方形城堡,前后设有2扇大门,其上面通常设有用于瞭望和防御的城堡。

东汉初年,由于统治者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基于豪强地主的支持而成立的东汉政权赋予豪强诸多特权。这些豪强地主靠巧取豪夺占有了农民的土地,在中原地区的河南、河北等地开辟了规模巨大的田庄。除了抢占良田万亩,还控制着依附于这些田地的农民。为了保护掠夺来的财富,他们往往在自己的庄园筑造城堡,并在城堡内建造塔台望楼和外观颇似城堡的住宅。到了东汉末年,军阀董卓在距长安以西250里处建的院邸郿坞周长640米,墙体厚度达6米,囤积于城堡内的粮食可供应20年以上,城堡里的财宝堪比国库,又称为“万岁坞”。

岭南一带出土了汉代明器陶城楼,这是当时的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融合交流的见证。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任命屠睢为征伐岭南的主将、赵佗为副将,让他们率领50万大军征伐岭南,由此也将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带到了岭南。公元前207年,秦朝灭亡后,赵佗宣布脱离汉朝,自称“南越武帝”。此后,岭南与中原地区的统治者虽然也有过摩擦,但商业贸易与文化交流却更加活跃,中原地区的建筑文化也随之传播到了岭南地区,广州博物馆收藏的陶城堡明器也见证着两地区的文化交流进程。

东汉陶城堡的形制、风格,与客家地区的方形土楼“四点金”甚为相似,它们均来源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建筑文化。另一方面,通过分析客家先民的南迁路线,东汉陶城堡的出现与客家土楼彼此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起源上的依存关系。客家先民从中原地区南迁至闽粤赣一带时,当地还属于尚未开发的蛮夷之地。他们利用当地随处可见的竹子、茅草、树皮等搭建简易的茅草屋栖身。为了保障居民的安定生活,他们又建起了泥墙瓦顶的土坯房屋。然而社会不安定,一直面临着严重的盗匪问题,于是分散于闽粤赣一带的客家先民聚族而居,抵御盗匪侵扰,免遭灾难和保护生命财产安全。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数量的增长,客家先民便采用了他们之前在中原地区的城堡、殿堂式的建筑风格,建造出数量庞大的巍峨土楼和殿堂式围屋等。这就是客

家传统民居与中原地区民居文化的渊源关系。

#### 四、结语

客家民居中,不仅是闽粤赣边区的大量土楼,其他的民居类型也都蕴含了中原一带的“世家大族式”的文化特性:血缘性、团体性、宗法性。虽然深受地域要素与人文因素的交叉影响,但是在住宅的基本结构、建筑形制、传统礼制、空间布局、风水内涵、对外关系上都保留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客家民居文化是客家社会文化体系中最重要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客家先民劳动智慧的反映,更是客家人勤劳节俭、淳朴踏实的真实写照。对客家传统民居文化特征的系统梳理不仅能让大众了解到客家文化深蕴,也为溯源客家文化提供了另一种思路。

#### 参 考 文 献

- [1] 罗香林. 客家研究导论[M]. 兴宁: 希山书藏, 1933: 68.
- [2] 刘敦桢. 中国住宅概说[M]. 北京: 建筑工程出版社, 1957: 107.
- [3] 李芴. 中国东南传统聚落生态历史经验研究[M].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4: 92.
- [4] 黄汉民, 陈立慕著. 福建土楼建筑[M]. 福州: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2: 141.
- [5] (西汉)司马迁著. 史记[M]. 武汉: 崇文书局, 2010: 12.
- [6] 潘安. 客家民系与客家聚居建筑[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8: 55.

##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and cultural origin of Hakka traditional residential buildings

*Hong Kairong*

(Yunfu City Museum, Guangdong, Yunfu 527300)

**Abstract:** Hakka immigrants from the Central Plains have settled down in the border areas of Fujian, Guangdong and Jiangxi since the Western Jin Dynasty and the Five Dynasties of China. The residential buildings faithfully reflect the political, economic,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outlook of the society at that time. They are the solidified memory of the city and the historical witness of 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s.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special regional environment of the border region of Fujian, Guangdong and Jiangxi, Hakka dwellings have included firmness, security, closeness and the nature of ethnic groups in terms of building materials, scale and form. The traditional Hakka dwellings also reflect the tenacious inheritance of the Han culture in the Central Plains, and maintain the inheritance of the traditional Hakka dwellings in the original hometown in terms of the basic structure, shape, spatial layout and external relations of the residence.

**Key words:** Hakka traditional residence;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Cultural tracing